

盛泽历代名人传

沈莹宝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沈莹宝，笔名永葆、沈默、寡言、静远斋主人，1946年生于绸都盛泽镇。1965年支援边疆建设，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上屯垦多年；返乡后长期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历任副厂长、厂长、盛泽镇工业公司副经理、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2006年退休。现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协会副秘书长、吴江区印染协会秘书长、吴江区广东商会顾问。

喜好读书、旅行、听戏，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和丝绸文化研究，发表论文、工作研究、调查报告及散文、音乐作品近千篇，先后出版了《绸乡漫步》、《红梨湖》、《锦塘步月》、《盛泽旧影》、《绿水悠悠黄家溪》、《谈古论今说盛泽》、《旅欧掠影》、《与绸都同行》、《行走天竺》、《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中东漫步》、《“支边”岁月》等12本著作。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苏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吴江区曲艺家协会会员、吴江区音乐舞蹈家协会会员、盛泽镇文联副主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泽历代名人传 / 沈莹宝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12-7336-9

I. ①盛… II. ①沈… III. ①乡镇—名人—列传—苏州市 IV. ①K820.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410 号

盛泽历代名人传

著 者: 沈莹宝

责任编辑: 黄海龙 许 怡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笠泽风文学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1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xuyi@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7336-9

定 价: 30.00 元

序

盛泽是中国的丝绸之都，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而名闻遐迩。自古以来，盛泽的居民以丝绸为业，植桑、育蚕、缫丝、织绸，以机为田，以梭为锄，夫织妻络，父业子承，代代相传，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造就了盛泽“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的繁荣景象。

盛泽又是一个人杰荟萃、名人辈出的水乡古镇，历来有着“崇文”与“尊商”并存的优良传统。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盛泽人“以商养文，以文兴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科学文化的繁荣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自宋元以降，盛泽在丝绸业繁盛的同时，形成了“黄宫蜚声”的现象，“人文蔚起，科第相望”，先后诞生了40名进士、116名举人，并走出了一批名闻遐迩的名臣、诗人、文学家与书画家；近代以来，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艺术家和高端科技人才更是层出不穷，可谓成就卓著，星光灿烂。各行各业的无数英才和劳动大众，共同成就了绸都盛泽持久的辉煌，也为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作出了贡献。

历代名人的相继涌现，是盛泽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盛泽人心中的骄傲。今天，盛泽人民正凝心聚

力为建设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绸都而努力奋斗，重温盛泽历代名人的感人业绩，对于加深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增强凝聚力，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盛泽，活跃着一批潜心探索与研究盛泽地方历史文化的有心人，沈莹宝是其中的一个。他长期从事盛泽经济领域的管理工作，在工作之余研究盛泽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和有着独特个性的盛泽丝绸文化现象，先后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有关的作品，出版了多部专著和文集，并通过电视屏幕和进机关、学校、企业开办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普及乡土文化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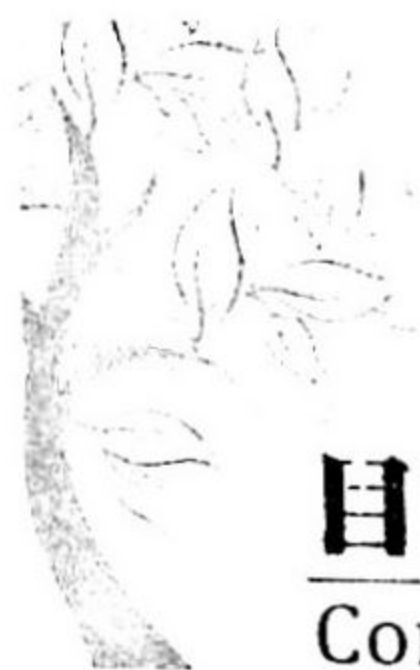
“盛泽历代名人传”是他编写的一部新作。盛泽历史上曾经涌现了无数杰出人物，他从中遴选了16位，分别为之作传，其中有明代的名臣周用、周宗建、名士卜舜年、才女柳如是、清代的文学家计东、钮琇、在清末创办了盛泽第一所新式学校的社会名流郑慈谷、为盛泽丝绸走向世界作出贡献的著名商人汪鞠如、蚕丝教育家郑辟疆、“和平老人”邵力子、评弹艺术家刘天韵、台湾“半导体之父”潘文渊、“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国医大师徐景藩、“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的唐仲英、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兰荪。这些名人或高风亮节，或学有专长，有的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突出的成绩，有的对盛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都是值得盛泽人民学习和敬仰的人。

我们的前辈已经为盛泽的繁荣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衷心希望今天的盛泽人民努力向前辈学习，用自己的双手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为绸都的新辉煌作出更大的贡献！

吴江区委常委、盛泽镇党委书记



2014年9月12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周 用	001
周宗建	011
卜舜年	019
柳如是	031
计 东	042
钮 琇	054
郑慈谷	064
汪鞠如	072
郑辟疆	079
邵力子	088

刘天韵	100
潘文渊	111
程开甲	117
徐景藩	128
唐仲英	138
郑兰荪	150
后 记	163

周用

周用（1476—1548）字行之，号白川，明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历任地方要职及工、刑、吏三部尚书，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恭肃，入府学乡贤祠，堪称一代名臣。

周用之父周昂（字大詹）入赘于盛泽计氏，改姓为计。明成化十六年（1476）周用出生于母亲家中，后居于烂溪之西的周家溪（今平望境内）。周用自幼学习勤苦，“寒暑不解衣”。幼年时，他随母亲姓计，弘治十四年（1501）得中举人之后才恢复了周姓。

弘治十五年（1502），周用得中进士，授予行人之职，掌颁诏、册封、抚谕、征聘诸事；正德初，擢升为南京兵科给事中，后因父亡丁忧，守丧期满除服后改任南京礼科、兵科给事中。

明朝所设六科给事中，品卑而权重，“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之职，与御史互为补充。周用为人正直，忠于职守，屡次上疏弹劾迁黜尚书、都给事中等官，并弹劾镇守江西的中官（太监）黎安，请治其罪。

正德十年（1515），乌斯藏（今西藏）使者来京朝贡，称“西域胡僧有知三生者，西人谓之活佛”，于是武宗派遣太监刘充前往乌斯藏迎活佛，“率指挥千户百余人，甲士千人，以珠琲为



周用像

幡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赠巨万计，勅以十年往返”。周用与朝中正直之士上疏进谏：从京城到乌斯藏远达万里，行程数月，费用几百万，一路靡费须四川承担，四川财政不堪重负，加上流寇繁多，容易生乱，请武宗作罢。但是武宗不听，最后此事半途而废，劳民伤财。

正德十二年（1517），周用调任云南布政司左参议，此后又出任广东布政司左参议。在广东，他曾监军龙川，并在番禺一带擒斩匪盗900余级，保一方平安。嘉靖二年（1523），周用因剿匪有功升任浙江按察副使，又补山东临清兵备副使，嘉靖六年（1527）擢升福建按察使，次年又改任河南右布政使。

在河南任职时，周用代监司审讯南阳滞狱囚犯，大规模平反冤案，以致“牢狱为之一空”。其时，河南正遭遇大旱，周用“发帑赈济饥民”，他自告奋勇到灾情最重的汝宁（今汝南）一带赈灾，并亲自到田间地头查询灾情，督促手下官吏“查清户籍，发放贮米”，防止不法吏胥从中贪贿为奸。灾民由此而得实惠，“获生者无数”。

嘉靖八年（1529），周用擢升为右副都御使，“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他在提督南赣（今之江西、福建、广东、湖南交界地带）军事之时，当地有一土匪首领，官府久捕而不获，周用探得他的部下有一人为动摇者，便对他恩威并施，胁使他擒杀首领来献。周用认为“治盗当塞源”，关键是必须清除贪官污吏；于是他下令郡邑“均徭赋，缓征科，抚流民”，一年后“四境安然”。南赣地方为数省交界之处，本应是商旅运输之要道，但因为这里的商税太重，故而商贾们纷纷“避而他往”，致使当地的财政收入骤减，军饷不足，为此，周用果断调整商税，使税负轻重适度，于是商人皆复归于此，当地的经济状况也随即逐步好转。

后来，周用应召协理都察院事，又先后任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因起废不当，尚书汪鋐诬罪下属”，于是周用被降职，调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后又擢升为右都御史。

嘉靖十七年（1538），周用任南京工部尚书。在任上，他发现采购物资的吏胥经常受贿，他们往往先给商人付钱而后进货，奸商因此而获不当之利；于是他令百姓将货物直接送入衙门，并立即付钱，这样一来，狡猾的吏胥们便无隙可乘，多年的积弊就此杜绝。嘉靖十八年（1539），周用又调任南京刑部尚书，因九庙（帝王的宗庙）失火，他自请免职还乡，朝廷内外都深为周用的“端亮有节概”而惋惜不已。

之后，因众官的推荐，周用重新被起用，复任工部尚书，“起督河道”，数月后又改任漕运总督，但未及上任，又召拜为左都御史；因二品任满9载，加封太

子少保。嘉靖二十五年（1546），吏部尚书唐龙因故被罢官，周用随即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因劳累致疾，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卒于任上，享年73岁。逝世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恭肃，入祀苏州府学乡贤祠。

对于治理黄河，周用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提倡沟洫（田间水道）治理，认为黄河之所以有决徙之变，是由于“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今兰考）以南之涡河，与直隶（今江苏）徐州、沛县百数十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淮”，哪有不横流溃决之理？因此他提出用沟洫治理黄河的必要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为政，又何所不可？”他想把黄河洪水分散到田间地头，有利于农业生产，又可达到消除黄河洪患之目的。他这种治河思想，打破了历史上单纯依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探索出新的治河见解。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所编的《皇明经世文编》中，亦收有他治理河道的条目。

周用为人“寡言笑，慎操守，居官不挈妻子”，他一生为官，始终谨慎处事，“勤政务，慎操守”，身居监察要职，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他毕生清廉节俭，一袭旧袍累年不更换，所需的盐酒蔬果之类皆至市上购买，免职后竟然“囊无余资”。

周用工诗文，兼善书画。他的书风俊逸，绘画得到“明四家”之一沈周的指点，“布置渲染，备极高雅，山水遒劲缜密，远近斐叠，气韵蔼然”。周用“喜为诗，每画必题”，著有《读易日记》、《楚辞注略》等，有《周恭肃公集》16卷行世。

周用的诗在历史上评价甚高，《〈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周用的诗“近体颇宏伟”；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白川……诗则别裁风格，取法杜陵（杜甫）”；陈田的《明诗纪事》则认为“尚书七言近体颇擅风格，绝句尤有风致”。在陈田的《明诗纪事》一书中，共收录了周用的诗作13首，是此书中被录入诗作较多的诗人之一。

周用一族来自浙江绍兴。盛泽周氏的始祖周德从绍兴来苏州一带经商，“乃赘吴江车溪村（今荷花村）张院判之女，因居焉。”因为周德做了张家的女



周恭肃公集



周用画作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自行入歷官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忠肅仕宦四十餘年公忠勤恪顧自喜為詩動筆太帙書法俊逸尤善繪事其落筆花詩云新影畫上柳借月後時家謝不修我裁將微女想中錦畫著秋娘嫁日不佳句也偶得此幅筆墨不凡後人或未之知因詳記于左

康熙癸酉冬十月十四日 江村高士可書在荷竹齋

婚，周氏开始在烂溪的两岸（今胜天、荷花及烂溪一带）繁衍生息，并在周用之后成为吴江的望族。周用的正妻所生子女后散居于盛泽谢天港（今胜天村）、五牛村（今荷花村）及烂溪之畔，侧室姜氏所生子女则搬到城内轆角圩居住。

自周用之后，周氏世代书香传家，科第不绝，且为官清正，英才辈出。

周兆南，字仲阳，号两峰，周用之子；谢天港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壬子顺天乡试举人，会试不第，谒选得浙江杭州织造通判，后擢升河南许州知州。生平廉洁自守，在杭州五载，宦橐如洗，民间有“只饮西湖一口水”之谣。名入宦绩传。致仕后，家居临湖面山，读书自得，或弄小诗及古文词。著有《两峰遗草》。

周式南，字仲翰，号养室，周用之子，周兆南之弟；谢天港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举人，赠太仆卿。

周京，字世臣，周用之孙，周兆南之从子；谢天港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举人。

周采，字亮畴，周用之孙。万历七年（1579）贡，任都司经历。

周应偁，字声仲，号起白，周用之曾孙，周兆南之从孙；南庄人。万历十六年（1588）戊子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进士，任江西宜春知县，“治尚清肃，民有讼者，片言立剖，绅士不敢干以私”。名入宦绩附传。著有《遮芳圃集》。

周应愿，字恭谨，周用之曾孙，周兆南之从孙；谢天港人。万历十六年（1588）戊子顺天乡试举人。

周宗建（1582—1626）字季侯，周用之曾孙。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先后任武康（今浙江德清）、仁和（今杭州）知县，后升任监察御史，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被阉党陷害，打死在狱中。阉党失败后，崇祯帝下诏赠周宗建太仆寺卿，

南明福王又追谥“忠毅”。

周文衡，号子铨，周应偶之子。崇祯三年（1630）庚午举人。

周灿，字光甫，号闇昭，周兆南之从曾孙；谢天港人。崇祯三年（1630）庚午举人，崇祯四年（1631）辛未进士，任宣化、会稽二县知县，颇有政绩。崇祯十六年（1643）擢升浙江道监察御史，巡按江西。进入江西境内后，下属的官吏都派遣差役前来迎接，有一个县令还送他一大笔钱。周灿勃然大怒，留住了他的差役不让回去，那个县令闻讯十分害怕。等到周灿召见这位县令，要他说明情况时，他已畏罪挂印回乡。

当时，张献忠的起义军接连攻克了袁州、吉安二郡，省城大震，周灿亲临城头守卫，并调兵镇压，收复了二郡。福王在南京登基，建立弘光政权后，宗室朱统𣎑诬劾江西在籍词臣杨廷麟图谋不轨，周灿上疏为杨廷麟申辩；周灿还上疏请朝廷录用旧臣大学士傅冠、兵部尚书熊明遇等。名入宦绩传。

弘光政权覆灭后，周灿回归故里隐居，成为复社的骨干。他与同邑的高蹈结诗社相唱和，追悼国事，恸哭大明的衰亡。他的诗文和绘画作品笔意疏远，有姜夔（号白石道人）之风。著有《西巡政略》、《泽畔吟》等。周灿所作《盛泽》诗：“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一直传唱至今。

周启，字东明，周用六世孙；南牛圩人。诸生，有义行。康熙二十一年（1682）盛泽遭水灾，南牛圩的围田都被淹。周启主动拿出白米百石，雇人戽水抢救庄稼；到秋后收割时，同村的人要偿还他戽水的费用，但他坚决不收。

周启的儿子周斗文，“亦好义，有父风”。有一次，邻居沈某命佣人到周斗文家担粪，在岸隙处拾得二斤黄金。邻居沈某欲与周斗文一起侵吞这些黄金，便假意对他的佣人说：“此周家物也。”但周斗文却说：“金在箱篋乃为我物，在岸隙则道路也。”于是将这黄金给了佣人。

周景岷，字鲁圻，周灿之孙；谢天港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举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进士，未殿试而卒。

周希孟，字敬舆，周用之裔孙；谢天港人。雍正六年（1728），他的老师严鸿逵（清初著名学者）因“曾静案”被捕，后被戮尸枭示。受严鸿逵案株连，周希孟慷慨就逮。被捕时，他手中拿着老师书写的折扇，家人想夺走他的扇子“以泯其迹”，他却说：“我师手笔，不可弃也。”审讯时，承认是严鸿逵的弟子，后被处死。

周梦台，字叔斗，号柳初，周灿之六世孙；谢天港人。诸生，“工书法，姿态秀逸，宗苏长公（苏东坡），颇名于时。间为篆隶，古雅有致。诗文戛戛独造，不

蹈近人蹊径”。著有《茶瓜轩诗稿》。

周梦台与陈希恕等人常在沈烜家的停云读画楼饮茗赋词，沈烜之子曰寿、曰富兄弟“皆好诗”，于是“共倡红梨（诗）社，推叔斗为社长”。诗社设在圆明寺附近的西庵，与红梨渡相近，故名为“红梨”。诗社成立后，诸同人或每月一聚会，或一月两聚会，“咏里中古迹及残年新乐府”，“积一年，得诗若干”，由分湖郭频伽作序，结集成《红梨社诗抄》。今有道光十年（1830）刻本《红梨社诗抄》（陈希恕辑）行世。

附录：

《明史·列传第九十》周用

周用，字行之，吴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给事中。父忧服阕，留补礼科。已，乞南，改南京兵科。谏迎佛乌斯藏及以中旨迁黜尚书、都给事中等官，且请治镇守江西中官黎安罪。出为广东参议，预平番禺盗，有功。历浙江、山东副使，擢福建按察使，改河南右布政使。代监司鞫南阳滞狱，狱为之空。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召协理院事。历吏部左、右侍郎。以起废不当，尚书汪鋐委罪僚属，乃调用南京刑部。就迁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尚书。九庙灾，自陈致仕。用端亮有节概，既罢，中外皆惜之，频有推荐。久之，以工部尚书起督河道，数月，改漕运，未上，召拜左都御史。二品九年满，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代唐龙为吏部尚书，明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恭肃。曾孙宗建，自有传。

用掌宪时，慎自持而已，无所献替。其后宋景、屠侨继之，大略皆廉洁，与用相似。景未久卒，而侨居职八年。属严嵩柄政，风纪不振。议丁汝夔狱，受杖不能去。

《明诗纪事》 周用之诗（十三首）

苍梧城楼

迢迢河汉临飞城，何年天险开炎州？
韶石亭亭凤鸟去，海门宛宛蛟龙游。
宋帝楼船非故国，越王台殿余荒丘。
苍梧云暮一回首，炯炯月出城东头。

崖山（二首）

冈州行殿火飘红，井澳楼船苦北风。
犹为夏康能复国，可怜刘禅已封公。
漫山春草珠襦冷，卷地胡尘玉帐空。
千古乱阶谁复问，直寻国史到元丰。

宣和容易误亡辽，却向天南寄九朝。
忍见黄衣沦碧海，犹闻白屋怨青苗。
玉鱼坠地迷秋草，铁马横沙落暮潮。
帝业艰难余涕泪，黄埃无处望陈桥。

石田沈氏像图

萧然丘壑在眉端，林下人从壁上观。
白发信谁修野史，青衫从而授园官。
双鱼落手春坡还，四座惊心夜语兰。
盘薄尚需劳画者，休文诗骨不胜寒。

送礼部陈子引父还江南

都门羸马载青袍，为客经年感二毛。
东郭烟霞陪我老，南宫文采付儿曹。
风前落木蒲帆急，江上孤城铁瓮高。
乡国有人怜倦翼，秋深短鬓不禁搔。

清凉山寺

行庖酒煖登清凉，此生此乐殊未央。
谩行四百八十寺，须醉三万六千场。
西风野树黄叶满，南国词人白发长。
问渠明月有高兴，还访钟山旧草堂。

尝鸡头

谁问鸡头当鹤头，品题我自等名流。
平生芒刺宁终老，次日泥途幸早收。
税亩未修河伯怨，食芹应重野人忧。
江湖到处无知己，若个明珠可暗投。

题画

枫叶野亭阴，苹花沙岸雨。
秋光绝可怜，谁与幽人语？

严陵滩

滩水清复深，飘帆历虚馆。
我爱先生鱼，天寒钓丝短。

闲居

背拥重衾客梦赊，隔帘清晓有啼鸦。
东风未扫墙隈雪，半面春寒索酒遮。

题画

空江绿水净孤城，隔岸桃花看小红。
只恐春愁易寥落，独持酒杯慰东风。

题扇

客程子夜听吴歌，夜雨南塘促芰荷。
欲问西风来早晚，白团明月奈秋何。

曾仲仁墨梅

自怜宫阙少诗流，春信相将寄陇头。
一种孤窗明月夜，真飞清梦到衡州。

周宗建

周宗建（1582—1626）字季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先后任武康（今浙江德清）、仁和（今杭州）知县，后升任监察御史，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被阉党陷害，打死在狱中。阉党失败后，崇祯帝下诏赠周宗建太仆寺卿，南明福王又追谥“忠毅”。

周宗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是吏部尚书周用的曾孙。幼年之时，他就嫉恶如仇。有一次，他的父亲周辑符在与客人的闲谈中说到了著名谏臣杨继盛的生平，他听后急切地询问详情。当他听了杨继盛因弹劾权奸严嵩而被陷害致死的情状后，愤怒地叫道：“为何杨公这样的好人却遭惨死？那严嵩如今在什么地方？我去找他评理。”众人听后，都感到十分惊诧。

万历三十四年（1606）周宗建赴乡试，考中举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中进士，授武康（今浙江德清）知县，后来又调任仁和（今杭州）知县；因为政绩优异，升任为福建道监察御史，巡按湖广。

天启元年（1621），周宗建上疏指陈时弊，为已故的曾遭受过打击的顾存仁、王世贞、顾宪成等人鸣冤叫屈，并请封谥号，他还追论万历年间的朝政，历数万历朝官场小人的乱政之罪。

此年，后金的努尔哈赤率重兵围攻沈阳，形



周宗建像

势十分危急，周宗建就此上疏，责备辅臣的失责。不久，因沈阳城中降兵叛变，后金攻克了沈阳，他借此机会，上疏请皇上破格用人，召还已被革职的熊廷弼。之后，熊廷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再次任辽东经略。然而周宗建也因此而得罪了一批官员。

天启帝即位后，他的乳母客氏与宦官魏忠贤深受宠幸，由于御史们的反对，客氏曾一度离开宫廷，但不久又奉旨入宫。为此，周宗建首先抗疏极谏，称“天子成言，如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他说：这帮人一旦蒙受了皇恩，便有了非份之想，轻侮沉溺，目无法纪，慢慢地变得骄横放纵，灾难和罪祸一天天增多，后患将难以杜绝。他作旨请贵的举动，受到清议的推重。

在熊廷弼复职的同时，朝廷又擢升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王化贞“驽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他大言轻敌，不听调度，致使广宁于天启二年（1622）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败走山海关后，朝廷为此又起纷争，多数廷臣都庇护王化贞，企图加重熊廷弼的罪名。宗建愤愤不平，极力为熊廷弼辩解，为此包庇王化贞的人都对他咬牙切齿。

那年，京师久旱，五月下了一场冰雹，周宗建借此机会再次上疏历陈数事。他认为这是阴盛阳衰的征兆，便逐次陈述了四件事。第一，专门非难大学士沈紘；第二，请求宽大处理因建议被废黜的诸臣；第三件事是说熊廷弼已有定案，不应该再以这事罗织朝臣的罪名，暗地里指责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给事中郭巩；第四件事是专门攻击魏进忠。他指出，近来的政府事务，外廷颇有微辞，都说深宫之中，没有办法预料。像魏忠贤之流，目不识丁，而陛下对他笑语频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的行政权力都按他的说法办理。“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构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此时，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祸乱朝政，许多大臣投靠魏忠贤结成死党，其势渐炽。魏忠贤见到周宗建的奏文后，恨之入骨。

此时，邹元标创办首善书院，由周宗建负实际责任；邹元标被罢官时，周宗建自请与他一起罢官，但没被批准。周宗建在按职责巡视光禄寺（掌管祭祀、朝会、宫廷膳食的机构）时，与给事中罗尚忠一起大力剔除奸邪弊端，节省了很多财力物力。他还提议核查地方上供的各种器物，惹怒了宫中的宦官；宦官们借圣旨责问他，周宗建便再上疏极力坚持，就此更加得罪了宦官。

给事中郭巩，曾因弹劾熊廷弼被贬谪，等到熊廷弼战败后，他又恢复了官职，就开始大力巴结魏忠贤。他知道魏忠贤最恨周宗建，于是就上疏诋毁熊廷弼，并进而诋毁朝廷中荐举熊廷弼的人，周宗建就是其中之一。南京监察御史涂世业也

随即附和，妄称“周宗建错举了熊廷弼，贻误了封疆大事”。

周宗建愤然上疏，驳斥涂世业，并在疏中揭露郭巩巴结魏忠贤的丑事。郭巩因有魏阉作后台，故而有恃无恐，也上疏数千言，肆意诋毁周宗建，并累及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等数十人，把他们悉数诬陷为熊廷弼的逆党。

周宗建为此更加愤怒，他随即又抗疏驳斥郭巩的谬言：“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都是败坏边防大事的人；元诗教力主催战，赵兴邦贿卖边臣，也都是耽误边防大事之人；其他荐举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的人，也都是耽误国家边防大事的人。郭巩为什么不一起指责，而唯独苛求于熊廷弼，并且诋毁举荐熊廷弼的人为叛党呢？”

当时，魏忠贤的势力日益嚣张。周宗建知道祸害的根子在于魏阉，而魏阉此时正受到皇上的恩宠；如果他再与朝中的奸党内外勾结，其祸害将更是难以消除。每当虑及此事，他总是彻夜难眠。周宗建的两个爱妾宋氏与韩氏得知丈夫想参奏魏忠贤，毅然鼓励说：“难道大丈夫不应当如此吗？谏而听，国之福；谏而不听，也是臣之份。”周宗建听后十分感动，说：“你们俩身为闺秀，尚且如此明礼，为了社稷，我死又何憾！”

于是，周宗建又于天启三年（1623）二月再次上疏，直接指责魏忠贤。他在上疏中直言：去年我指名劾奏魏忠贤，故而他无一日忘记我，于是趁郭巩入京之际，嗾使郭巩诬陷我和其它的异己者。他们把持“察典”（对官吏六年一次的考核），将数十名异己廷臣的姓名编成一册；又写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的罪状，其中给事中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等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等人，而我也是其中一人；他们妄图罗织罪名，挟私报复，以解魏忠贤心头之恨。这样的“察典”已不是朝廷的“察典”，而成了魏忠贤与郭巩之流的“察典”。幸好朝廷还有正直之人，仅凭郭巩一人之言还不行，故而他想借熊廷弼作陷阱，将异己一网打尽。

郭巩又因为我的议论涉及了王安（王安是宦官，为人刚直不阿，得到廷臣敬重，后被魏忠贤和客氏害死），讥笑我与王安有何瓜葛。陛下知不知道王安是如何死的？他身首异处，肉饱乌鸢，骨投黄犬，是古今未有之惨啊。郭巩一心讨好魏忠贤，背公灭理，把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等人都说成是王安一党。请陛下彻底查明王安究竟被何人害死，此事是魏忠贤的一大罪状，而郭巩对魏忠贤的奉承谄媚，也以此可为证据。

前朝时的宦官汪直、刘瑾，虽然都是狠毒之人，但当时言路清明，臣僚之间

也互不结交，所以不久他们就被除去。如今有权势的宦官利用言官来报复大臣；言官又借有权的宦官以张声势。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被排斥了，邹元标、冯从吾被罢官了，文震孟、郑鄤被驱逐了，最近又压制孙慎行、盛以弘，不让他们进入内阁。他们无端扩大案情，牵连无辜，正直的人都战战兢兢，朝廷的大臣都爱惜自己的生命，没有人敢直接与他们抗衡。

周宗建又将魏忠贤编纂《三朝要典》、嗾使党羽假造《东林点将录》以及妄杀无辜、残害忠良、与客氏狼狈为奸的种种罪状一一指点出来，并声称：如果我也贪生怕死，再不出来说话，那么朝廷中内有魏忠贤居中指挥，旁有客氏作他的羽翼，外有刘朝等人之为典兵示威，又有郭巩之类小人巴结攀附，内外勾结，将好人赶尽杀绝，国家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举朝噤若寒蝉，臣若顾惜微躯，不为入告，天下事尚忍言哉！”

周宗建的奏章洋洋千言，惊天动地，其中他痛斥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这八个字可谓振聋发聩，因而他被魏忠贤及东厂之流视为“第一仇人”。疏文送入宫中后，魏忠贤大为惊恐，于是他率领刘朝等人围在天启帝的身旁哭泣不止，并请求自髡（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以激怒皇帝。于是天启帝严令周宗建交代实情，欲对他严加重责，但周宗建从容地回奏，继续直进忠议。皇帝大怒，下令当庭杖打周宗建，但由于阁臣的力争而告止，最终被处以扣罚俸禄。

此时，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人纷纷上疏支持周宗建反击魏忠贤和郭巩，郭巩也再次极力诋毁诸人，于是皇帝下诏让廷臣们讨论双方的上疏。然而廷臣的意见分为了两派，难以评定，于是皇帝降旨严厉斥责，剥夺郭巩、周宗建三个月的俸禄。

这时，宦官刘朝负责操练宫内士兵，并谋求外任。廷臣们听到风声后，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周宗建说：“郭巩自己说他从没有勾结内廷，如果他果真能以片言只语来制止刘朝，我就为他洗刷勾结的罪名。”郭巩听后，吓得不敢说一句话。

此外，魏忠贤一党的御史倪文焕还上疏诋毁周宗建讲学的内容为伪学：“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浅不深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天启五年（1625）三月，大学士冯铨因为恨御史张慎言曾议论过他，就嗾使他的门生曹钦程弹劾诬陷张慎言以及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人贪赃，并指明以周宗建为首。魏忠贤随即矫诏将周宗建革职，下抚按追赃。

第二年，魏忠贤认为有关部门结案太迟缓，于是派缇骑将周宗建逮捕治罪。不久，魏忠贤又借李实的疏奏，将周宗建的名字列入了弹劾的名单中；因为魏阉对他特别仇恨，因此在上疏中将他列为被弹劾的七人之首，诬陷他贪赃，把他关

入了诏狱，并抄没家财。在狱中，狱吏们以毒刑逼供，并厉声骂道：“你还能再骂一句魏上公（魏忠贤）一丁不识吗？”最终，45岁的周宗建竟以接受熊廷弼13000两贿银的莫须有罪名，于天启六年（1626）六月十七日被活活地打死在狱中。

周宗建死后，魏忠贤一党继续加紧追赃，与周宗建相亲近的蒋英因为代他交纳，也被定罪，革去了官职。

周宗建有6个儿子，其中原配申氏所生的廷祚、廷祉、廷禧住在吴江，其余3个儿子为侧室所生，住在北京。周宗建被害后，“家人子俱鸟兽散”，3个小儿子分别由各自的母亲携带逃亡；廷祚与弟弟则流离在外。

崇祯帝登基后，肃清了魏忠贤的阉党，崇祯帝下诏赠周宗建为太仆寺卿，并荫封他的一个儿子做官。周宗建的遗孤由宋氏、韩氏分别抚养；周廷祚则进京告御状，为父亲复仇，拒万金之贿、“一第”之诱，务必要让郭巩受到严厉的惩处。最终，郭巩因“为魏忠贤报首参之仇，致周宗建有速死之惨”，被处以“拟辟”（拟判死刑）。南明福王时，周宗建被追赠谥号“忠毅”。

周宗建为人正直，他在家乡时，见民生凋敝，便忧思难忘，曾作《吴农叹》诗一首：

田家终岁勤耕作，获稻秋成未为乐。
民间粟少官廩多，辛苦农人食藜藿。
半年犹自苦饥寒，况乃天灾水为虐。
赋税东南尽入边，征输岂问年丰恶。
司牧年年见岁丰，老农日日填沟壑。
吁嗟皇天岂不仁，饥寒犹作中土民。
边城白骨收不得，何如力作沧江滨。

周宗建著有《论语商》2卷，《四库全书总目》收录；此外还有《周忠毅公奏议》4卷行世。

里人陈基在《周忠毅公玉印》一诗中赞道：“逆麟披逆豎，堂堂忠毅公。貂珥为动魄，肝胆何其雄。慷慨尽臣节，浩气归太空。一百八十载，青史留英风。”直到二十世纪初，盛湖公学的校歌中还唱道：“宗建与孟硕，流风余韵今尚存。豪侠秉血性，节义贯古今。”

附录：

《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周宗建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尚书用曾孙也。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武康知县，调繁仁和，有异政，入为御史。

天启元年，为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开诗教、赵兴邦乱政罪，并诋李三才、王图。时辽事方棘，上疏责备辅臣。无何，沈阳破，宗建责当事大臣益急，因请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已，论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当信奸人刘保，辅臣刘一燝不当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杨镐、李如楨，宗建为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论数与东林左。会是岁冬，奉圣夫人客氏既出宫复入，宗建首抗疏极谏，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仪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王圣、朱娥、陆令萱之覆辙，可为殷鉴。”忤旨，诘责。清议由此重之。

明年，广宁失。廷臣多庇王化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为剖两人罪案，颇右廷弼，诸庇化贞者乃深疾宗建。京师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谓阴盛阳衰之征，历陈四事：一专讥大学士沈紘；一请宽建言废黜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当因此罗织朝士，阴刺兵部尚书张鹤鸣、给事中郭巩；一则专攻魏进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窔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嚙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构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进忠者，魏忠贤故名也。时方结客氏为对食，廷臣多阴附之，其势渐炽，见宗建疏，衔次骨，未发也。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不从。巡视光禄，与给事中罗尚忠力剔奸弊，节省为多。寻请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诘责。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悦。

给事中郭巩者，先以劾廷弼被谪。廷弼败，复官，遂深结进忠。知进忠最恶宗建，乃疏诋廷弼，因诋朝廷之荐廷弼者，而宗建与焉。其锋锐甚，南京御史涂世业和之，诋宗建误廷弼，且误封疆。宗建愤，疏驳世业，语侵巩，抉其结纳忠贤事。巩亦愤，上疏数千言，诋宗建益力，并及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辈数十人，悉指为廷弼逆党。宗建益愤，抗疏力驳其谬，且曰：“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皆坏封疆之人也；元诗教力主催战，赵兴邦贿卖边臣，皆误封疆之人也；其他荐维翰、荐镐、荐应泰、化贞者，亦误封疆之人也。巩胡不一击之，而独苛求廷弼，且诋荐廷弼者为逆党哉？”当是时，忠贤势益盛。宗建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贤，略言：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阱陷之。

巩又因臣论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异处，肉饱鸟鸢，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惨也。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公灭理，且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辈，谓尽安党。请陛下穷究安死果出何人倾害，则此事即进忠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即此可为证据矣。

先朝汪直、刘瑾，虽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非久即败。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斥矣，邹元标、冯从吾罢矣，文震孟、郑鄞逐矣，近且扼孙慎行、盛以弘，而绝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举朝各爱一死，无敢明犯其锋者。臣若尚顾微躯，不为入告，将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辈为典兵示威，而又有巩辈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进忠益怒。率刘朝等环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奏益侃直。进忠议廷杖之，阁臣力争，乃止，夺俸。

会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进忠、巩，巩复力诋诸人。诏下诸疏平议，廷臣为两解之。乃严旨切责，夺巩、宗建俸三月。是时，刘朝典内操，遂谋行边。廷臣微闻之，莫敢言。宗建曰：“巩自谓未尝通内，今诚能出片纸遏朝，吾请为洗交结之名。”巩噤不敢发。宗建乃抗疏极谏，历陈三不可、九害。会朝与

进忠有隙，事亦中寝。其冬出按湖广，以忧归。

五年三月，大学士冯铨衔御史张慎言尝论己，属其门生曹钦程诬劾，而以宗建为首，并及李应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明年以所司具狱缓，遣缇骑逮治。俄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毒讯。许显纯厉声骂曰：“复能置魏上公一丁不识乎！”竟坐纳廷弼贿万三千，毙之狱。

宗建既死，征赃益急。其所亲副使蒋英代之输，亦坐削籍。忠贤败，诏赠宗建太仆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卜舜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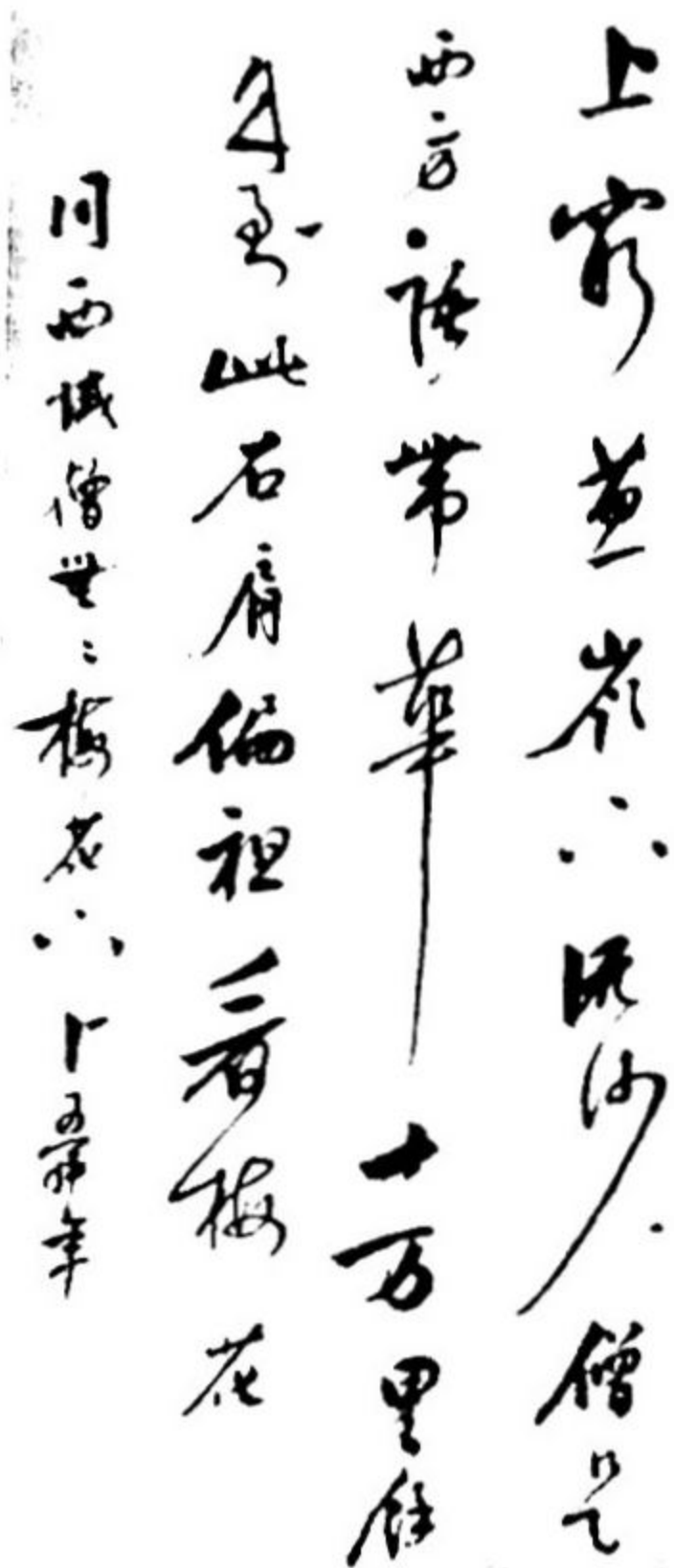
卜舜年（1587—1620）字孟硕，号野水，明朝书画家，负才傲世，人皆称之奇士。他是盛泽最负盛名的才子，虽然“名声终不出州里”，但极受后人敬重，世代有人凭吊其故居。盛湖别称“舜湖”，即是后人对卜舜年的纪念。

卜舜年之父卜梦熊，字仲登，别号景川，明嘉靖十五年（1536）生于盛泽。卜梦熊自幼聪慧，十岁时已无书不读，善辞赋，能“倚马千言”。曾参加制科考试，但屡试不第，他翻然浩叹说：“我何必循规蹈矩，做一条书中的蠢虫呢？”于是投笔击剑，习骑练射，万历元年（1573）参加武举考试，连续三次夺魁。中武举后，他慷慨散金，常与四方敢死之士一起出猎，身跨骏马，腰挟宝刀，射空中苍鹰，原上狡狐；入夜，与客谈兵，“天下大势，如运于掌”。

甲戌年（1574），卜梦熊参加会试，考官读了他的卷子，连连叹息：“真是天下奇才，可惜策语过激！”竟不敢将他的卷子进呈。卜梦熊闻讯后，慨然说：“我不受功名的羁绊，可以遍观天下形势！”于是他策马遍游四海，东距鸭绿江，北至碣石雁门，西抵榆林套地，凉州宁夏，几达河源沙海。每次视察形胜，他务必审测军队的强弱，指点古来兴亡。军中的将校素慕其名，迎请他至上座，健儿击着羯鼓，吹着长笛，军中妇



卜舜年像



卜舜年书法

女脚穿绣袜，身着胸甲，舞蹈向前，为他祝福。酒酣耳热之际，他挥笔作书，并被镌刻于石柱。临别之时，都督朱公、参将袁公拿出名马宝刀相赠。之后又策马向南，渡河入洛，东还邹鲁，逆江流，历匡庐，过三峡，入剑阁，辗转浙江、福建，才尽兴而归。

卜梦熊回到盛泽后，立志杜门著书，有《晚香亭集》10卷、《武经髓》诸小说、《防倭防国志》、《古今陈变兵变》等行世。此外，他还善画，“岩壑飞动，画理入妙”。卜梦熊醉心于地方风物，经常驾小艇垂钓于盛湖，与当地诸文友诗词唱和，留下了众多诗文。

据乾隆《盛湖志》作者仲沈洙在《盛湖志序》中说，卜梦熊“曾辑《盛湖志》一卷，余不胜向往，及遍求终不可得。”虽然卜梦熊的《盛湖志》已成轶文，但他所撰写的《盛川题景记》和《盛湖八景诗》一直流传至今，成为盛泽人了解家乡历史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卜梦熊的故居名为“石林西墅”，“在大适圩斜桥左”，大概位于如今的中和桥东堍一带，院中有一亭，名“晚香亭”，“叠石引泉，名花满径”。在他的石林西

墅里，“白袷缙衣（指没有功名的士人）日盈座也”，而“执贄（拿着礼物）来者，虽王侯千金，必峻拒。”卜舜年在《晚香亭小集》诗中说：“芙蓉照盛湖，风起寒潮打。归禽点枯林，残阳半屋瓦。中有晚香亭，琴书列闲雅。橘柚垂前槛，鞠花围四野。主人供巨螯，新酒甘如蔗。我为黄衫客，坐皆知己者。向嗟面会难，今忻臂相把。客性不能饮，而可十石也。”

卜梦熊倦游归里后，家中的一株已经枯萎的桂树，忽然重新开花，不久，他的长子舜年出生，故而舜年的小字名“桂”。那一年，卜梦熊已经52岁，在他60岁时，又生下了次子皋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卜梦熊含笑而逝，享年66岁。

卜舜年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父亲家教甚严，从小就要他咬菜根，令他抱薪、牧羊、洗涤溺器，历练心志，让他日后习惯于蔬食，适应艰苦的生活；又令他足不出户，闭门读书，学习诗书绘画。

盛泽南郊有一处地方，名为龙庵厂（古龙庵）。传说，明朝名士朱之番出生于盛泽东肠圩，后迁江宁（南京），并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高中乙未科状元，官至吏部侍郎。他早年居盛泽时，曾借住于古龙庵中读书，“古龙庵”三字匾额就

出自他之手。少年时代的卜舜年也曾读书于此，曾作诗《读书龙庵厂》：“僧寮明敞我参居，薏饭蒿汤好读书。恢复龙庵千载后，卷舒乌阵夕阳余。关深地险无人到，僧老心空我不如。身外徒萦过去事，讹言清救墨兵除。”

卜梦熊晚年卧病，在病榻上仍不忘教诲舜年：“乃父此生不能见用于朝廷，但赤心历历，夜可对天。我视公侯如竖子，见富贵若淖污，你将来一定要坚持乃父的气节！”还常说：“山水灵物，丹青贱役。不解画俗，卖画俗，吾游戏自娱而已。”教育舜年要以造物为师，切勿以卖弄技巧为能事。

卜舜年少负雋才，人皆视为神童。父亲去世时，他才15岁，居丧三年后，以秀水籍赴嘉兴参加童子试。秀水知县颜欲章看了他的卷子，赞道：“旁若无人，奇士奇士！”当即将他圈定为第一名，补诸生。他去谒见颜欲章时，颜公大加赞赏，认为他居于乡间，未免见闻狭隘，可到嘉兴来拜师求学。于是，卜舜年负笈来至嘉兴，寓于东塔寺的一间废房中，虽然楼无窗棂，梯级不全，但他青灯一盏，天天攻读到夜半。

有一次，松江名士陈眉公（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到东塔寺相访，见卜舜年如此苦读，惊讶不已。他连读了数篇卜舜年的文章，感叹道：“你真是天下的奇男子啊！如此劲骨，如此灵思，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几天后，陈眉公把卜舜年请到自己家中，恳切地对他说：“你读书数年，不过才涉猎到文采之末，你万不可画地自封！”之后，又传授他河图洛书讖纬支干营阵之学。后来，颜欲章迁往北方，陈眉公也回转松江，于是卜舜年返回了盛泽家中。

此时，卜舜年的家已迁至河的对岸，名为绿晓庄。他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乡人皆恶，国士无双。”又借用了唐代诗人皮日休的两句诗，在他的书斋“绿晓斋”前书一对联：“濯足须加汉光（东汉光武帝刘秀）腹，抵掌欲捋梁武（梁武帝萧衍）须。”口气之大无以复加，足见他傲视一切的狂放和不凡的气概。

卜舜年才思敏捷，雄视千古。“诗学孟东野（唐代诗人孟郊），别具生趣；又擅字画，兴至时作书作画，烟云乱点，飒然风生。”每当月明之夜，他“往往兀坐树下想象烟林，达晓不寐”，因而他运笔作画磅礴淋漓，如有仙气。对于他的书画，松江的陈眉公（陈仲醇）、董元宰（董其昌，明代著名书画家）都十分推重。

卜舜年与邑中文友常相过往，吟诗答对，分韵酬唱，尤其与震泽庄汝培相友善，过从甚密，颇多酬和之作。《诗粹》称“卜敏捷，庄陈著，两人互相誉也。”有一次，卜舜年到黄家溪拜访好友潘一桂，卜舜年出一对子：“白漾湖边雪白，白鸡啼白昼。”潘一桂答道：“黄家溪上蜡黄，黄犬吠黄昏。”随后，二人拊掌大笑。

后来，他又去苏州拜国工（技艺特别高超之人）张怀仙为师，学习吴歙（吴

地一带对民歌、散曲),“摹尽其妙”。逢良辰美景,他登台献技,玉喉一发,如珠如玉,犹如凉风在树,残照在夜,听者为之动容掩泣,他也十分快意。

卜舜年虽然才高八斗,但参加科举考试时却一再失意;于是,他效仿屈原的《楚辞》作《滔滔》之章:“东联淄文兮南络沅湘;黑者错白兮弱者间强;灾既陷于入坎兮,害乃基于剥床;商羊之马舞兮,安睹鸾凤之跑跑;固帝心之欣祸兮,亦今俗之好殃!”从中可见他的愤世嫉俗之意。

卜舜年负才傲世,举止怪诞。有人以重金求他的书画,每遭拒绝;而对于贫者,他却以画相赠。每次出门,他总是抬眼望天,不视旁人;“常于暑月,首挽高髻,身穿大红色布袍,跣足(光着脚)行歌于市中。所用障面(折扇的别称,古人常用以遮掩面孔)长三四尺,而袖小,盖仅方广数寸。”时人都把他视为怪人、狂人。

卜舜年还“性喜视鬼,每于阴云晦月之夕,独至荒冢中露宿,冀得一遇。”他又在绿晓庄的后园内建了一个楼,作为他的修仙处。虽然这里有“白杨绕舍,寒影微芒”,“危楼一角依倚空,隐隐飞鳞射眉妩”,景色颇为秀丽,但他却给这座楼起了个奇怪的名字:“望鬼楼”。

卜舜年喜与奇人怪才为友。当时,东郊坐字圩程林村(今兴桥村)的洞真宫有一位道士苏蓬头,“善吐纳之术,能旬日不食,啖则数升。夏不设蚊帐,冬卧积雪中,或浴于河,人皆称为仙。”但是苏蓬头常常蒙首垢面,不甚自重,故而当地人又把他当作怪人,唯有卜舜年视他为“上品真仙”,对他“敬执弟子礼”。卜梦熊曾赠苏蓬头楹帖:“三千年桃花开,五百里贤人至。”卜舜年也曾写下了《洞真宫赠苏蓬头》诗:“散发蓬头一废人,荒天鸟兽与相亲。风雷碾磕飞真气,霜月孤明映此身。乱斩群魔非仗剑,常留本性似怀胎。知君姓氏题天籍,我亦思从作帝臣。”

有一次,卜舜年与苏蓬头密谈了一晚,“得秘旨,归而大哭,悔向者之多迷谬也”。卜舜年死的那天晚上,苏蓬头正与汤真常、仲绍康夜话,忽瞿然而起,说:“舜年去矣。”二人疑信未定。第二天早晨,二人去看望卜舜年,发现他果然已亡,而且连死的时辰都不差分毫。几年后,苏蓬头外出云游,不知所终。

有一个山东人杉杉子,年约二十三、四岁。此人自少学禅,因听说吴江卜舜年“聪明绝类,不禅而仙,意欲度之”,故而不远千里来盛泽,在目澜庵与卜舜年相见。过了一天,杉杉子的父亲追至盛泽,杉杉子对父亲说:“儿已绝意人间,负阿父阿母,儿不返矣。父有财,何患无儿?父归第,散粟帛,遣奴婢,斋持佛号,便是当倚闾之望矣。”一天晚上,杉杉子与卜舜年共榻而眠,“阖户息火,负衣抵足”。杉杉子“徐言来意,盛称仙学之谬”,再三相劝,而卜舜年则“负气坚拒”,两人争执不下,至夜半放声大哭,声彻户外。后来卜舜年稍稍合眼,待醒来时,发现

杉杉子已不知去向。第二天早晨，到他父亲下榻处询问，亦不知何往。其父无奈，只得离去。事后，卜舜年每每想起了杉杉子，便涕泣不已。

这些发生在卜舜年这位奇人身边的奇事，真所谓“神龙见首忽藏尾，迹自离奇人自高。”令人慨叹不已。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卜舜年因患瘵疾（多指癆病）而死，年仅34岁。在病中，卜舜年自知“寿且不永”，乃自作《墓志铭》。“临没之年”，凡有人向他乞画，他在画上但题三字“泥无身”。卜舜年死后，“远近传为仙去”，并将他“比于唐之李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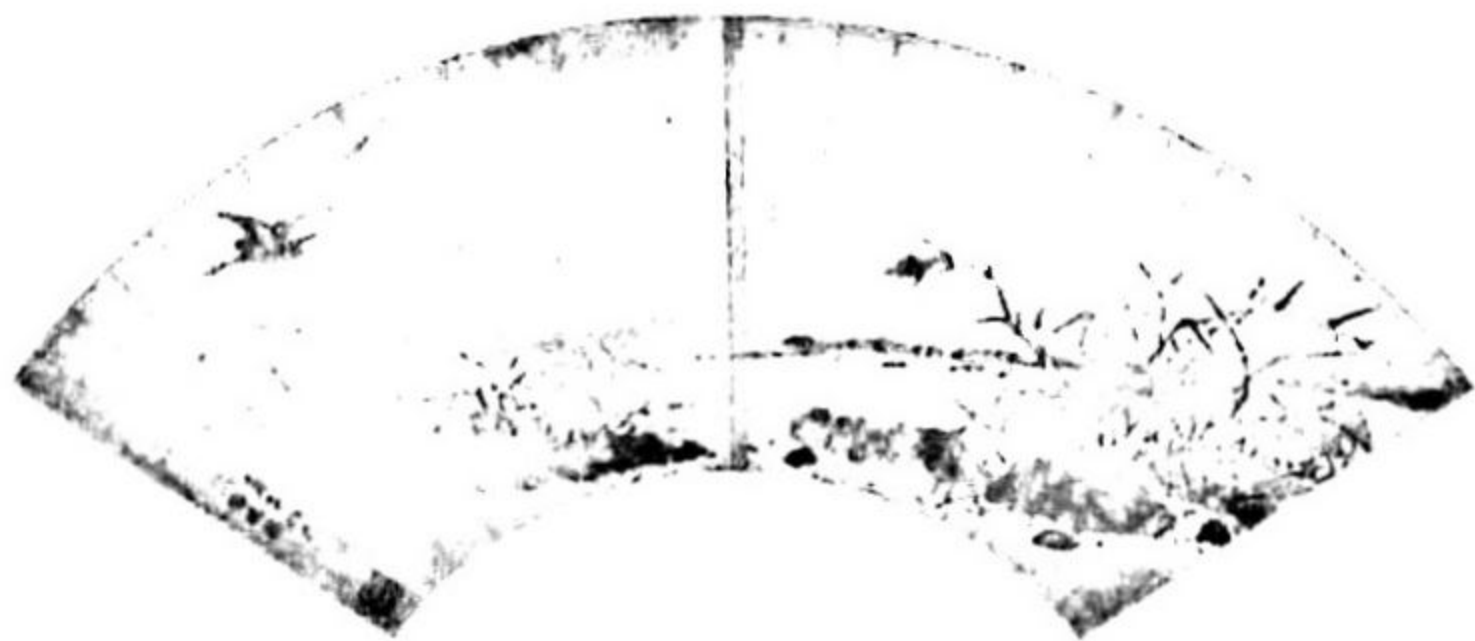
卜舜年一生著述颇丰，有《绿晓斋集》、《石林西墅遗稿》等行世，还有不少书画作品传世。卜舜年虽然志气俊爽，为诗文天趣甚高，却不循矩度，故而终其一生“名不出州里”。钮琇在《觚剩》的《泥无身》一文中，评价卜舜年的作品是“诗歌诞率，不拘绳律”。

卜舜年的高才畸行，不仅受到同时代文人尊重和赞誉，也极受后人的敬佩，世代有人去凭吊他的故居，对他评价甚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在明朝与后金军队的辽东萨尔浒战役中，杜松与刘綎不幸丧师，卜舜年闻听后悲愤不已，乃“赋长谣千余言”，讽刺当时主持辽东防务的辽东经略杨镐。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称赞卜舜年“其雄才直气尽发泄于是篇”。

卜舜年的友人潘一桂在《过卜孟硕旧居》诗中写道：“不忍问幽琴，情来涕不禁。残灯哀棹冷，古屋暗尘深。有客求遗迹，无儿续苦吟。乡园一抔土，凄惻故人心。”诗人陈尧德有诗《寄怀卜孟硕》：“吴楚江为限，悠悠两袂分。如何九峰月，不共五湖云。病久诗无力，思多酒易醺。夜来贪一睡，为有梦随君。”

潘一桂在《募葬卜孟硕茂才疏》中说：“问才于今，吾必以孟硕为第一焉。其气豪上，谓一第可以俯首拾，而夷然不屑也。于是聪明之所溢放，而为词赋，为书画，为度曲。又放而求神仙，至于学仙不成，卒以病死。死十年久矣，而流风余韵沁人耳目间而不可去。三吴数百里间，称诗者，师其宫商之位；徵歌者，师其抗坠之节；



卜舜年扇面

临池而染翰者，师其挥洒槃礴之势。即残简断幅，人宝之为吉光片羽，濯濯矜视。至有燕缙楚风以微重贶者，亦可以窥孟硕之梗概矣。”对卜舜年可谓推崇备至。

清代诗人汤钟来寻访卜舜年故居时，绿晓庄已经衰败，他在《访卜孟硕古宅》中叹息：“烟锁云封访旧难，衡门无地可盘桓。长生术尽诗仙老，一任荒碑落照寒。抛残纬讖与河图，不辨当年旧酒垆。废寺只今空蔓草，吴歊还唱月明无。”

绿晓庄后来成为诗人清代诗人王奂的住宅，改名为“东皋草堂”，而当地老百姓却把它叫作王家庄，这个名字一直传到今天。王奂曾作《观卜孟硕先生画作短歌》：

山嵯峨，树模糊，天地无风水作波。
小米是其弟，大米是其哥。
身后声价重，世上犹珍旧画图。
画图虽好有时败，姓名表表传不磨。
先生有遗宅，住我年半百。
依稀庾宋当时迹，往往得看诗画册。
笔墨区区沈若新，惆怅斯人不复获。

诗中自注：“先生绿晓斋，余居几五十年。后人因名其地为王家庄。”

清道光十八年（1838）“里人设栗主（祭祀时所立之神主）于碧霞楼龛，奉香火，名“卜高士祠”，祀卜舜年。时人金作霖有《送卜孟硕先生栗主祀碧霞楼》诗：

一乡骚雅开生面，当代词宗托赏音。
服亦何奇才子气，过能自记圣贤心。
斋衰剩有集传世，命短还留名到今。
知己不嫌身后少，断缣残墨抵兼金。
俎豆罗陈礼拜初，古怀振触渺愁余。
异才叔世嗟无用，高士题名慨有馀。
落日一湖诗世界，秋坟四面鬼邻居。
卓锥地果吟魂托，差喜当年憾不虚。

当代大诗人柳亚子先生曾作多首《论松陵前辈》诗，其中第一首写的就是卜舜年：“痛哭辽阳战旧新，离忧憔悴屈灵均。我来绿晓庄前过，天地苍茫失此人。”可见他对卜舜年也是评价颇高。

盛泽的西白漾又名盛湖，卜舜年歿后，当地的文人墨客又将盛湖雅称为“舜湖”，以纪念卜舜年，到今天，“舜湖”已经成为盛泽的别称，以“舜湖”命名的社区、宾馆、工厂、商店比比皆是，可见卜舜年在盛泽的影响之巨。

在中国的卜姓宗祠中，有一副通用的对联：“诗传晋有夏；画题泥无身”。上联典出春秋末期时晋国的学者卜商（即子夏），他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死后，他到魏国去讲学，李克、吴起都是他的学生。下联典出卜舜年在画上的题款“泥无身”。可见，他在卜氏家族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卜舜年的弟弟皋年，字又硕，工辞赋、书画，“从其兄舜年游，兄歌亦歌，珠喉相续；兄绘亦绘，笔法可互”。因时人向卜舜年求画者众多，皋年常为兄代作书画，代作者十之八九，世莫可辨。他“弹棋弄笛，选禽养鱼，靡不通奥，惜早卒”，年仅 24 岁。

附录：

盛川题景记

盛川去邑治六十二里，西枕太湖，北环巨浸，南带横流，东通西浙，四水际也。《禹贡》谓“厥田下下，厥土涂泥”是已。蛟龙水患间作，而村地曲僻，远城邑、官道，兵燹不加，淫靡不入，争讼未起。宋元以来，夙言安堵。我朝九有甸奄，民俗淳庞，市弗贰肆，狱无典犯。男耕女织，用享二簋，屠日不能毕一豚，标枝野鹿熙如矣。成化初，具区陈先生聿起文运，吴南建帜，嗣有踵接硕儒名辅周恭肃公、史明古辈，风采朝野，增秀川岳，济济洋洋又如此矣。迨嘉隆间，日繁民齿，声文过昔，簧宫蜚声，骚墨游咏。七贤祠以镇东土，三元堂以拱西湖，五桥以锁奔流。峙碧霞而旋目澜，走洞庭而飞白马。引苕霅之水以入两湖，属两湖之水以归大海。清流激湍，奇树晴沙，出没氤氲，起伏蛟蜃，洵盛湖大观哉。前人有竹堂、凌巷、渔湾、野渡、划船、晓钟、夕照、晴市八景分著。世异风殊，废举靡一，余不敢弦辙，存为羊飨。若夫民俗淳庞，浸浸变矣，屠沽盈市，博讼日兴。下人衣纨绔，游子挟娼饮，云水优俳重为民蠹，兼以赋税之繁盈，官监门摊之增益，民亦苦于不支。《诗》云：“涓涓不塞，流成江湖。两叶不去，将用斧柯。”还淳去害，所望于今之贤侯，后之君子。

万历甲申六月望前二日，卜梦熊撰

盛湖八景诗

卜梦熊

一、五桥晴市

近水楼台蓬岛中，上有神仙驾彩虹。
饮水长鲸横日落，卧波飞栋跃春空。
梧桐客醉金樽月，杨柳人歌纨扇风。
题柱漫应夸驷马，相如辞赋动临邛。

二、竹堂古祠

竹堂祠畔水声哀，此日登临愧劣才。
野庙残春啼杜宇，古碑无字绣苍苔。
清风高节余禾黍，白骨埋香半草莱。
圣代只今崇祀典，何当洪澳葺层台。

三、圆明晓钟

古刹嶙峋曙色青，珠林钟动叶俱零。
未飞楚岫惊神女，只促吴山灼晓行。
估客樯帆穿树杪，渔人网罟下寒汀。
三千沙界眠醒半，百八声分一卷经。

四、目澜夕照

鳞鳞斜日烁寒汀，朵朵丹霞飞洞庭。
客坐竹间皆散发，鹤归树杪并梳翎。
疏篱泊艇悬鱼网，西阁排窗曝蠹经。
莫讶阳乌暂辞去，东山白月更清冷。

五、西湾渔舍

结茅湖上面芙蓉，蒔木成蹊远市东。
出网鱼肥桃叶渡，隔篱犬吠豆花风。
钓滩日借群鸥宿，津路时容一鸟通。
天际欲浮沙草绿，回看归艇夕阳红。

六、东漾划船

菱叶渡头新水生，健儿鼓柁柳鸣鸣。
药师倾雨天瓢上，昌黎攀汉龙背行。
扬旌江面鼉鼉遁，代鼓渊底蛟蜃惊。
长沙有赋而今在，湘水茫茫不尽情。

七、龙庵待渡

古刹盘云卧法龙，断虹新涨伫行踪。
天分匹练并刀剪，地拥金莲贝叶封。
春雨一蓑迟餍妇，夕阳两岸未归农。
西岩野老商家楫，引鹤闲来策短筇。

八、凌巷寻芳

石磴盘纤路几回，小车花外载新醅。
鹿眠香径迷兰茝，鸟啄晴沙破藓苔。
两屐芳云随去住，一瓢新月共徘徊。
少陵不厌探幽事，抱得瑶琴日日来。

绿晓斋社叙

卜舜年

绿晓斋，居松陵之盛湖，鸣禽游鱼，疏花拳石，予先子诗社、酒社表于往昔。余最不肖，闵凶（父亲亡故）幼作，家运倾圮，堂构毁散，绿晓片室，仅存羊飨。向以昭苏，今以尘隘；向以诗酒，今以文艺；岂将云善继善述者耶？按，盛川属浙（浙江）直（南直隶，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界，地僻才寡，未可挈隆通大都；故比邻土著，十又六人，而游寓遥借者，十又一人；或壮或孩，或已效，或未试，偶相飘聚，如萍如梗；琐琐凑积，如竹头木屑。要皆吐性灵，见道理，言人人殊，人言言各，当旗一竿，鼓一架，以植彩三吴，动声四海，无庸庸观听也。”

（节录，全文见《绿晓斋集》）

盛湖古意

卜舜年

天源裂地维，谷风改天颜。
片舟若枯蚌，巨浪如活山。
颠播盛湖中，吾神清且闲。
强如众人心，平陆起波澜。

晨到圆明寺

卜舜年

寺扉侵早启，照日壁逾红。
鹤鹤沐松露，房廊穿竹风。
僧跣双足稿，客到万缘空。
况复无羁勒，支公神骏同。

柳如是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字影怜，号蕙君；后改性柳，名隐；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之句，故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因佛典中有“如是我闻”之语，而号“我闻居士”；为明末时名妓，“秦淮八艳”之一，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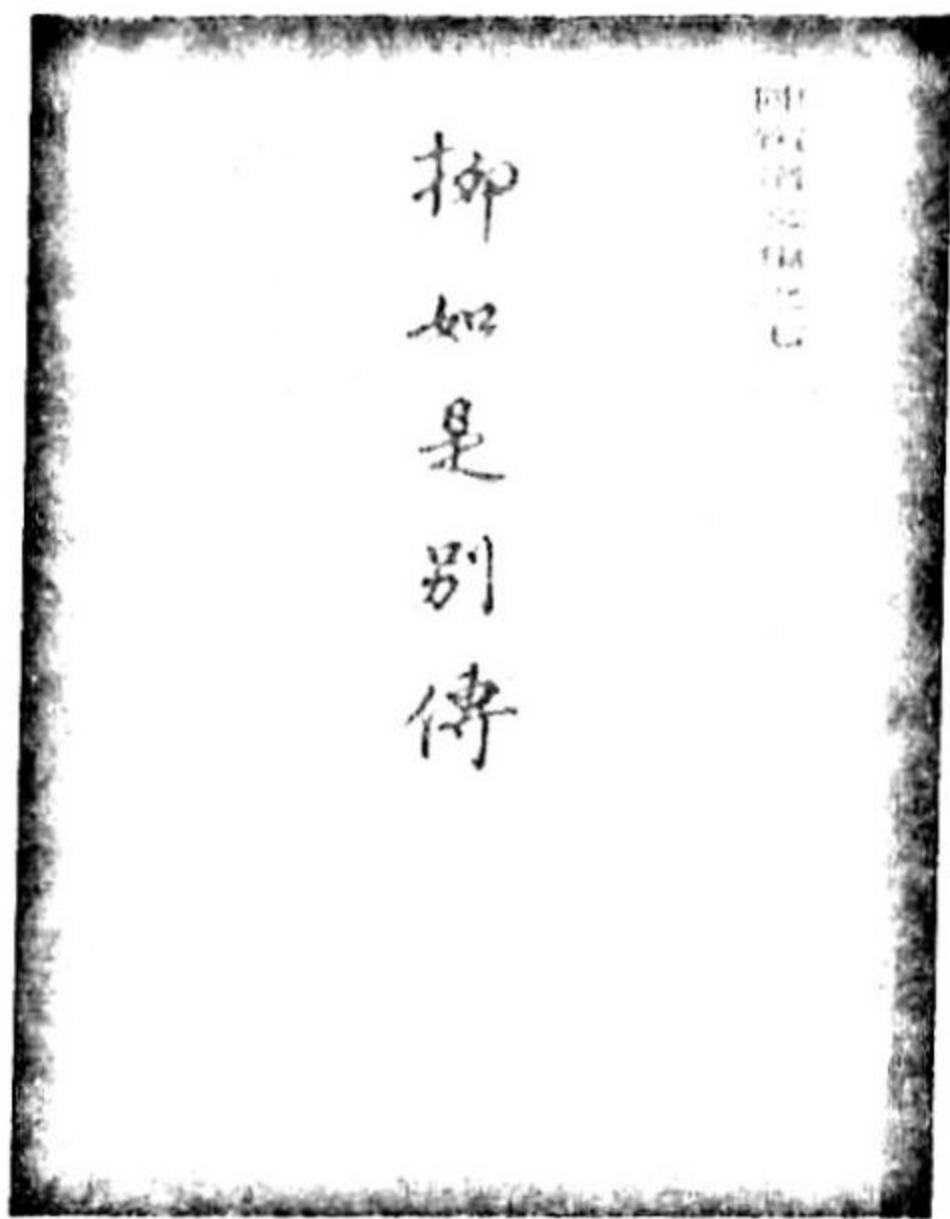
柳如是祖籍嘉兴，生于盛泽，幼年时被卖到盛泽终慕桥（即百嘉桥，在先蚕祠右侧，宋孝子柏深山创建，俗称柏家桥）北堍的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中作养女。

徐佛，字云翮，小字阿佛，原籍嘉兴，随母迁居至盛泽归家院。她不仅擅长弹奏多种丝竹乐器，还能吟诗作画，尤其善画兰草，声名极著。柳如是在她的培养和熏陶下，学习琴棋书画，才艺日进。

后来，柳如是被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周道登家买去，在周母房中当侍婢。周道登是吴江人，罢相归家后，见柳如是伶俐聪明，便亲自为她传授诗词书画文章音律，与之谈古论今，奠定了她的学识修养。周道登对柳如是的特殊宠爱，遭到了众妾的嫉恨；之后柳如是被诬与男仆私通，几遭杀身，幸得周母怜惜，才免于一死，被逐出周家，再次流落青楼，来到松江。



柳如是像



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虽然有超人的才情，心比天高，但是她的地位却是最为低下的妓女，这就注定了她难有常人的命运，在婚姻的道路上必然要颠簸一生。

在松江，柳如是结识了“云间（松江的别称）三才子”之一的宋辕文。柳如是才情横溢，或浅唱低吟，或高谈阔论，或袖舞回风，或即席分韵，都让宋辕文倾倒。他决心娶柳氏为妻，但柳如是对他的话却是将信将疑，于是决定试一试他的诚意。“如是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是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柳如是别传》中语）宋辕文闻言，不顾天寒，果真跃入水中，两人“由是情好遂密”。

宋母听说儿子欲娶妓女为妻，怒不可遏；宋辕文辩解说，柳如是并没有索要钱财，宋母更怒，说：“财算什么，她不要你的钱，却要你的命！”在母亲的干涉下，宋辕文逐渐疏远了柳如是。不久，松江知府方岳贡下令清理流妓，柳如是找来宋辕文，希望他出面将自己留下，宋辕文想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姑避其锋”。柳如是听了，凄然地说：“别人这样说也就罢了，你却不应如此。从此以后，我与你恩断义绝！”说完，她举刀向桌上的七弦琴砍去，铿然一声，琴弦根根断绝。

陈子龙是松江的名士，“几社”的领袖，为“几社六子”之一，风流倜傥，才气超人，在晚明时节的党社中极负声望。柳如是与文人名士交往时，常自称为“弟”，初时陈子龙不以为然，柳如是便当面诘问：“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陈子龙闻言大惭，从此，两人开始了文墨之交，品评天下大事，切磋诗词艺文，惺惺惜惺惺，关系日渐亲密，不知不觉地坠入了情网。

崇祯八年（1635）春，陈子龙背着家人，与柳如是同居于松江南门内的南楼，常和“几社”的名士们吟咏游宴于南门外的陆氏南园中。柳如是将南楼称之为鸳鸯楼，并把这段时间里写的词集命名为《鸳鸯楼词》。在此期间，陈子龙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春日早起》：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
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诗中的“红楼梦”三字，有人认为就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书名来源。

由于陈子龙的夫人张氏掌握家政大权，难容柳如是独立门户，而柳如是又不愿作侧室小妾，遂于此年秋天毅然离开了陈子龙，移居于松江的横云山麓。不久，她重返归家院，经常往返于江、浙之间，与文人雅士相交往。

柳如是虽然与陈子龙分了手，但他对这一段情分依依难舍，曾一气呵成写出了洋洋洒洒的二十阕《梦江南·怀人》，逐一追忆“画楼”、“棠梨”、“鹭鸶洲”、“木兰舟”等景物。前十首以“人去也”为首句，后十首以“人何在”为首句，低回倾吐，字字深挚，眷恋之情和怀人之苦，如泣如诉。

人去也，人去凤城西。细雨湿将红袖意，新芜深与翠眉低。蝴蝶最迷离。
 人去也，人去鹭鸶洲。菡萏结为翡翠恨，柳丝飞上细箏愁。罗幕早惊秋。
 人去也，人去画楼中。不是尾涎人散漫，何须红粉玉玲珑。端有夜来风。
 人去也，人去小池台。道是情多还不是，若为恨少却教猜。一望损莓苔。
 人去也，人去绿窗纱。赢得病愁输燕子，禁怜模样隔天涯。好处暗相遮。
 人去也，人去玉笙寒。凤子啄残红豆小，雉媒骄拥袂香看，杏子是春衫。
 人去也，人去碧梧阴。未信赚人肠断曲，却疑误我字同心。幽怨不须寻。
 人去也，人去小棠梨。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门外柳相依。
 人去也，人去梦偏多。忆昔见时多不语，而今偷悔更生疏。梦里自欢娱。
 人去也，人去夜偏长。宝带怎温青鬓意，罗衣轻试玉光凉。薇帐一条香。
 人何在，人在蓼花汀。炉鸭自沉香雾暖，春山争绕画屏深。金雀敛啼痕。
 人何在，人在小中亭。想得起来匀面后，知他和笑是无情。遮莫向谁生。
 人何在，人在月明中。半夜夺他金扼臂，殢人还复看芙蓉。心事好朦胧。
 人何在，人在木兰舟。总见客时常独语，更无知处在梳头。碧丽怨风流。
 人何在，人在绮筵时。香臂欲抬何处坠，片言吹去若为思。况是口微脂。
 人何在，人在石秋棠。好是捉人狂耍事，几回贪却不须长。多少又斜阳。
 人何在，人在雨烟湖。篙水月明春腻滑，舵楼风满睡香多。杨柳落微波。
 人何在，人在玉阶行。不是情痴还欲住，未曾怜处却多心。应是怕情深。
 人何在，人在画眉帘。鸚鵡梦回青獭尾，篆烟轻压绿螺尖。红玉自织织。
 人何在，人在枕函边。只有被头无限泪，一时偷拭又须牵。好否要他怜。

柳如是以绝世之才，作此伤心之笔；而在悲伤之中，又透露出内心的坚强。

柳如是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而陈子龙也在柳如是离开松江重回盛泽之后写了双调《望江南·感旧》一阙：

思往事，花月正朦胧。玉燕风斜云鬓上，金猊香烬绣屏中。半醉倚轻红。
何限恨，消息更悠悠。弱柳三眠春梦杳，远山一角晓眉愁。无计问东流。

《望江南》即《梦江南》（后因白居易依此调作《忆江南》三首，首句为“江南好”，故而《望江南》又名《江南好》、《忆江南》），“怀人”亦与“感旧”同义；柳如是的《梦江南》二十阙为原唱，而陈子龙的双调《望江南》乃和作。两人所赋之词互相关涉，而《望江南》与《梦江南》两词中的“南”字，其实是暗指陈、柳二人同居时的南楼和游宴时的陆氏南园。两人词中所“梦”所“望”之地，所“怀”所“感”之人，可谓语语相关，字字有着矣。

柳如是“性机警，饶胆略”、“豪宕自负，纵荡不羁”。她被逐至松江后，常身穿儒服，与当地“几社”的诸文人平起平坐，纵谈时势，随相唱和，并以友朋兄弟相称。她的绝世才貌，赢得当地名流的瞩目，同时在与松江的高才名辈们频繁交往的过程中，她的才艺愈益精进，思想也日趋成熟。

当时，东林党领袖、“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常熟虞山钱谦益（1582—1664）名重天下，柳如是深慕钱谦益的学识和才华。崇祯十一年（1638），钱谦益罢职归乡，在杭州西湖荡舟闲游时，落脚在名妓“草衣道人”王修微家中。当时，恰逢柳如是也客居杭州，还是“草衣道人”门上的常客，那天，柳如是正好有一首游湖时即兴而作的小诗搁在了“草衣道人”家中。钱谦益无意中发现了那帧诗笺：

垂杨小苑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
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钱谦益乃诗坛首领，见此诗写得清丽别致，十分喜欢，尤其对其中“桃花得气美人中”一句赞赏不已。当他得知此诗为柳如是所作时，不禁诗兴大发，随即步原韵和诗一首：

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
近日西冷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

第二天，在“草衣道人”的引见下，柳如是与钱谦益得以相识。柳如是虽然与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初次见面，却毫无拘束之态，他们一起泛舟西湖，煮酒烹茶，谈诗论景，随心所欲，格外尽兴。

崇祯十三年（1640）冬，柳如是穿着男子的儒服，幅巾方鞋，乘一叶扁舟到常熟半野堂拜访钱谦益。此时的钱谦益从礼部侍郎任上削职归乡已经两年，门庭久已冷落，见到精神洒脱、仪度闲雅的柳如是一身男装专程来访，不禁大喜过望。柳如是赠钱谦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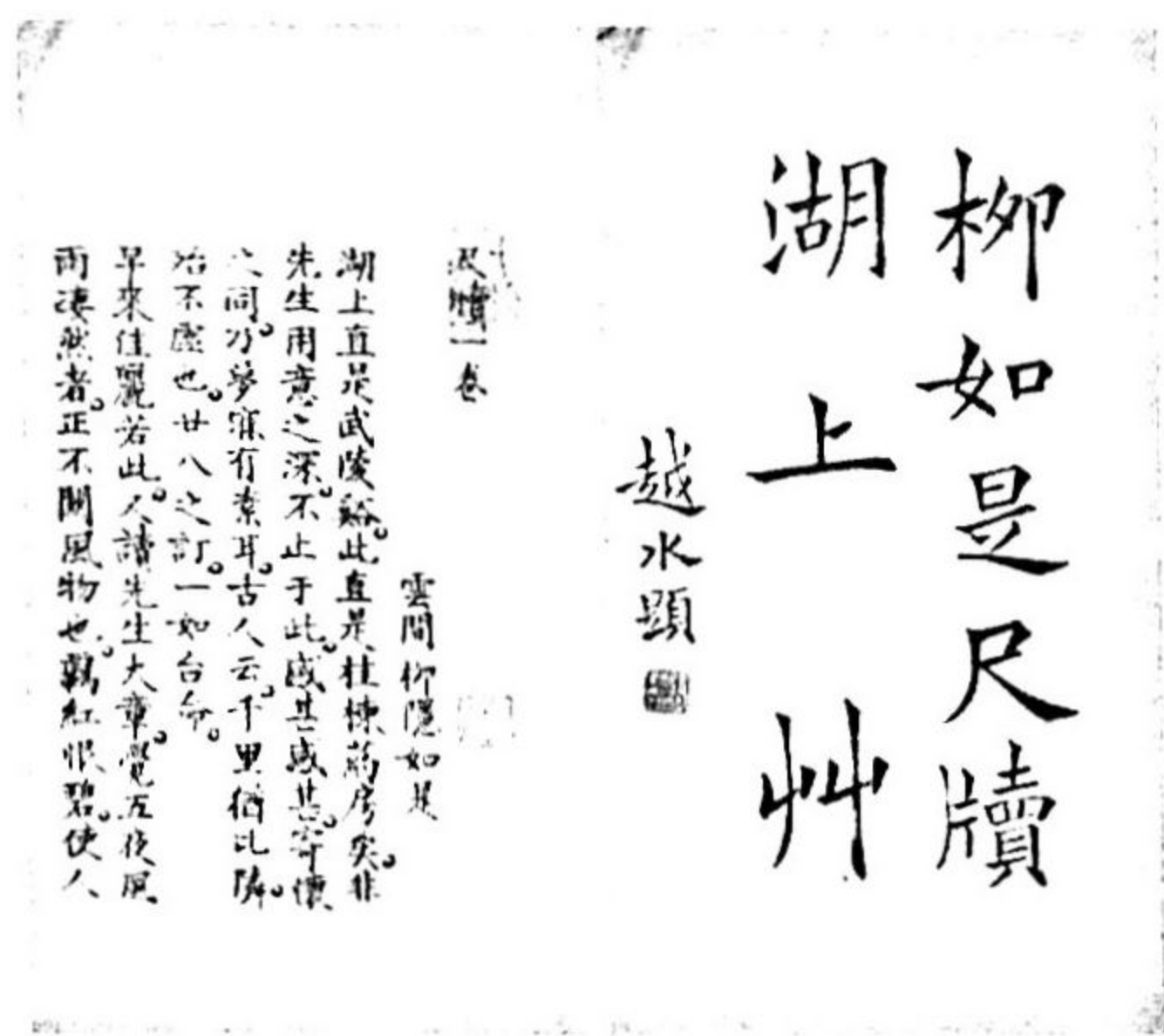
《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七律一首：

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
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
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
今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

诗中把钱谦益比做东汉大儒马融，而风流儒雅更在马融之上。钱谦益也回了一首诗《柳如是过访山堂枉诗见赠语特庄雅辄次来韵奉答》：

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
枉自梦刀思燕婉，还将抔土问鸿蒙。
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
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

钱谦益把柳如是比做私奔的文君，又用了章台、王昌等典故，聪明的柳如是岂有不明之理。她敬钱谦益学识渊博，钱谦益怜爱她出淤泥而不染，因为这一敬一爱，于是一段忘年之恋揭开了序幕。钱谦益留柳如是在半野堂小住，二人一同



柳如是诗文集



柳如是男装像（清乾隆年间余秋室绘）

踏雪寻梅，寒江垂钓，诗词唱和，相处得锦瑟和谐。柳如是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吾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钱谦益则答道：“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吾非能诗如柳者不娶。”

崇祯十四年（1641）6月，60岁的钱谦益正式迎娶24岁的柳如是为妻，虽然钱谦益家有嫡妻，却公然对柳如是“礼同正嫡”，还别出心裁，在一条华丽的画舫上举行了婚礼。婚后，这对老夫少妻相携出游名山秀水，钱谦益对柳说：“我爱你白的面、黑的发。”柳如是说：“我爱你白的发、黑的面啊！”此后，钱谦益还“挥霍万金”，在虞山东麓为柳如是建造了一幢“绛云楼”，并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居室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

柳如是的名字。钱谦益的这一番举措，遭到了当地绅士们的哗然抨击，“琴川（常熟别称）绅士沸焉腾议，至有掷砖彩缢，投砾香车者”，但钱谦益悍然不顾，“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仍怡然自得。

钱谦益早年登科，交游满天下，尤其喜爱古书善本，以藏书之富而名闻江南，故而绛云楼内“旁宠金石文字，广列历代书画，尊彝环壁，藏书万卷”。钱、柳二人同居于此，日夕相对，读书论诗，考异订讹，题花咏柳，殆无虚日。柳如是博闻强记，过目不忘，每当探讨诗词文章的出处时，常能说出在某书某卷，“随手抽拈，百不失一”。当钱谦益倦于见客时，就让柳如是穿着儒服，飘巾大袖，代为应酬，并称她“此吾高弟，亦良记室（掌文书之官）也。”还戏称她为柳“儒士”。

柳如是生一女，名出。清顺治七年（1650），幼女与乳母在楼上玩耍时，因打翻了蜡烛，落入纸堆中燃起大火，绛云楼与楼内的珍贵文物顷刻间被焚毁殆尽。当书楼起火时，钱谦益说：“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但事后又痛心疾首，说：“甲申（1644）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1650）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绛云楼焚毁后，钱、柳遂移居红豆山庄。

崇祯十七年（1644），闯王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皇帝朱由检（崇祯帝）在煤山自缢，随后清兵进山海关，入主中原。江南的明朝官僚于5月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任礼部尚书。

次年5月，清兵南下，渡过长江，攻克镇江，弘光帝出奔芜湖。当兵临南京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她一起投水殉国，“宜取义全大节”，钱谦益沉思无语，

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随即“奋身欲沉池水中”，却被钱谦益死死拉住。5月15日，钱谦益与众大臣开城门，献南京，投降了清军。

钱谦益仕清后，任礼部侍郎、《明史》馆副总裁，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时人有诗云：“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当钱谦益奉召入京时，柳如是却拒不随夫北上。后来，在柳如是的责备和劝说下，钱谦益为降清之举颇有悔意，曾恼恨地说：“要死，要死！”柳如是叱责道：“公不死于乙酉（1645），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顺治三年（1646），钱谦益遂托病回乡，并在柳如是的鼓动下开始参与反抗清廷的秘密活动。

顺治五年（1648）4月，钱谦益因资助黄毓祺“反清复明”，被捕入狱，押往南京问罪。这时，患病卧床的如是奋然跃起，甘愿作为犯人家属随夫去南京。后经柳如是多方活动，曲为斡旋，才使钱谦益得以无罪生还。钱谦益感慨万千，写下了“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的诗句。

此后，钱柳二人坚持秘密抗清，始终如一。柳如是鼓励钱谦益与尚在南方抵抗清军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人联络，策反降清的原明朝将领；他们又捐出钱财资助黄宗羲、姚志卓等人组织反清武装，柳如是还亲自“至海上犒师”，慰问和激励抗清义军；他们还救援抚恤抗清死难义士的遗属。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率军围攻南京，柳如是闻知后，立即响应，付以劬劳。

虽然“反清复明”的愿望终成泡影，但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之下，在抗清秘密活动中，钱谦益因降清而与柳如是产生的感情裂痕，终于得以弥补。面对一系列的失败，钱谦益仰天长叹：“败局真成万古悲”，“苦恨孤臣一死迟”；但是他可以引以为慰的是他与柳如是的情意此后更加坚如磐石。钱谦益的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有赖于柳如是的风骨与义行，冲淡了人们对钱谦益的反感。

康熙三年（1664）5月，钱谦益病故，享年83岁。柳如是嫁到钱家时，钱谦益的正室夫人还在，此外还有侍妾，但钱谦益对柳如是“礼同正嫡”，后来又在柳如是的鼓动下，屡屡变卖家财以支持抗清活动。在钱氏族人看来，这些都是不可容忍之事，故而钱谦益死后，钱氏族人乘机发动家变，族霸钱朝鼎指使族人朝暮逼索柳如是，并当面侮辱威胁，先是夺田600亩，继而索银3000两，并扬言“有则生，无则死，毋短毫厘，毋迟瞬息”，还要将她17岁的女儿柳出和入赘的女婿赵管打出家门。

此时，钱家的资财大多已捐助给抗清义军，为了保护女儿、女婿，保住剩余的财产，柳如是只得写下遗书给女儿柳出，又派人去官府告状，然后于农历6月27日投缳自尽，殉钱氏家难，终年47岁。她与钱谦益之死前后仅差33天。柳如

是利用封建礼法制止了族人的恶行，钱氏族人在“家主新丧，迫死主母”的封建法条下，只得偃旗息鼓，作鸟兽散。

关于柳如是之殉钱氏家难，其直接缘由是被族人钱朝鼎、钱谦光、钱曾等所逼，已成定案。虽各种版本讲述不一，详略有别，但所有指向都明确无误。连钱大成所撰《钱遵王年谱稿》中也说：“是年五月二十四日，族祖谦益卒，年八十三。其子孙爱，文弱不振，族党以为可侮，藉口责侮，覬其田产，哄于其室。六月二十七日，谦益姬人柳如是被迫殉家难，先生乃不理于众口。”

沈云（字秋凡）所著的《盛湖杂录》中有《柳如是绝命书》一则：“汝父死后，先是某某（即钱朝鼎，官至太常卿）并无起头竟来面前大骂，某某还道我有银，差遵王（钱曾，字遵王，清初藏书家）来逼迫。遵王、某某皆是汝父极亲切之人，竟是如此诈我。钱天章犯罪，是我劝汝父一力救出，今反先串张国贤骗去官银、官契献于某某。当时原云诸事销释，谁知又逼汝兄之田献于某某；赖我银子，反开虚账来逼我命；无一人念及汝父者。家人尽皆捉去，汝年纪幼小，不知吾之苦处，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逼得汝与官人进退无门，可痛可恨也。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诉阴司，汝父决不轻放一人。垂绝书示小姐。”

柳如是死后，葬在常熟虞山锦峰拂水岩下的花园浜，墓碑上刻有“河东君之墓”五字，百步之外，则是钱谦益与原配夫人的合葬墓。

柳如是丰姿逸丽，翩若惊鸿，诗词书画，无不精通。她才思敏捷，才气横溢，分题步韵，常常顷刻立就。柳如是的诗、词与赋造诣极高，尤为擅长近体七言诗，传世之作有《尺牋》、《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诗》、《东山酬和集》、《红豆村杂录》、《河东君诗文集》、《我闻室鸳鸯楼词》等。《尺牋》中最具柳如是词文风格的代表作是《踏莎行》：

花痕月片，悉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
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
半帘灯焰，还如梦水，消魂照个人来矣。
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视。

清代女作家林雪在《柳如是尺牋小引》中赞誉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柳如是《湖上草》中的诗作“脱尽红闺脂粉气”，也备

受人推崇。很多名士读了柳如是诗文后赞叹不已，甚至将她誉为女中状元：“谪来天上好居楼，词翰堪当女状头。三十一篇新尺牍，篇篇蕴藉更风流。”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读后，不仅为柳如是的诗才而感慨，更为她豪侠的男士气魄而激动，曾写了三首绝句，其中第三首写道：“幅中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当代大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在读过她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之感，认为柳如是的诗文有“三户七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

当然，令陈寅恪“不能自己”的不只是她绝代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她难能可贵的气节。陈寅恪不仅赞誉柳如是为“女侠名姝”，并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十年的时间，靠着口述，由助手黄萱女士笔录，完成了80余万字的封刀之作《柳如是别传》。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陈寅恪）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这是陈寅恪生前的最后一部巨著，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1953年开始撰写，至1964年夏天完稿，但因“文革”而迟迟未付梓，直到1980年8月初版。国学大师吴宓说：此书“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陈寅恪对柳如是评价极高，他在《柳如是别传》的封面上赫然写上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表彰柳如是的气节。陈寅恪最欣赏柳如是的代表作《金明池·咏寒柳》：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
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
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
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
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
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著重帘，眉儿愁苦。
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因为深爱此作，陈寅恪还特以“金明馆”、“寒柳堂”为自己的书斋名，将自己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此外，陈寅恪还写下了怀念柳如是的诗篇：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
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
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
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

柳如是不仅诗词赋俱佳，而且书画也颇负盛名，她的书法有虞世南、褚遂良之神韵，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此外，柳如是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就文学和艺术才华而言，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

“秦淮八艳”是指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八位才艺名妓，南京的秦淮河畔是南京的繁华所在，河的两岸分别是南方地区会试的总考场——江南贡院和教坊名妓聚集之地。民国时，余怀在《板桥杂记》中分别写了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等六位名妓，后人又加入了柳如是、陈圆圆，合称为“秦淮八艳”。后人评价，“秦淮八艳”中最美貌的，当属陈圆圆；最温柔适意的，为董小宛；而最有气度尊严、最有自主精神、最有勇气和胆魄的，则是柳如是。

300多年来，关于柳如是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如清代文学家钮琇（盛泽南麻人）所著《觚賸》中有《河东君》一则；清赵宗建所撰《旧山楼书目》中载有柳如是所作《红豆山庄杂记》等数种；清代女史徐范所藏的《玉台名翰集》中



柳如是墓

收录了柳如是等八位古代女书法家的书法作品；近代藏书大家章钰的《四当斋集》有《柳如是遗集序》。近年中，撰述柳如是故事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剧更是不计其数。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歌妓才女，也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女子，她虽然出身娼门，但修养极深，诗词琴画，无一不精，让世人叹服；她视世俗礼法为草芥，作风豪爽、性格泼辣，敢爱敢恨，个性刚强，被世人称为“风骨嶙峋柳如是”。

她在与儒生墨客的交往中始终平等相待，不仅为人们所敬慕，而且结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她的《尺牋》和《湖上草》就是她的一位密友汪汝谦为她刊印的。她眼界奇高，敢于大胆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幸福，在当时的一流文人中挑选夫婿，终于寻觅到一个能够平等待她的丈夫。

在国家倾覆民族危亡的时刻，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之中，试图维护个人的气节和民族的尊严，也洗刷着她丈夫的耻辱。后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宽恕钱谦益的投降之举，能够给钱谦益的文学作品以较高的评价，多半是敬重柳如是之故。

在中国古代史上，柳如是是把追求个人自由和民族独立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女性，她最终选择悬梁自尽，与其说是被族人所迫，不如说是因为世间所爱之人皆已死去，复国也永无希望，她是以死殉国，以死殉知音。柳如是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值得人们去思索，去追寻。

计东



计东像

计东（1625—1676）字甫草，号改亭，明末清初学者、诗人，与顾茂伦（顾有孝）、潘稼堂（潘耒）、吴汉槎（吴兆騫）合称“吴中四才子”。外表放浪不羁，内心中正严谨，曾著《筹南五论》上书史可法，纵谈南明形势，被视为奇才；其名入《清代七百名人传》，入祀苏州“五百名贤祠”。

计东之父计名，字青麟，诸生，“为人正直有古风，博综经史，识古今成败，料事多中。”松陵吴兆騫年轻时“简傲不拘礼法”，计名看了他9岁时所作《胆赋》，在赞赏之余评价说：“此子异时必有盛名，然当不免于祸。”清顺治十四年（1657），因江南乡试案牵连，吴兆騫被流放到东北宁古塔，正应了计名的预言。

明天启五年（1625），计东出生于盛泽茅塔村。幼年时，计东顽皮放纵，“跳荡不羁”，计名很为他担忧；但前辈吴公见到计东后，却认为此子“非常儿也”，并将幼女许配于计东。后来，计东在著名文学家、复社领袖太仓张溥的门下读书，诗书诸艺日进，15岁时就补为诸生，文誉日起。

计东年少而“负经世之才”，意气勃发，他自比前秦的王猛、唐初的马周和南宋的陈亮。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明室衰微，计东著《筹南五论》，并以此去谒见南明大学士史可法。史可法看后，十分惊叹，将计东视为奇才，其深明

大略，与陈亮的《中兴五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当时大势已去，面对重兵压境，计东所述的“五论”已难以实施，故而无法对他重用。

南明灭亡后，计东在茅塔村茭葭浜的“学山草堂”居所中闭门苦读，“取《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尽读之，讲求义理，指归治乱得失之要，旁及权衡兵法、阴阳、占候之术，靡不通晓”。顺治八年（1651），计东入太学为贡生，顺治十四年（1657）又参加了顺天乡试，考中举人。

清初，江南的赋税甚重，尤以苏州府、松江府为最。江南的官吏士绅拖欠税金钱粮之事由来已久，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制定条例，凡江南绅衿拖欠钱粮者，必予以惩罚，但江南士绅仍拒缴如故。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严催顺治十七年奏销钱粮，造欠册清查，仅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涉案的就达13517人，都以“抗粮”的罪名纷纷被黜，于是江南的士绅几乎被一网打尽。在这场震动朝野的江南奏销案中，计东也因此而被罢黜。

之后，计东心情颓唐，已无意于科举，决意游历四方，以增长见识，结交豪杰。他从京师出发，北走宣、云，南历漳、洛、邢、魏，东至济、兖，纵览山川胜景，广交各地名士，海内士大夫没人不知计东之名。计东所到之处，都“虚馆设席，备受礼遇”，而计东往往在席间议论风发，纵谈诗文，或臧否时事，或愤激怒骂，时人都视为狂倨。计东曾对友人开玩笑说：“遍京师皆官，无我做处；遍京师皆货，无我买处；遍京师皆粪，无我便处。”闻之可发一噱。

计东虽然外表放浪不羁，而内心却中正严谨。他云游到顺德府（今河北邢台）时，想起了曾在此任通判的前辈文学家归有光的《顺德府通判厅记》等两篇佳作，不禁感慨不已。因为没能寻访到归有光的故居，他就在官署旁边的废圃中设瓣香祭奠，长跪流涕。道旁的围观者纷纷匿笑不已，他却全然不顾。

在邳城（今河北、河南交界处的临漳与安阳北郊一带），计东到处寻觅明代布衣诗人谢茂秦的葬处，最后在南门外二十里的一片荒草丛中找到了谢茂秦的墓地。他取出身边所有的银子，请当地的官员为谢茂秦的墓封土3尺，立石碑一块，上书“明诗人谢茂秦之墓”，并请当地出告示禁止在墓地樵牧。计东还赋诗凭吊谢茂秦，情深意切，后来长洲（今苏州）诗人沈德潜在计东的凭吊诗下题了一绝：“眇目山中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

计东过阜阳时，当地名士刘体仁请他品尝西门外半里许的白蟹泉水质，他们“列坐以次，支铛涤碗，汲泉煮茗”。计东认为此泉甘淳的水质当在扬州大明寺泉水之上，刘体仁十分高兴，愿出资在此泉旁建亭为泉扬名，计东遂作《白蟹泉记》，传世至今。

计东曾两次游商丘，均停留盘桓，广会旧友新朋，留下不少诗文，对当地的

诗风文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顺治十三年（1656）初次到商丘时，计东结识了年方弱冠的宋萃，对他的制艺与诗词赞不绝口，并把他看作是唐代严武、李德裕一类治国之才，对他颇多扶持、提携之举。后来，宋萃先后任江苏巡抚和吏部尚书，人们都佩服计东有知人之鉴。宋萃就任江苏巡抚时，计东已故世多年，他怀念故友，收集、刊刻计东的遗作，并为之写序，《改亭文集》遂得以行世。计东虽然一生怀才不遇，却因有了宋萃这个忘年的知音，而使一生的心血不至于湮没，可谓交得其人，也留下了一段文坛的佳话。

计东的遍游大河南北，不仅增长了见识，也对自己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影响。他的车辙马蹄所及之处，往往是旧时的战场，戈头矢簇、阴磷遗骼与颓垣野田、荒烟蔓草，激起了他苍凉壮烈、愤然不平之思，故而他的诗文转而彷徨、凄惻，多雄豪之意气。汪琬在《改亭文集》序中对他的评价是“信乎，诗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计子甫草来京师，出其中州所作书序、记、铭、五七言杂诗若干篇，予受而读之，而为之三叹也。”

计东“胸罗今古，才压俊英”。他近与长洲（今苏州）的汪琬研习欧曾之文，远与睢州（今河南睢县）的汤斌纵论程朱之学，与他们颇多唱和之作，为文学有本原，文皆醇正和雅。他的诗文“纵横跌宕，务极其才力而后已”；时人评论他的诗“诸体俱工，犹喜其五七律，气体浑雄，不可多得。”计东认为：“学诗必先从古体入。若先学近体者，骨必单薄，气必寒弱，材必俭陋，调必卑靡，其后必不能成家；纵成家，亦洒削小家。”计东的论述切中当时诗坛的弊病。

他性格豪爽，长于交游，所结交者多为贤士大夫。在吴中，与徐乾学、汪琬、尤侗诸友“狎主齐盟”；又与山阴骆复旦、会稽姜承烈、萧山毛甦、太仓吴伟业、长洲宋德宜、吴县尤侗、华亭徐致远、宜兴邹祗谟、无锡顾宸、昆山徐乾学、嘉兴朱彝尊、嘉善曹尔堪、德清章金牧、杭州陆圻等许多名士结成“十郡大社”，数百条游艇荡漾在嘉兴南湖的水面上，集会三天后才定交而去。这在当时被传为文坛盛事。

计东为人极重情意。他与陈维崧曾同在宋德宜家读书，陈维崧住西舍，计东住东舍，灯火相照。陈维崧吟咏必至夜分，而早晨迟起；而计东则不能夜坐，喜早起；陈维崧好为惊艳绝丽之文，而计东嗜苍凉古质之作。两人虽“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顺治十四年（1657）8月，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中式为举人，11月江南乡试案发，因仇家诬陷，吴兆骞奉旨入京参加复试。翌年4月在瀛台复试时，武士们持刀立于两旁，吴兆骞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浑身战栗，竟未能终卷，于是立

遭除名，责四十板，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吴兆骞被流放出关之时，计东百般照应，还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吴兆骞的儿子，以示慰藉之意。康熙二十年（1681），经诸多友人戮力营救，吴兆骞终于以认修内务府工程的名义，罚金两千两赎罪放还。吴兆骞被赦还后，计东家又代他抵偿一部分罚金。

计东生平奇事极多。有一次，他自海陵（今泰州）归家，渡江时，遇上大风雨雪，船不能行，同行之人垂首叹惋，唯有计东独自坐在舵楼下，手持好友王士禛的诗读之。读至评论郑少谷的绝句时，竟然大哭失声；大家惊而围观，计东忽然又破涕大笑，起坐雪中，观江涛澎湃，吟啸自乐。

计东生性怪诞。在吴门，他对孝子黄向坚自称门生。人家问他，黄孝子不识几个字，为何拜他为师？他说：黄孝子徒步万里寻亲，历经蛮瘴、虎豹、盗贼、饥寒、疾病、风波种种险阻，百死一生，将父母从云南护送回家，这样的人连鬼神都会敬重，我为何不能尊他为师？

计东“事母至孝”，因江南奏销案而被罢黜后，他因家贫而纵游四方，劳苦于风尘间，“远负米三千里外”，求取钱财以养母。每想起“我母日倚闾望其子”，计东总感到自己“罪通于天矣”。

计东的长子名计准，字念祖。计准三岁就随父亲学读《毛诗》，五岁就正式从师读书，好学不倦，号为“神童”。他事亲孝母，爱护弟弟，关心朋友，“弟不率教，必长跪自责；与人交，冲和无崖岸”。计准十四岁即补诸生，年少而老成，深受计东宠爱，但天不假年，十六岁就夭亡，亲友们无不痛惜，计东的挚友艾丹生私谥计准为“志学孺子”。

计东的次子计默，字希深，号菴邨，为附贡生。他“濡染家学，诗文卓绝时流，遨游四方，名满艺林”。他的诗“风格高老”，章法句法都出自杜甫；著有《菴邨诗文集》。子名元坊，字维严，为诸生，“博览多闻，矜矜自好”，诗学韩白苏陆，而自成一家，著有《春山小草》。

计东因长子计准的夭亡而悲痛至极，他在茅塔村菴葭浜居所附近建了一座“思子亭”，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又请自己的好友、著名散文家长洲汪琬为“思子亭”作记，散文家宁都魏禧和盛泽名士朱鹤龄都



计东苏州石刻像

著文纪念之。

计准幼年时，聘长洲宋实颖之女宋景昭为妻。计准亡故时，宋景昭才13岁，闻听噩耗后，悲伤之余随即长斋，并“书黄纸誓天，愿以己龄与父母，而速死”。后来，听说有人来求婚，她便绝食而死，年仅23岁。计东“迎其柩归”，与计准合葬。

计东丧子后，终因忧伤成疾，于康熙十五年（1676）抑郁而死，终年52岁，葬于盛泽焉字圩斗家浜。他的一生坎坷不绝：幼时家贫，寒窗苦读；得中举人后，又因江南奏销案而被黜，无奈“远负米三千里外”，终年颠簸在旅途上；中年丧子，悲伤过度，一位满腹经纶的文学家，可怜就此而歿。

计东的才学与诗文极受时人的推崇，尚书王熙（后任大学士）对他尤为器重，屡次推荐计东，但都未成功；终其一生，他始终未获重用。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王熙再一次推荐计东，派人来吴江寻访，但他早已魂归黄泉。

计东死后，士人们纷纷作文、作诗祭祀纪念。康熙三十一年（1692），宋萃来苏州任江苏巡抚，他在理政之余，十分怀念当年对他有恩的计东，于是他收集散佚于各处的计东轶文，编成《改亭文集》16卷，并亲自为之作序，刊刻行世。计东的老友、著名诗人尤侗作《计孝廉传》载于卷首。后来，计东的次子计默又在友人王廷扬的资助下刊刻了《改亭诗集》6卷行世。《改亭诗集》与《改亭文集》在《四库全书》内存目。

道光初，陶澍调任江苏巡抚，他于道光七年（1827）将苏州沧浪亭的“苏公祠”改建为“五百名贤祠”，请名家顾湘舟摹刻苏州历代乡贤名宦594人的画像，每岁致祭。计东也名列其中，画像上的赞辞共16字：“《筹南五论》，见重史公。诗文余技，遇穷益工。”

计东之名列入《清代七百名人传》，并入《清史·列传》。

仲廷机在同治《盛湖志》中说：“我里闻人，明季有卜孟硕，国初有计甫草，然皆得狂名。间尝考其始末，甫草自受知黄冈曹厚庵学士，后研究性理，已能变化气质，力敦儒行。曹病革，时甫草在侧，谆谆语以穷理尽性之学，且曰：‘当知此道极简易，勿过求之，苦且难。’甫草又尝问曰：‘天下幸而前有朱子，后有王阳明，使心性之学大明于世。倘二子不能先后生，则谁为天下必不可无者。’曹悚然厉声曰：‘宁无阳明，不可无朱子。’甫草得正学之传如此。使天假之年，则孔子所谓狂可进于中行者，岂非其人哉？世徒以不及与词科惜之，浅矣。”

计氏一门以诗书传家。他的从祖（祖父的弟弟）计需亭为饱学之士，“隐君子也，少勤学，励志行，有声于诸生中”。自入清后，“遂不求仕进，隐居教授生徒”，“垂

老著书，教宗族及里中少年，使成令器。当世贵人慕而求见者，莫得识其面也。”

计东的族孙计瑛，字文珍，号筹山，“工诗文，善书法，又喜写生”，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顺天乡试副榜，授山东滨州州判，历署利津、蒲台、阳信知县，“廉洁自矢，橐无余资”。归乡后，筑“读书乐园”于盛泽毛家弄之侧，“杜门不出”，与严树、汤钟、陈尊源等结诗社，诗词唱酬，“泊如也”。著有《筹山小草》。

计甦，字伯瀛，号守田，是计瑛的从孙，为监生，曾摄宿州州判，“书宗二王，山水师元人”，他的诗“清俊可喜”，他的画“水墨清旷”。他的嫡兄计接，字汉韦，号新斋，善书法，“大小字皆悬肘书之”，晚年授徒以自给，年逾八十卒。

附录：

《改亭诗集》《改亭文集》四库全书提要

东字甫草，吴江人，顺治丁酉举人。以江南奏销案被黜，又十余年而歿。东少负奇气，中年出游四方，遍览山川之胜，诗文日富。康熙癸酉，宋莘巡抚苏州，为刻其文集。其诗集则刻于戊子，王廷扬所助成也。王焯《今世说》载其客邳城日，尝访谢榛之墓，为树碣表之，盖以游食四方，行踪相近，故用以寄意。其生平事迹，具见尤侗所作《计孝廉传》，亦载卷首云。

《改亭文集》序

宋 莘

《改亭集》者，亡友计君甫草所为古文辞也。君以能文章，早负盛名，交游皆海内知名士。顺治丙申，客游中州，过予邑，交徐恭士。恭士予石友也，予亦因以定交。明年，君举于京兆。后四年，江南奏销案起，絀黜籍，遂绝意仕宦。而君家故贫，母老，势不能不饔飧于客。故自京师北走宣、云，南历洛、漳、邢、魏，东之济、兗，所至虚馆设席，争以礼下之。故宗伯王文贞公与今相国宛平公父子闲尤器重君，常欲荐君。会今上举博学鸿词科，天下材艺之士皆征诣阙，而君不幸先一年歿矣。此知君者所以为之累欷涕洟，而惜君之不遇也。忆予交君甫逾弱冠，君与恭士长于予皆十年以上。君一见盛相推许，且曰：“异日功名，严郑公、李赞皇流辈也。”予愕不敢应，为面发赤，而心怦怦者久之。其后，予起家郡倅，历曹郎，俛仰二十余年。乃遭逢圣天子特达之知，误被拔擢，自畿辅观察，不数年遂把节旄，再移重镇。自顾充位窃禄，碌碌无所竖立，负愧我友。每追忆曩语，予之面

发赤而心怦怦者，盖日益甚也。因而屈指君之歿，且将二十年，恭士歿亦四五年，而予亦已衰老矣。今官君之乡，序君遗集，其能无车过腹痛之感也夫？君常谒吾乡汤潜庵讲程朱之学，又从长洲汪钝翁讲欧曾之学，故论有原本。其文醇正和雅，已足自不朽于世，无待予言。故第追述畴昔知己戏笑之语，以识予愧云。君名东，甫草其字，吴江人。子默，好学攻文章，能世其家。

《改亭诗集》序

王廷扬

岁丁亥二月，吾友计子希深再来泽郡，出其尊人甫草先生文集赠余。余把爱不啻拱璧也，盖先生与家新城大司寇公为忘形交。公每称述先生具不世才，其著作直可信今传后。而年逾五十，遽赋玉楼，识者咸追悼之。余方恨未及见先生，得先生集，如见先生焉。既而循讽累日，深服其经纬史，学有原本，而辞之雄放，不异万斛涌泉，其神韵悠扬，体制警严，则又庐陵、南丰合为一人也。近代归太仆而后，目中实罕其俦。因叹新城言不我欺，而转憾读先生集之不早也。今夏，与希深坐对山亭，询及集中何独无诗。希深辄泫泫泪下，久之乃曰：“某家故贫，力不能刊遗书而问之世。曩者古文一编，商丘宋冢宰公抚我吴时所刻也。其诗稿，曾为中州胡观察缮写，将付剞劂，以罢官遂寝其事。十年来，某耿耿在抱者惟此。”余急索其存稿阅之。分体中兼以编年，凡先生生平游迹暨所交友，盖历历在焉。昔杜少陵险历岷峨，阻临湘梦，读破万卷，诗称当代史。山阴陆放翁过终南，陟巫峡，读书尚友，老而弥笃，故其诗多而且传。以先生好游，凡所至山川，莫不吟咏。又其所与酬倡皆一时名公卿、擅著述手，宜诗与文醇而肆尽若此也。余虽不及见先生，而先生不恍在我目前乎？则余又释从前余憾，而窃喜不自禁也。适希深以秋试往金陵，余因出赀，属其归而镂版，庶后之读《改亭集》者洋洋大观，而家新城公闻之，亦当粲然一笑，用慰人琴之感也夫。爰信笔而为之序。

《改亭诗集》《改亭文集》原序

汪 琬

信乎，诗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计子甫草来京师，出其中州所作书序、记、铭、五七言杂诗若干篇。予受而读之，而为之三叹也。盖甫草自春徂秋，遍游大河之南北。其车辙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时战争旧垒也。故其戈头矢鏃、阴磷遗骸，往往杂出于颓垣野田、荒烟蔓草之中，见之恒有苍凉壮烈、愤然不平之余思。则其为道途逆旅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凄惻。逾河涉洛，遥望嵩山少室苏门之嶄秀，其间长林修竹，飞瀑清湍，绵亘而不绝。至于菟园、雁池、铜台、紫陌之旁，日落风号，狐啼而鸱啸，虽欲问梁孝王之骄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气而眇乎远矣。则其为登临怀古诸作也，宜其多幽隋而深长。所遇贤士大夫，与夫王孙贵胄，下暨酒人、侠客、卖浆、屠沽之徒，埋名而更姓者，犹不失中原文物之遗焉。幸得追随其步趋，而相与上下往复。其议论无不动心骇魄，可歌可涕。则其为往来赠答、宴饮别离诸作也，宜其多激昂沉郁，而出之以顿挫。然则甫草所作之工，盖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迹几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尝崎岖齐鲁、秦蜀、荆湖之间，故能出其所得，名当时而传后世。诗文之道，虽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则固千载以来雄才杰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区区之翰墨，与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系官于此，无由为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壮其气而开拓其耳目。于是学日益劣，识日益卑，而才华亦渐以凋落。盖有愧与甫草多矣，况敢远望古人乎？顾犹欲竭其固陋，为甫草序此而不辞者。何哉？夫亦以志吾愧也。

黄绵袄

计 东

齐人爱冬日，呼为黄绵袄。
曝背得奇温，茅檐共相保。
吁嗟负暄诗，创始杜陵老。
融和得元心，乐天诗更好。
晷短尤可惜，晨起向果杲。
坐看严霜消，如露浥白草。
冷暖皆戴天，何必逢春早。

和汪钝翁岁暮杂咏

计 东

负米羞看舞袖斑，荷锄驱犊过溪湾。
清霜落尽枯杨叶，遥见吴兴一片山。

若无一物答年新，老杜吟诗最怕春。
村僻幸迷车马迹，贺年往返只南邻。

楼畔梅花渐次开，疏枝冷蕊亦宜哉。
登楼我独倚栏啸，不许旁人一个来。

莫逢俗物话孤踪，岂恋深山屐杖筇。
不信试开天畔眼，闲云不落有无中。

辛盘草草进初筵，奉母权为岁事牵。
椎髻蓬头看自好，胜他冠盖客天边。

感旧四首赠史三兄

计 东

禅智庵头别剑芒，青春红泪洒宫墙。
重逢小阮谭畴昔，身是君家旧孔璋。

桃花米熟伴枯鱼，参坐欣然一饱余。
见说相公犹未食，何郎泣献袖中书。

二十三年存没情，无端感旧泪纵横。
广陵八月潮来急，似听登陴呜咽声。

上书请驻马馱沙，一线吴天未足夸。
不用便从黄石去，禹陵风雨下灵蛇。

蛰庵记

计 东

（学山草堂，在茅塔村茭葭浜，举人计东居。旁有“蛰庵”，自为记。）

予童子时，每日暮从家塾归，辄拥几一斗室中。父时时以馆谷留江城中。母夜纺绩课子，篝灯读书。及予既婚，率以为常。父为手书二大字，曰“蛰庵”，题一额赐予。甲午后，予游京师，吾妻以此室居。予妾永既迁江城，此室遂废。及复归，永移居近吾母，以此室与次儿，如予童子时。然敝陋，非旧规矣。辛亥冬杪，吾母不欲孙远就家塾，命孙昼夜拥炉读书其中，乃稍葺之，若暖阁者。予为寻索吾父手书“蛰庵”两字，则不可复得矣。追忆三十年前事，不禁黯然。因绎吾父之意，释“蛰”字之义，语次儿曰：“《易》曰‘潜龙’，《系辞》曰‘龙蛇之蛰’，其义一也。若以龙蛇当阳气，潜藏之候必潜蛰为宜。如《诗》‘遵养时晦’之义，

犹未深知《易》也。当可见可跃可飞之时，勋业塞天地，而至人之所为退藏于密者，当寂然不动。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程子所谓千兵万马与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总归无事。此潜蛰之至义也。学者不知其解，即文章若韩、欧阳，诗歌若李、杜，勋业若李、郭，皆小人之的。然而日亡者耳，非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小子其深念之哉！”作《蛰庵记》。

钮琇



钮琇像

钮琇（？—1704）字玉樵，室名临野堂，盛泽镇南麻之北麻村人，清学者、文学家，也是当时一位博学多才的易学家，以文学家被《辞海》收录。

钮琇出身在一个极不得志的读书人家庭，“家酷贫”，以至于“无以菽水之欢”（难以奉养父母，使父母欢乐）。他的父亲号芥庵，编有《芥庵自怡编》。父亲寄厚望于他，曾“注《离骚经》并检校《通鉴》，为之标举建储、绥远、用贤、黜佞、重农田、定赋役、正礼律、兴学校诸大典”，用以教子。

钮琇少年时，父亲将他送到名士吴南邨的门下，学习《尚书》、《左氏传》及制艺（八股文）。吴南邨在明末时驰名于三吴两浙之间，擅长诗与古文，著述甚富，钮琇颇受感染，“窃窃然习壮夫弗为之所为”。吴南邨歿后，钮琇又跟族兄钮棨（字易庵）游学。钮棨襟怀恬淡，“绝意人世”，入清后无意功名，“筑楼汉滨，绕以修竹，种菊其下，赋诗饮酒”。在他们的影响下，钮琇接受了传统的正规教育。

康熙十一年（1672），钮琇被选拔为贡生，入太学深造，受到国子监祭酒徐玉峰的赏识，并以拔贡生的资格开始进入仕途。他先是在本县充当教习，又经考试合格后加授知县衔，于康熙

十六年（1677）被派往河南项城县任知县兼摄沈丘事。钮琇将父母接至任上奉养，康熙二十一年（1682）11月父芥庵去世，第二年母黄氏亦病亡，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钮琇从项城扶柩南归，并在家守制三年。服孝期满后，归吏部候调，改任陕西白水县知县，兼摄蒲城事；康熙三十七年（1698）又改调广东高明县知县。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于高明知县任上。

钮琇为人极有才略，处事果断，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任项城知县时，他对项城的人文地理颇有研究，曾对项城人作出“自古项城多旷士”的评语。当时，项城的百姓因亏欠官府的税赋而大量逃亡，致使土地荒芜。钮琇当即决定动用库银，添置耕牛、种子与农具，鼓励农民回来耕种。《项城县志》对他的评价是“心劳抚宇，衣布食蔬，饶有古君子风，报内艰去，囊橐萧然”；而他的父亲见他“治赋、兴学、宽徭、平狱”等多项举措颇有成效，正合自己当年编辑《通鉴》时的志向，心里也感到十分宽慰。

在沈丘县任职时，狱中有6名犯人，已经关押了17年还未结案，钮琇立即查明原因，原来是被江南的一件案子所牵连而迟迟难决；钮琇未请示上司，就果断地将6名犯人释放回家。前任知县对他的果断处置十分钦佩，说：“我在沈丘13年，不敢断此案，你到任3天就结案，才识胜我多矣！”

钮琇在白水县任知县时，以执法严明著称。康熙三十一年（1692）白水灾荒严重，奸民乘机劫掠，钮琇一边严厉惩治劫掠者，一边“发内帑三千金、楚粮五百石”赈济难民，逃荒民众纷纷回归，境内肃然。在蒲城时，因强盗白昼公然抢劫，钮琇亲自率领兵丁攻打强盗巢穴，捉住盗魁，沉于河中；村民见知县亲自出马，无不深受鼓舞，群起而攻之，将抓来的余党一一处死，于是盗贼乃止。

钮琇调任高明县时，广东战乱方息，当时民众纷纷逃逸，山中盗匪出没，农田大多抛荒，一片凋敝。钮琇到任后，先是作了一番考察与分析，由于境内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致使一些人贫而为盗，一些人外出逃亡。钮琇先是招抚盗匪，他发给24名强盗免死牌，命他们守御城隘以赎前罪；对于贫苦百姓，则采取招徕流民，发口粮，建房屋，然后令之安心耕作，兴修水利，并减轻赋税。经过他的一番调处，百姓都得以安居乐业，因此，高明县境内逐渐显现一片升平气象。

高明地方历来水灾频繁，钮琇到任后不久就召集工匠，发动民众筑堤坝，疏浚河道，从此境内“水潦无害”。钮琇还在县里设义塾，教民读书，美教化，移风俗，救济孤寡贫寒，民众深受其惠。

康熙四十三年（1704），钮琇因病卒于高明知县任上，百姓们无不痛哭，连远在河南项城、沈丘县的百姓也闻讯赶来送殡。钮琇的一生唯有一篋诗书，两袖清风，

故而直到十年后才得以盘桓回家乡安葬，灵柩离开高明之时，邑内百姓赶来相送的队伍绵延达60里。高明的老百姓都对钮琇感恩戴德，祀钮琇于名宦祠。

钮琇作为一位“儒吏”、“廉吏”，任职时能注意“省官用，捐逋赋，兴水利，招流亡”，政绩颇著，百姓拥戴，但他从宦27年，从中原到西北再到南粤，却始终没获得升迁，终身只是一个七品知县。然而他似乎并没有多少牢骚，文人的秉性让他淡于名利，并在繁琐的政务之余寻觅一份读书人的愉悦。

钮琇出生在鱼米之乡，备受江南文化的熏陶，喜好吟风弄月，有着风流狂傲的一面。康熙三十年（1691），钮琇在陕西白水知县任上，曾捐出俸银将县门思齐楼修葺一新，并撰写了一篇《重修思齐楼记》，赢得当时名士的赞叹与唱和。

《清史列传·钮琇传》称钮琇“簿书之暇，不废笔墨”，在理政之余，常以诗文自娱。他的诗文，“少作惊才绝艳，方驾齐梁；中岁则婉丽悲激，长于讽谕，如《和杜秋雨叹》、《泣柳词》，皆有关理乱，足备诗史。”他曾作《盛湖晚眺》诗，描述故乡盛泽的湖光美景：

十里湖光似镜澄，石塘晚景在西汀。
落霞连浦澜生紫，远水浮村树失青。
次第客帆归片片，依微渔火集星星。
一声欸乃人何处？更向桥边倚醉听。

钮琇尤其喜爱搜求各种稗官野史、神话传说，编著成《觚剩》12卷；此外尚有《临野堂诗集》13卷、《文集》10卷、《诗余》2卷、《荔梦编》1卷、《尺牍》4卷等，均入《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觚剩》是钮琇的代表作。“觚”指古代用来记事的简牍，“觚剩”即觚所记之剩，是“史之余”的稗官野记，钮琇把这部专门记录遗闻轶事并兼及其它的笔记小说称之为《觚剩》。《觚剩》分为正、续二编；正编分为8卷，按故事的来源和所经各地之顺序进行编排，分别为《吴觚》3卷、《燕觚》1卷、《豫觚》1卷、《秦觚》1卷、《粤觚》2卷，并有自序1篇；续编分为4卷，按故事的性质和内容而编排，分别为《言觚》1卷、《人觚》1卷、《事觚》1卷、《物觚》1卷，也有自序1篇。

《觚剩》最早的刊本是清康熙临野堂刻本；为避禁书令，此书部分内容又曾托名为《说铃》刊刻；清末以后有《古今说部丛书》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今有朱杰点校的《明清笔记小说丛书·觚剩》本。

《觚剩》所记述的诗文杂事，大多为明末清初史料，“纪明末国初杂事，能举

见闻异词者折衷之，可补正史之阙。”（《清史列传·钮琇传》）。如“虎林军营唱和”一条，揭示了清初文字狱之恐怖；“术者言”一条，记述顺治初清兵在吴中焚戮之惨，俱甚为确实；所载见闻、传说，亦多有可采者。《觚剩》因内容多有“违悖”之处，故而在乾隆年间曾遭当局禁毁。

钮琇的仕宦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应该说是有益的。他作为“博雅工诗文”的江南才子，因为宦海漂流，足迹遍及天南海北，不同的地域文化，增长了他的见识，拓展了他的心胸。他入燕都、登梁苑、过函谷、临珠海，既得以游览大好河山，还搜集到丰富的神异故事，这些都构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雄厚资本。

《觚剩》的写作，早在白水时期就开始了，而成于高明之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写成正编，其中《吴觚》写家乡的见闻；《燕觚》写京都求学、候选时的见闻；《豫觚》写项城的见闻；《秦觚》写白水的见闻；《粤觚》写高明的见闻。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续编，则以叙事的侧重点来分卷，《言觚》记言，《人觚》记人，《事觚》记事，《物觚》记物。

《觚剩》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一般不能载入正史的人物轶事。

如《英雄举动》，写熊廷弼督学江南时，所有的试卷都亲自披阅：“阅则连长几于中堂，鳞拥诸卷于上，左右置酒一坛，剑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数行。每得佳篇，辄浮大白，用志赏心之快；遇荒谬者，则舞剑一回，以抒其郁。”一位重视人才的贤者形象，跃然纸上。

又如吴六奇，是明清易代时的重要人物，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大力将军》、李仲子《红杏楼杂记》之《吴都督补传》都写了他的故事，金庸《鹿鼎记》中的大力将军也以他为原型。在《觚剩》中，《雪遘》突出了海宁县孝廉查伊璜“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的卓越识见。当时，吴六奇浪迹天涯，在海宁沦为乞丐。一日，查伊璜见一丐避雪廊下，强直而立，心窃异之，便呼之对饮，并赠以絮袍、金银。吴六奇雪中获遘（相遇）查孝廉，赏于风尘之外；之后一旦发迹，即加倍报答：“非敢云报，聊以志淮阴少年之感耳。”

以上事迹，或因人，或因事，都是正史中不可能记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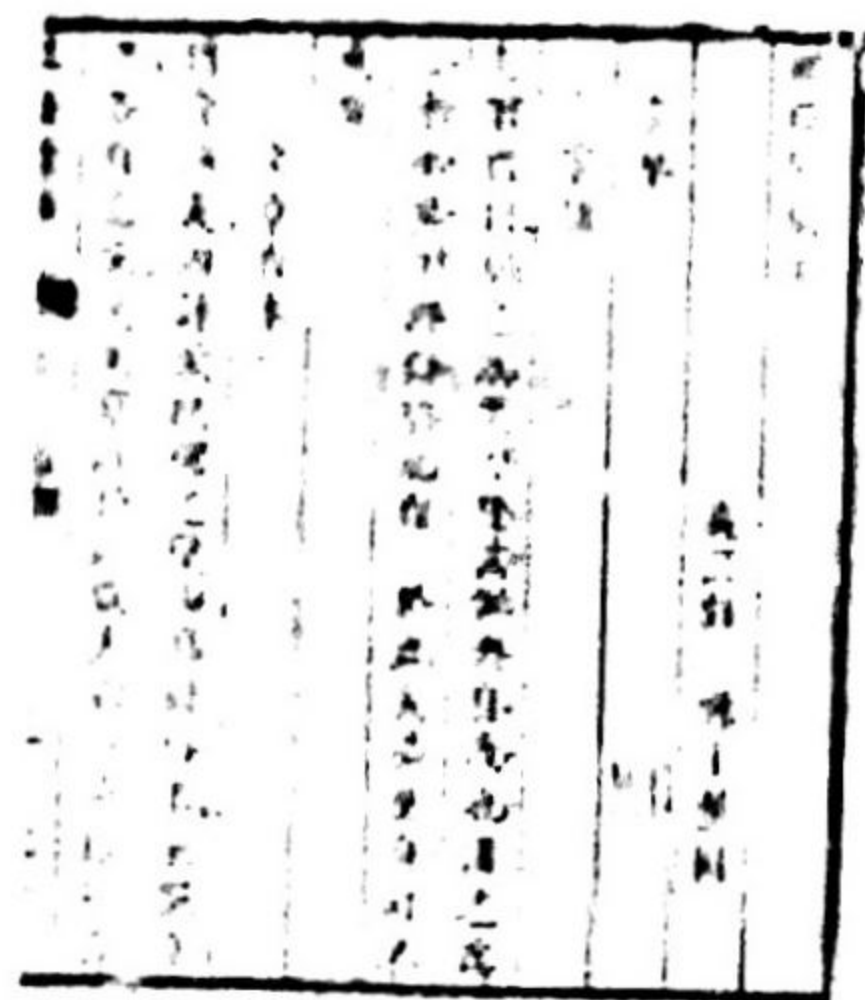
《觚剩》中还有一些具有实录性质的文字，如《共冢》记述顺治七年（1650）耿继茂、尚可喜兵屠文州之事；《五华山故宫》记述永历帝逃遁，吴三桂重购得之，缢于贵阳府及反叛始末；《虎林军营唱和》叙吴炎、潘柽章以明史案株连，在康熙二年（1663）临刑前，吴炎对弟弟说：“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跛金》叙尚之信醉酒，对宫监说：“汝腹

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宝，我欲开视之。”竟以匕首刺宫监之腹。都可补正史之不足。

第二类，是不可能载入正史的女性故事。

“至乃江头孝女，黄绢无传；塞外文姬，青蛾莫赎。帘窥燕子，新愁锁夜月之楼；门倚桃花，旧笑忆春风之径。维美昭于绣管，斯艳发乎香奁。”赞美女子的才华胆识，同情她们的悲惨命运，是《觚剩》总的倾向。

如《云娘》讲述李云娘为密云汪参将仆人王忠之妻，年十八，是一位处变不惊的女中豪杰。汪解职还维扬，在河北道上遇群盗，云娘纵马而前，矢毙二骑，余皆逃遁。参将公子见其貌美，欲行非礼。云娘斥责其不能出奇报国，却恣行不义；用刀指着公子，喝道：“有追我者，即断其头，如河北盗矣。”说罢飞驰而去，永不复返。



钮琇《觚剩续编》

柔情的名篇有《粟儿》，记叙聪明美丽的少女粟儿与清河公子倾心相爱和刺史玉成的经过，文笔细腻委婉，感人至深。《于家琵琶》叙于孝廉与爱姬红桃以琵琶结情，因战乱分离后，又以琵琶相闻而重逢，亦为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佳作。

第三类，是不可能载入正史的神怪故事。

钮琇十分注重从“常”与“怪”的相对性出发，来认识和处理“幻”与“真”的关系。他认为“《虞初》小说，非尽出于荒唐；郭氏贵经，固无伤于典则也”，体现了他独到的神怪观。

如《哑樵》，写平水山樵人目睹了大蛇蜿蜒洞泥内，复涂附其身、曳泥入于洞内的奇异景象，还在它入洞以后，帮它用泥封住了洞口。奇怪的是，樵人做了这桩好事后，却突然不能开口说话；直到三年以后，再次经过以前遇蛇之处，才突然发生变化：阴云乍合，雷雨骤至，霹雳一声，有龙从洞中出，腾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向我卷舌不能出声者，正此物为之也！”于是能言如初。由蛇变化为龙，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故而生怕人之多言，泄露此中机密。人与物之关系如是，真是匪夷所思。

《海天行》则是一篇将航海与航天结合起来的奇妙小说。海述祖造了一艘大船，首尾长二十八丈，与贾客三十八人扬帆出洋。途遇飓风，抵龙宫，龙王借其船载

贡物送上天衢。大船逆风而上，巨鱼夹舟若飞，白波摇漾，练静镜平，路无坦险，时无昼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书“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既入南天关，仰视琼阙绛楼，俱在飘渺之中，乐音缭绕，香气氤氲，贡毕，赐宴，于是集众登舟，复还故处。

但凡笔记小说，其内容往往上下古今，无所不包；一书之中，兼有小说、故事、历史、文学、杂记、琐闻，考据典故、品评诗文也夹杂其中，因而形成有闻则录、不拘一格、记言叙事、长短随宜的特点，能补正史和全集所疏漏之处。《觚剩》就是这些特点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由于钮琇先后在四省为官，又都是下级官员，因此有较多的时间接触下层民众，所见所闻为一般士大夫所不知，故而《觚剩》中所讲述的明末清初之际的社会内容十分庞杂，官场、科场、青楼、市井、战乱、灾荒、文字狱、风俗民情、方物特产、扶乩勘地及诗文书艺几乎无所不包，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钮琇生活于清初时期，一方面，满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颁行“剃发令”，强迫汉人改服易俗，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抗清活动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清廷对老百姓施行高压政策，人民流离失所，惨遭涂炭。钮琇作为下级地方官员，对此深有感触，他在《共冢》一文中叙及百姓惨状：“顺治庚寅正月，耿继茂、尚可喜兵入广州，屠戮甚惨，城内居民几无噍类（活着的人）。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挤溺以死，复不可胜计，浮屠氏（僧人）真修乃募役购薪聚尸，于东门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惨不忍睹。

“三藩”祸民。《俺答纵暴》一文直接揭露清代“三藩”祸民：“俺达公之信（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深宫静室，无以解醒（醉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又取民间子十五以下为把竿之戏，竿长二丈，教之攀缘上下，盘舞竿头。其习技未熟者，多至颠殒或穿腹折肢。（尚之信）恬不介意”。完完全全的一个杀人狂，竟然身居高官，老百姓哪有活路。

“文字狱”。清廷推行文字狱以箝民口舌，株连屠杀极为残忍。庄廷鑑明史案发，一些无辜者也被牵连进去，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处死。吴江名士吴炎、潘柽章根本没参与此事，而且清廷也查明了事实，但仍将二人处斩。《虎林军营唱和》叙吴炎、潘柽章临刑前之情景：吴、潘二人都是钮琇的同乡好友，闻此噩耗，怒作《弼教坊》诗，以资声讨：“绝命悲辞狱里成，衔须赴死气峥嵘。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

市井风貌。《觚剩》正编中，详细记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市井风貌。如《燕

京元夜词》中描述北京妇人在清初流行去摸城门的门钉，能摸到者年轻人可以找到如意郎君，结过婚的则一家平安，于是大家都在元宵夜去摸正阳门的门钉，往往挤得钗乱鬓斜，仍不罢休，以至有被挤伤者。这个风俗习惯直到清末还存在，旧俗传为“走百病”。他书未见有此记载，《觚剩》为头一份。

女中豪杰。女性在明清时生活社会最底层，钮琇在《觚剩》一书中有很多女中豪杰的事迹，如女侠《云娘》有勇有谋，胆识过人，一帮男人在她面前就如污泥相仿。如《河东君》歌颂柳如是大胆追求爱情幸福，遇事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经济科技。钮琇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科技也很重视，专门撰写了一些短文，如《广东月令》、《牡丹述》、《石言》等，这些文章是当时科技发展的原始记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石言》专记广东端砚砚石的储藏、开采、加工、质地鉴别和优劣等级。书中大量引用时人对端砚的评赞诗文，读来声情并茂，堪与“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石语》相媲美，而且钮琇之文清新秀丽，精当洗炼，更有一番风味。

志怪小说。钮琇非常喜欢神话和志怪小说，他叙事简洁，文笔流畅，如《咪娘》、《粟儿》、《雪遣》等，写得哀婉凄艳；其内容或揭露社会阴暗面，如《人猫》、《简公雪冤》；或讽刺贫官污吏，如《谄虎》、《粤之猫》；或讥评时弊，如《戒淫祠》、《鹤癖》；或讽喻世人，如《鬼误》、《百岁观场》。

稗官野史。笔记多记稗官野史，往往从一个侧面发一时一地一人之见，也带有实录性质。钮琇在书中大量记载了明清易代之时的历史事件，涉及“三藩之乱”、“永历朝史事”、“康熙西征”、“庄氏明史案”等，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影响和意义。清代文网甚密，史事多有掩饰隐讳之处，往往迷惑后人，《觚剩》一书可补此憾。由于钮琇胆敢记录当朝史事，而且秉笔直书，清廷痛处被揭，当然要大力制裁，好在钮琇早亡，人身迫害已无从下手，只好将其书销毁了事。

名人轶事。《觚剩》一书还记录了不少名人轶事，有清正廉洁之士，也有贫贱枉法之辈，各录其事，使善恶自现。如《英雄举动》一文叙述明代大臣熊廷弼轶事：冯梦龙因撰写《挂枝儿》小曲，受到指责，来求熊廷弼帮助。熊廷弼以“枯鱼焦腐二簋，粟饭一盂”招待冯梦龙，见冯面有难色，便当面训斥：“丈夫处世，不应于饮食求工，能饱餐粗粝者，直英雄耳。”又取出书信一封，请冯梦龙转交故人，而求援之事并无所答。熊廷弼故示冷淡，非不爱才，只是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所求之事，则“移书以潜消之”。钮琇叹道：“英雄举动，其不令人易测如此。”

在《觚剩》中，钮琇为家乡吴江记录了不少文人轶事、民间传说和市井轶闻。《秋灯》描述了吴江“中秋灯会”的盛况：“元宵张灯，是处皆然；而我邑独

盛于中秋，且作龙舰数十，俱笼灯为鳞甲，蛇蜒垂虹、钓雪间，波光月色，上下辉映。香輿夹路，画舫盈湖，箫鼓管弦之声，达曙不辍。顾英白有《江城秋灯》篇云：

吴中灯市元宵盛，万户千门共辉映。
 土风又见赛秋灯，龙舟采鷁相夸竞。
 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灯火彻江城。
 争连冶袂探花饮，共踏长桥玩月行。
 家家赌胜经营遍，插竹悬球光彩现。
 制成采胜出文鸳，剪就银花回舞燕。
 还将百宝结流苏，绣户珠帘拟画图。
 灿灿游人齐袂服，盈盈艳女特当垆。
 豪门得赏鳌山景，深夜宁愁凉露冷。
 钓雪滩边火树新，垂虹亭下星桥整。
 别有殊方献鬼功，机关走马实玲珑。
 雕镗云母矜滇巧，错落珍珠美闽工。
 最是龙舟喧夜棹，满湖丝管争欢笑。
 枫岸遥闻兰气香，芦洲震听鼙声闹。
 谁知鞞鼓揭天来，人去城空事可哀。
 女墙吊月啼寒螿，露井临风坠绿槐。
 凄凉亦止十年余，江上繁华转胜初。
 何人不庆升平乐，每事还嫌旧日疏。
 土谷灵祠高树帜，建作勾栏呈百戏。
 歌时画栋遏云流，舞罢朱栏丛绮缀。
 清秋明月胜元宵，宝镜悬空驾彩桥。
 仙乐霓裳云外听，天香丹桂月中飘。
 秋灯更比春灯好，是处楼台似瑶岛。
 步月争看响牒来，踏灯又听清歌绕。
 借问观灯孰可夸，千行宝炬拥香车。
 竞梳高髻称浮渲，并曳新裾号月霞。
 先时甲第多更主，宴乐灯筵靡旧侣。
 游侠欢邀饌玉珍，屠沽意满尊金缕。

窄袖轻衫样最时，边关曲调有情痴。
止知胜赏年年是，岂料沧桑事事非。
萧条独有杨雄宅，不藉余光来照壁。
闲吟聊备采风篇，独看江秋芦月白。”

《岁寒集》记录了钮琇的老师吴南邨和族兄钮棨的诗文；《今乐府》则记录了钮棨《贞白楼诗稿》中两首《今乐府》诗；《去年此日》记录钮琇与同乡文友作文字游戏之轶事；《小鸾》叙午梦堂才女叶小鸾与其母沈宜修（字宛君）对诗的雅事；《黑漆漆》讲述王锡阐“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的趣事；《二潘》、《小座师》讲述潘柹章、潘耒兄弟与吴炎的铁事；《力田遗诗》记录潘柹章著述；《虎林军营唱和》叙吴炎、潘柹章因庄廷鑑明史案株连被害，在临刑前之情景。

《桃花源》描述宋侍郎杨绍云在震泽镇筑桃源洞之事；《木偶出号》叙盛泽茅塔村的怪事；《李妇金氏》讲述钮琇的一位同乡烈女金氏的故事；《岳家神兵》则讲述了一则民间流传的关于“岳家神兵”的传说：“余家吴江之北麻村，居濒麻湖。康熙四十一年四月晦夕，遥见燎火遍野，列如繁星，穿林登陇，其行甚速，钲炮喧震，而绝无人声。湖内之舟，舳舻相接，桅灯高入天际，其灯皆书“岳府”二字。村人举家出走，惊以为盗。久之乃灭。及晓访之，远地百里内，无不有此，咸以为忠武神兵，道经吾邑也。”

钮琇在《觚剩》中还讲述了关于盛泽名流卜舜年、柳如是和汤豹处的几件轶事传闻。

《泥无身》中的卜舜年，“少负隽才，工书画，云间（松江）陈仲醇（号眉公）、董玄宰（即董其昌，两人都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俱爱重之。”他在自家的绿晓斋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濯足须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口气之大无以复加。他还“常于暑月，首挽高髻，身衣大红苎布袍，跣足行歌市中，见者皆指为狂。”卜舜年34岁即亡故，临死前，凡有人求他的书画，他都在卷后题上“泥无身”。活脱脱一个狂生的形象。

《河东君》讲的是柳如是的故事。说钱谦益初遇柳如是时，已是“黝颜鲐背，发已鬢鬢斑白”，而柳如是则“盛鬢堆鸦，凝脂竞体”。燕婉之宵，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于是相与大笑。

《画水》中说：“我邑盛泽镇，牙侏（商人）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其间。”汤豹处，号雨七，所作行草，得枝山笔意，而画尤入神。“尝以为古今绘事，唯于

林岩楼阁花鸟求工，至若写无形而为有形，写无声而似有声，则未能也，乃独创意绘水。”汤豹处画“往哲栖隐之水”、“胜地垂名之水”、“晴雨朝昏之水”，他所画之水或“寓景于四时”，或“假形于百物”，而“水之变态极矣”。人称“此旷世仙笔也，人间画师皆凡品耳。”

在《觚剩》中，《睐娘》是一则篇幅较长的神奇故事。“睐娘者，姓易氏，居松陵（即吴江）之舜水（盛泽的别称）镇。”其父的书楼内有十个香木制成的大书架环室，每个书架上收藏有上百幅法帖名画，并有镂金牌为记，名为“香木城”。睐娘“性聪良，善记诵”，父亲令她掌管镂金牌，名为“画奴”。

乙酉年（1645）清兵南下，睐娘取出香木城中的精品，随父母逃至乡下，香木城被焚毁。三年后，父母回到盛泽，睐娘则住在乡下姑母家。姑母与潘生私通，为睐娘所厌恶。姑母因此而怀恨在心，便私至睐娘父亲处说亲，将睐娘许配给潘生。洞房之夜，睐娘见新郎竟是潘生，痛苦不已，大呼：“姑母误我！”睐娘屡遭丈夫鞭笞，痛不欲生，她将平生所著《愁盐》一卷及所画花鸟粉本付之一炬，留一纸遗书给父母，悬梁自尽，年仅24岁。

殁后数日，忽有一位豪杰，背一血囊，跨剑跃马而至，站在睐娘灵柩前，大呼：“负心人已杀之矣！”囊中是血肉模糊的潘生的头颅。第二年，姑母亦给强盗虏去，不知所终。“人咸以为睐娘冤之所雪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觚剩》为文“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然往往点缀敷衍，以成佳话，不能尽核其实。”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也说“其文词皆哀艳奇恣，而记事多近游戏，故不免谈神怪以徵其诡幻，间有裨于考据者，亦百中之一二耳。”这些略带微词的评论，恰恰道出了此书的“笔记体小说”的性质，尤其是以“神怪徵其诡幻”的特点，而这一点倒是《觚剩》的优点和价值之所在。

郑慈谷

郑慈谷（1867—1919），字二胎，号式如，又号拙庵，别署留余斋主人，清同治六年（1867）八月十三生于盛泽，为清末及民国初年的著名乡绅。



郑式如像

郑氏是盛泽的望族，是极受镇民尊敬的一家书香门第。据郑桐荪所著《盛泽郑世泽堂世系表》中说：“郑氏源出周代郑庄公之后。三国时，吴东安太守庠（讳）公始迁丹阳，是为荜阳郑氏过江第一始祖。传三十一世元亨公，始迁于徽县长龄里，又十七传至培祚（长孺）公（长孺公又号九万），始与其弟培祉公在明季之际由歙县长龄里迁至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居住。今镇上凡称‘世泽堂郑’者，皆其苗裔也。故兹表乃荜阳郑氏长龄派盛泽枝之世系也。与祚、祉二公约同时由长龄里迁盛者，尚有四十八始祖培绪、培德二公。今其后裔已散往他方，其世系一时无从查考。”由此可知，郑氏为周代郑庄公的后裔，三国时，郑氏一支迁至丹阳为第一世，后来又迁至歙县长龄里。明朝末年，第四十八世的培祚、培趾、培绪、培德四兄弟迁居盛泽，但培绪、培德的后裔后来又迁出盛泽，散居他处，故而郑培祚、郑培趾是盛泽郑氏的始祖，凡镇上“世泽堂”的郑氏都是他们的后裔。

明清以来，郑氏以书香传家，第五十四世郑

寿彭、第五十五世郑以泰以及第五十六世郑恭燮、郑恭和都以诗文名世。

关于盛泽郑氏的记载，最早见于光绪《吴江县续志》和《盛湖志补》，两志记载了郑恭燮、郑恭和两兄弟的事迹。郑恭燮，字孟调，又字理卿，其弟恭和，字仲协，又字理卿，兄弟二人同为诸生，都以诗文名重于乡邑，有《谏果书屋遗诗》一卷问世。他们的思想很开放，又十分关心时政，经常慷慨激昂地讨论国家大事，也喜欢谈论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因此在当地负有盛名，有“二郑”之称。他们“讲求经世有用之学”，恭燮对历代的官制很有研究，并着手编著《职官考》，恭和为人笃实，对西北地区的水利、开垦之事研究颇深，曾作《畿辅屯田策》，可惜两人都天不假年，未满三十就盛年夭逝，故而都未能完稿。柳亚子曾评价他们是“年少负经世才，治龙川水心之学，间为诗歌，激昂有奇气”。

郑恭燮有两个儿子，长子慈崧，号公若，出嗣给叔叔恭和，娶妻邵氏，不幸英年早逝；次子郑慈谷（式如），两岁时父亲亡故，母亲张太夫人含冰茹檠，将慈崧、慈谷弟兄抚养成人。郑慈谷天资聪明，少时拜里中名儒王星伯为师，为先生所激赏，弱冠之年就考上了秀才，才华出众，享誉文坛，里中的饱学之士如李匏斋、沈蒙庐、施孚庵、王冬花等都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

盛泽为江南经济重镇，号称绸都，民风重商务实，名门望族亦多以织缣贩缙为业，郑氏亦然，开了一家“郑茂林记”绸庄，经营丝绸，此外还涉足金融开了钱庄，亦文亦商。民国初年，郑慈谷在长庆坊（北大街东段，今舜湖中路东段）闹市的老宅开设嘉福永绸缎局，前店后宅。绸缎局三开间门面，上有玻璃天棚，下铺西洋彩色地砖，颇具海派风格。

戊戌维新后，社会进步人士为图拯救国难，力主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和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一时间兴学劝商之风大盛，新式学校教育逐渐兴起。

郑慈谷思想开明，急公好义。他开风气之先，“僻居宅，出私财，聘贤能”，改家塾为公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老宅创办了盛泽镇的第一所新式学校——郑氏小学（也是吴江县最早的新式学堂），以家中的大厅世泽堂为教室，聘请里中宿儒沈云、洪鹗等为教师。郑氏小学不同于以往的家塾，一则它学的是近代的科学知识，而不是四书五经；二则它公开张榜向全镇招考新生，里人子弟争相报名，郑慈谷的两个儿子咏春和桐荪也入学就读，邵力子、徐蔚南、王庆禧等都在该校接受启蒙教育。郑氏小学的创办，标志着盛泽的教育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据《柳亚子年谱》载：“式如翁创办盛泽第一个学校——郑氏小学。”又据柳亚子《郑母张节孝君家传》，郑氏办学也得之于式如翁的母亲张氏，“节孝君盱衡

世变，知非兴学不足以救国。遂命慈谷建黄舍于家，为一邑倡”。柳亚子在《郑咏存家传》一文中说：“会二始翁……创黄舍于家，君偕弟蕃横经肄业焉。”

不久，由于入学的学生快速增加，郑氏小学规模已难以适应需求，于是郑慈谷又与举人张嘉桐（季琴）、俊彦洪鸞（雄声）三人共同筹划扩大学校，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盛湖公学，郑慈谷自任校董，郑氏小学遂废。

盛湖公学以创办于同治八年（1869）的笠泽书院（即肄业公所，俗称盛湖东书院）为校址（在太平桥堍，后来是太平街小学的校址），几经拓展，渐成规模，学校声誉日隆。民国二年（1913），盛湖公学改名为吴江县第三高等小学（简称“三高”），民国六年（1917）因与盛湖女校交换校址，迁至思古浜。

郑慈谷还鼓励镇上优秀的子弟出洋留学。清末民初，盛泽兴起了留学之风，出洋的子弟数量可观，这与郑慈谷的倡导有关。

郑慈谷还积极倡导实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盛之区可设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可设分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郑慈谷与镇中商界贤达张庆铺、程元熙、张嘉桐、汪汝琳、汪绍曾、沈志坚、洪鸞、王仁鉴发起成立盛泽商务分会，郑慈谷任商会坐办兼文案，统管邑中商务。商务分会内设立商事公断处，专门处理商事纠纷。当时，盛泽的汪永亨、张益源等绸庄积极向外拓展业务，将绸样送往国际博览会参展，并屡获奖项，饮誉海内外，都得到郑慈谷的倾力相助。

辛亥革命后，吴江光复，郑慈谷被公推为盛泽司令部长。当时，本地的民团与客军因故发生纠纷，一时间群情激昂，冲突一触即发，事态十分严重；郑慈谷临危不乱，他当机立断，向左右密授方略，居中调停，缓解矛盾，风波得以平息，乡里遂免遭一场灾祸。江苏省议会成立后，他又被选举为省议员，兼任吴江劝业课长。郑慈谷胸襟宽广，目光远大，处事落落大方，从不作急功近利之见，受到镇民的普遍推崇。

郑慈谷热心于公益事业。镇内的市河因年久失修而趋于淤塞，大旱之年河中堆满垃圾，大涝之年则河水泛滥上岸，镇民怨声载道。民国二年（1913），由郑慈谷发起，联合商界领袖汪鞠如、陈辰生等向商家筹款，筹银万余元，用于疏浚市河。市河经疏浚后，“几曲川流镜启奁”，镇民“饮和食德”，无不盛赞商界之德政。

郑慈谷老宅所在的长庆坊（北大街东段）是盛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民国四年（1915）的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是当地旧俗出马灯会的传统节日。傍晚，镇上的居民和四乡的村民拥挤在街道上观灯，把长庆坊挤得水泄不通。谁知乐极生悲，大祸骤降，街边的协康祥布店突然起火，顷刻间延烧到整条大街。惊慌失措的观

灯男女在狭窄的街巷中左冲右突，乱作一团，因通道不畅，一时“踏焚压死者相枕籍”（事后统计，死80余人，伤无数）。火灾发生时，郑慈谷不顾危险，毅然打开大门（在长庆坊）接纳逃人，使许多人从他家后门（在敦仁里）逃出，得以脱险。火灾过后，为避免类似惨剧再次发生，郑慈谷又主动让出自家的宅基，辟为茂林里，以疏通人流。从此，繁华的长庆坊又多了一条宽敞的通道，方便了镇上的居民。因为茂林里为“七十二条半弄”之外，故而镇民们又称之新开弄。郑慈谷之德为全镇所公认，里中父老至今称颂不绝。

民国八年（1919）8月17日，郑慈谷以微疾歿于家中，享年53岁。据他的孙子郑重说，因为当年的人缺乏医学常识，认为是“无疾而终”，其实，郑慈谷是死于高血压症。

郑慈谷以诗书传家，家风高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严格，且甚为得法，故而其子女后裔中有不少人成就卓著、名闻海内。

郑慈谷有三子三女。长子名传，字之兰，号咏春，光绪十二年（1886）4月12日生于盛泽。他5岁丧母，赖祖母抚养长大，少负才俊，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后转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后应江苏高等学堂之聘任教授，又兼江苏铁路学堂讲席，民国元年（1912）改任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教授。他在苏州先后执教14年，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待学生诚恳热情，门下成才之士数以千百，深得学生的敬重和爱戴。他文学功底颇深，为南社早期社员。民国十一年（1922）9月9日，因突发脑溢血歿于苏州滚绣坊寓所，年仅37岁。

郑慈谷的次子名之蕃，字桐荪，别号焦桐，光绪十三年（1887）6月12日生于盛泽，因为伯父慈崧没有子嗣，故而以他为后。他与哥哥之兰一同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里中亦称之为“二郑”。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取公费留学，去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数理，得数学学士学位，又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一年，于宣统三年（1911）经欧洲回国，历任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上海南洋大学、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安庆高等学堂等校教授。民国九年（1920）至清华大学任教，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清华与北大、南开合组临时大学南迁至长沙。郑桐荪举家南下，回盛泽老家，但因盛泽在苏嘉铁路线上，日机常来轰炸，因此又迁到妻子曹纯如的南浔老家暂住。不久，临时大学在长沙开课，他又带领全家赶赴长沙；1938年夏，学校远迁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他又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后来他因病蛰居上海，守正不阿，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又曾任育才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退休。

1963年10月23日病逝于清华园，享年77岁。

郑桐荪是我国数学界的前辈、清华大学数学系创办人之一和第一任系主任，是最早在清华园讲授数学的中国教授，曾担任多门基础数学课程的讲授，对中国古代数学有深刻的研究，译有外文数学教科书《微分方程初步》、《微积分》等数种，著有《四元开方释要》和数学史专著及《墨经中的数理思想》，参与编纂《数学名词》，还与苏曼殊、沈燕谋合编《汉英辞典》、《英汉辞典》。

他先后在清华大学执教30余年，毕生致力于数学教学事业，数十年如一日，造就学子以千百计。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和名教授都出于他的门下，曾受到他的奖掖和提携，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博闻强记，除数学之外还精于文史诗词，对于历代兴废、山川变革、名胜古迹、逸闻轶事乃至诗词的流派、名家诗词的评论，都有独到的见解，著有《禹贡地理新释》、《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吴梅村诗笺释》、《冯注李义山诗商榷》、《宋词简评》等。郑桐荪与哥哥郑咏春、妹妹郑佩宜早年就参加了南社，是南社最早的社员，所作诗词不下数百篇，对于名胜古迹，每以排律吟之，气势壮阔，音调激越。早年曾与苏曼殊、柳亚子等南社诗人相唱和，柳亚子对他在词章学方面的



郑式如与儿子郑咏春、孙子郑重（1918年）

造诣，曾极为赞赏，说“只信少时娴数理，谁知晚岁究词章”，并且在他的一首诗旁下注道：“桐兄研精数理，不以文学名，实则见解深刻，余所不逮也。”

郑桐荪对晚辈的爱是博大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他的哥哥咏春病故后，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支柱，只得从苏州返回盛泽老家居住。咏春之妻施氏遭此打击，悲痛欲绝，终日凄凄惶惶，也已无力供6个孩子（1男5女）读书。无奈之下，只得让独子郑重去一家绸布店当学徒。郑桐荪听到这个消息，坚决反对，慨然承担侄子升学的学费，使郑重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从盛泽“三

高”小学毕业后，先后就学于湖州东吴大学附属第三中学和燕京大学，最终成长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郑慈谷的长女郑瑛，字佩宜，光绪十四年（1888）9月25日生。少年时，因为当时还没有女子入学之风，家中的郑氏小学只招男生，因此佩宜没能与两个哥哥一起读书，只能透过世泽堂楼上的地板小孔，听老师上课，或者伫立门外听课，学习英文单词，以解求学的饥渴。

16岁时，她与黎里镇的柳安如（亚子）订婚。佩宜的祖父理卿与亚子的祖父笠云为中表兄弟，郑、柳两家既是亲戚又是世交，由亚子的叔父作媒而联姻。郑慈谷在送子赴吴江考秀才时已认识亚子，订婚时，致书亚子之叔：“令侄亚之卢、孟（卢梭、孟德斯鸠），今之顾、黄（顾炎武、黄宗羲），幸得坦腹东床，何快如之！息女娇痴，本不足奉箕帚，惟念男女相差三百级，支那旧例，差堪援以自解耳！”光绪三十二年（1906）10月，佩宜与亚子在盛泽举行“文明婚礼”，她头上不戴金银饰品，不盖四方红巾，身穿一套粉红色衣裙，以鞠躬礼代跪拜，一改旧时陋习。这在吴江全县乃是破天荒之举，一镇为之轰动，争观者如潮，一时传为佳话。

新婚伊始，佩宜到苏州“苏苏女学”读书，后因怀孕而辍学。婚后，佩宜在生活上悉心照料亚子，在事业上也多有襄助。亚子投身革命，东奔西走，她总是相依相随；亡命东瀛，避难香港，她与亚子相濡以沫。民国十六年（1927）“四·一二”事变后，反动军警突然于夜半到黎里家中搜捕亚子，她听到急促的叩门声，知有大祸，急中生智，让亚子藏身于楼上复壁中，面对军警盘问，她从容地应付，使亚子幸免于难。在抗战期间的屡次迁移中，她曾到难民收容所度生。1942年初，她与亚子分手，带着外孙光辽经惠阳、淡水、龙川、曲江，颠沛流离，在桂林与阔别半载的亚子聚首。1949年2月，她陪亚子由香港北上，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定居北京。亚子逝世后，佩宜将柳亚子部分书画和著作捐赠给苏州博物馆。1962年佩宜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

亚子性情豪爽，急躁易怒，而对佩宜则温和恭顺。在亚子眼中，佩宜是个天资聪慧、个性很强的非凡人物，她随同亚子结识何香凝、经普椿，拜会毛泽东、周恩来，风云际会，堪称英杰。

郑慈谷的长婿柳亚子是著名的诗人、史学家、革命家，是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也是南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1948年，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

在式如的第三、第四代后裔中，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

郑重（郑咏春长子），著名海洋学家、教育家，厦门大学海洋学系和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华东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甲壳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福建省水产学会、福建省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桡足类学者协会会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学术专著有《浮游生物学概论》、《中国海洋浮游桡足类》、《海洋浮游生物学》、《海洋浮游生物生态学文集》、《郑重文集》、《海洋枝角类生物学》等，其中《海洋浮游生物学》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顾学民（郑咏春长媳），著名无机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福建省政协常委、民盟福建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常委，民盟厦门大学第三、四、五、六、七届主委。

郑葆（郑咏春长女），毕业于燕京大学。

谢惠（郑咏春长婿），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

郑芳（郑咏春次女），毕业于燕京大学。

周先庚（郑咏春次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

郑衡（郑咏春四女），著名蚕桑专家、浙江农业大学教授。

郑师拙（郑桐荪长子），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生理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张新月（郑桐荪长媳），化学博士、美国罗斯福大学教授。

郑志清（郑桐荪次子），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生物化学博士。

郑士宁（郑桐荪之女），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

陈省身（郑桐荪之婿），蜚声国际的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副主席、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美国总统奖获得者，被誉为“现代微分几何之父”，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柏林工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南开大学名誉博士。

郑兰荪（郑重之子），著名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纳米科技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委主委、厦门市委主委。

郑盛华（郑师拙长子），美国电脑工程专家。

王芝美（郑师拙长媳），美国电脑工程专家。

郑盛杰（郑师拙次子），数学博士，在美国工业界从事研究工作。

郑宗舜（郑师拙之女），美国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博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陈璞（郑士宁之女），毕业于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物理系，圣地亚哥分校研究生。

朱经武（郑士宁之婿），国际杰出物理学家、高温超导体发现者、美国总统奖获得者，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郑慈谷（式如）家族，可谓满门风雅，千古流芳。

汪鞠如



汪鞠如像

汪鞠如（1871—1949），盛泽汪永亨绸行业主，先后两度出任盛泽镇商会会长，是将盛泽丝绸送出国门参加世界博览会的第一人。

汪鞠如祖籍安徽省徽州的黟县，先祖于清朝初年迁居浙江归安县（今湖州）双林镇。他的曾祖父汪雍斋，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以贩卖丝绸为生，长年往来于嘉兴的王江泾与盛泽之间。初时资金微薄，仅制钱数十吊而已；后来因经营得法，获利颇多，于是在王江泾创设汪福昌绸庄，改而为座商。咸丰七年（1857）汪雍斋亡故，遂由儿子汪少田、汪荔园继承父业。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起义军沿着京杭大运河自苏州南下，运河沿线的黄溪、新杭、王江泾等绸市都毁于兵燹。为避战火，许多绸行和机户纷纷逃往损失较轻的盛泽，汪氏昆仲少田、荔园也将绸行迁至盛泽，在申家弄建造起三进石库门厅屋，堂名敬德，绸行与住宅合为一体。不久，少田与荔园相继谢世，由汪访庐、汪聘庐兄弟继承父业，并将绸行的牌号改为汪永亨。

汪访庐（1848—1917）是一位极有头脑的精明商人，他刚继承父业之际，正值太平天国战争初定之时。此时，上海开埠不久，盛泽的许多富裕绸商纷纷避居上海租界，开设分行，俗称“申庄”。当时的上海商贾麋集，繁阜喧盛，价廉物

美的盛泽丝绸产品大受市场的青睐，商机充盈。

汪访庐以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准了丝绸业发展的时机，准备扩大对外的开拓。他与从弟汪聘庐将汪永亨绸行析而为二，汪聘庐主持汪永亨隆记绸行，专营福建与长江一线的业务；汪访庐主持汪永亨昌记绸行，专营广东帮生意及出口业务。两家绸行都上海设立分庄，与各地的客帮直接接洽业务，并频繁地与外商接触，从事丝绸出口贸易，业务大盛。

汪访庐胞弟众多，故而后来又从汪永亨昌记绸行分出资金，另设汪永亨信记、成记、正记等“下县庄”绸行，由三位成年的弟弟分别独立经营，专营江浙一带各中等城市及县镇的丝绸交易。至此，汪永亨绸行已成为盛泽绸业中之执牛耳者，为盛泽各类绸缎推向全国以及海外市场推波助澜。

晚清时期，朝廷为弥补财政的困难，允许士民向国家捐纳一定量的钱物以取得爵位与官职。此时的汪访庐资财日聚，富甲一方，为增加自己的身价与地位，他以巨资捐了个四品官，俨然成了一方的官绅。每年新春盛泽“庄面”开庄之日，他都会穿起四品顶戴的全副袍褂，作为盛泽商界的领袖，率领全镇绸业、丝业和领投业商人举行开庄仪式。

汪访庐在五十岁之后，自以为基业已定，于是功成身退，决定回双林老宅内颐养天年，将汪永亨昌记绸行的业务交托给长子汪鞠如掌管。民国初年，汪访庐的次子汪闾如成年后，汪永亨昌记绸行又一分为二，汪鞠如、王闾如兄弟俩分别经营汪永亨敬记绸行与汪永亨昌和记绸行。

汪鞠如生于同治十年（1871），“幼时未称颖悟”，但她的母亲唐氏家教甚严，在母亲的管教下，他从小养成刻苦钻研的好习惯。当时盛泽的商户人家，一般都会送家中的子弟入私塾读书，认几个字，学会记账、打算盘，然后就去“学生意”，接班做买卖，汪氏亦然。汪鞠如被送进私塾读了数年书后，随即回到自家店中充当学徒，学习“看庄”。

所谓“看庄”，就是检验绸缎的质量，然后核定价格（俗称“喝价”），是绸行里最为关键的行当。“看庄先生”不仅要熟知绸缎质量的标准，及时发现绸缎的疵点，准确判断绸缎的质量等级，还必须精通丝绸生产的技术，了解丝绸市场的价格行情；“看庄先生”的业务水平直接关系到绸行的盈利多寡。由于汪鞠如刻苦自励，善于钻研技术，因此很快就练就了一手鉴别绸品的真本领，盛泽人俗称为“脚块子里出身”，成为一名精通丝绸业务的行家里手。

汪鞠如奉父命接管绸行业务时，年仅20余岁。当时的汪永亨昌记绸行在盛泽、上海有两处绸庄，他终年奔波在两地之间，一方面善待行内的店伙，求得上下团结，



汪永亨敬记绸庄广告

齐心发展绸行业务；另一方面关注海内外丝绸市场行情，及时掌握盛泽丝绸产业的生产与产品质量现状，在此基础上寻找拓展事业的机会。

长期以来，盛泽的丝绸生产与贸易形成一种独具一格的产、供、销模式。除了一些作坊式的生产之外，大量的绸缎由分散在千家万户的“机户”们各自独立生产。盛泽的农村几乎家家织绸，机户们把织成的绸匹交给“领投”（绸缎交易的中介人），经过领投初验和分类集中后再转售给绸行。领投在收到货款后，扣除了佣金，将货款付给机户，并且出具信用担保，使机户能从丝行赎回原料用丝。绸行和机户不直接发生关系，双方通过“领投”完成丝绸交易的过程。

由于丝绸的生产极其分散，而机户们所用的原料丝经往往粗细不匀，织绸的手艺也高下悬殊，导致绸缎质量参差不齐。此外，以往盛泽的绸缎在练染整理的过程中均须加浆，使绸身挺括厚实，但是加了浆的绸缎易于吸水，因此在运输途中容易导致霉变。由于汪鞠如熟知盛泽丝绸业的生产情况，因此他充分利用汪永亨绸行在盛泽行业内的号召力，协调丝、领、绸三业，打破旧规，倡导提高用丝质量，取消“上浆”工艺，改绸缎“浆货”为“清水货”，得到客户的欢迎与赞许。

由于汪鞠如精于“看庄”喝价，善于把握绸品质量，故而汪永亨绸行所出售的绸缎，常常胜人一筹，在客帮中获得很高的信誉。经过他精益求精的管理与经营，汪永亨绸行规模日增，资金充裕，鼎盛时资产达60万两之巨。民国年间，盛泽有九大“广庄”（专营闽广沿海地区丝绸交易的绸庄）：汪永亨、源记盛、丁人和、升记、广昌成、春记正、张益源、义昌春、永慎昌，汪永亨名列魁首。

当时的绸行生意十分兴隆，资金周转较快，获利颇丰，一般盈利率可达20%左右，因此资本积累很快。绸行内除了业主外，还有“看庄”先生、账房先生以及发练（练绸）、发染（染色）等各类业务人员和工友、厨师、学徒，人员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一般待遇都颇为优厚。

甲午战争（1894）之后，中国又遭遇庚子（1900）之变，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南方官绅提出“东南互保”之议，江南工商业得以安然无恙。在此时局维艰之中，

汪鞠如悉心筹划，锐意进取，使汪永亨昌记绸行的业务在二、三十年间突飞猛进。绸缎的品种在原有的纺、濮、罗、綾之外，又新创了花纺、线条纺、彩条纺、缎条纺等许多品种，每年直接运销外埠的绸缎，仅“盛纺”（以盛泽命名的一种质量上乘的纺绸品种）一种即多达数百箱（每箱六十匹），所盈之利，年逾万金。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列强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焦头烂额，经济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也无暇顾及中国，因而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展机遇，丝绸产品的出口量大增。精明的汪鞠如看准了时机，积极拓展丝绸出口业务，将当时流行的洋纺、花纺、盛纺等产品推向法国，委托巴黎华商通运公司代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又派绸行雇员去新加坡开展南洋业务，使汪永亨的绸缎远销南洋群岛、越南、暹罗（泰国）、新加坡、马来亚、法国等地。

为了扩大盛泽丝绸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汪鞠如又开始关注对外宣传，寻觅各种合适的机会，让盛泽的绸缎更多地亮相于国内与国际市场。

清朝晚期，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劝业之风大盛。外国人为推销商品、开拓市场而举办的博览会也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为了“开风气而劝工商”，有益于促进工商业发展，清朝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3省）端方奏请朝廷在南京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经清廷批准，于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除了国内各省外，南洋群岛的爪哇、雅加达、新加坡、苏腊巴亚等地的商界也都来参展。

汪鞠如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宣传盛泽丝绸产品的极佳机会，于是精心挑选产品送南京展出。劝业会结束时，从展出的上百万件展品中选出了5000余件获奖展品，汪永亨昌记绸行选送的“蓝黑色小方格纺”、“蓝条斗纹桂花纺”、“白条蝴蝶桂花纺”、“蓝色细柳条纺”等9款绸样荣获了超等奖。

初战告捷，让汪鞠如信心大增，于是他积极筹备向国外大型博览会进军。当时，盛泽绸缎出口朝鲜、日本、俄罗斯、东南亚、西欧和美国的报道已经频频出现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商务报告以及一些报刊上，而世界博览会的信息也开始为汪鞠如这样一些有眼光的中国商人所关注。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行，当时只有一个上海商人携带自己经营的“荣记丝绸”参展并赢得了金、银大奖，但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并不重视博览会之事，故而历届博览会上都极少有中国产品的身影。1910年，盛泽绸业公所接到清廷农商部的指令，得知将在意大利的都灵举办世博会，随即发动绸业同仁遴选绸样参展。汪鞠如力排众议，积极响应，挑选最好的产品参展。第二年会

展结束，佳音传来，汪永亨昌记绸行和盛泽张益源牲记绸行送展的绸样拔得头筹，双双荣获最优等奖。

民国四年（1915），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即将开通而在西海岸的旧金山举办“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向中华民国政府发出了邀请。当时，刚诞生不久的民国政府实施实业政策，对振兴实业抱有期望，认为旧金山是华侨聚居之地，应借机向华侨介绍中国各地的物产，同时也是中国实业界派出赴美考察实业团观摩学习的好机会，因此责成工商部负责这一事项。

工商部为参赛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召集全国工商业者成立专门办理赛会事务的机构，由于国家工商部的重视，因此各省各县以商会牵头成立相应的机构选择送展产品。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向来以丝绸、茶叶、瓷器著称于世，而且茧丝绸产品因欧美等国需求旺盛，成为了紧俏产品，因此尤其重视茧丝绸展品。

盛泽的不少绸行在汪鞠如等人的倡导下，积极遴选绸缎产品送往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出并大获成功，汪永亨绸行的“盛泽纺”获名誉奖，张质斌绸行的“纺绸手帕”获金牌奖，广昌成绸行的“格子花纺”和升记绸行的“白纺绸”分获银牌奖。盛泽丝绸产品在美国的一次集体亮相，为盛泽丝绸赢得了整体的荣誉，极大地提升了绸都盛泽的知名度。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苏州、杭州和湖州的同行们也都在这次博览会上获得了荣誉，但他们要比盛泽汪永亨的获奖晚了整整5年，由此可见汪鞠如目光的敏锐与远大。在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刚刚萌发的时候，汪鞠如所具备的远见卓识为盛泽丝绸赢得了十分难得的荣誉，这是值得盛泽丝绸业界的后人们永远铭记的。

之后，汪永亨绸行以及以汪鞠如为首的盛泽培元公所，又屡屡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各类博览会，先后荣获江苏省物品展览、杭州西湖博览会等许多奖项，让盛泽丝绸名声远播。1926年，由汪鞠如主持选送的盛泽绸样又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获得大奖（与上海、杭州、苏州同行共同获得）。应该说，汪鞠如的汪永亨绸行是盛泽诸多绸行中获奖最多、奖项含金量最高的一家，他为绸都盛泽知名度的提升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汪鞠如是一位极有头脑的商业英才，他除了在产品质量的把控、新产品的开发、国外市场的开拓上努力进取外，还比同行们更早具有商标意识和广告意识。早在百年之前，他就懂得利用自己的产品所拥有的奖项进行广告宣传，并取得显著的销售效果。在他的绸样获得意大利都灵博览会最优等奖之后，他随即印制了大量的仿单（帖于绸匹外包装纸上的广告商标纸），仿单上赫然印上了所获的奖状和奖牌。这些仿单随着他的绸缎产品流入市场，极大地提升了汪永亨绸缎的知名度。

在扩大贸易的同时，汪鞠如还把触角伸向丝绸生产。民国五年（1916），汪鞠如抽调资金，派三弟汪恂如去上海，与盛泽的春记正、升记绸行合作，在上海创办物华丝织厂，总投资100万元，汪永亨绸行出资三分之一。物华丝织厂拥有72台电动织机，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丝织厂。

汪鞠如思想开朗，气度豁达，急公好义，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绸业公所在北大街登椿桥北堍重建新所，年仅27岁的汪鞠如尽心竭力，“其门墙、广场、河埠等建筑均由他督率施工，建成后宏丽轩敞，为地方增色”。

民国初年，汪鞠如任盛泽绸业公所董事，民国十三年（1924）至二十四年（1935）又连任两届盛泽镇商会会长。当时盛泽的行政机构十分薄弱，市政管理的许多职能由商会以及各行会组织——公所协调承担。培元公所即绸业公所，是盛泽绸业界同仁组建的行会组织，在盛泽的诸多行会组织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为镇内公益、慈善事业出力颇多。凡修桥铺路、建设电灯电话诸事，商会与培元公所都全力支持，并给予经济上的大力资助。

在汪鞠如的主持下，培元公所创设了绸庄船，专门用于运送外销的绸匹，朝发夕至，及时灵便；又创办了私立盛泽绸业小学，便利绸业界子弟入学；民国十五年（1926）秋，培元公所为纪念新址落成30周年，特意在花园街旁的牧童湾建了一口义井，盛泽人都称之为“洋井”，镇民深受其惠，有口皆碑。

汪鞠如为人豪放，交游极广，爱与文人交朋友，与郑式如、柳亚子、邵力子、俞粟庐、吴昌硕、陆廉夫、倪墨耕等相友善。他在商务之余还喜作丹青以自娱，柳亚子曾为汪鞠如绘就的《菊隐图》赋诗两首：

题汪鞠如《菊隐图》（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

汪翁门第旧双林，卅载红梨寄寓情。

曾记留余斋畔坐，电灯灿烂酒同倾。

东篱薄采陶元亮，更忆参英屈子辞。

一样芳馨悱恻感，楚骚兰佩不同酬。

（注：红梨为盛泽别称。）

由于汪氏一门生齿日繁，绸行析产分营后，汪氏各支都自立门户，故而资金分散，财力逐渐难以支撑。上世纪三十年代，更因世界经济大萧条波及中国，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再加上日本、意大利垄断国际丝绸市场，故而汪永亨绸行

逐渐衰落。汪鞠如将绸行业务交给儿子汪钦成掌管，并将牌号改为敬寅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盛泽沦陷后，丝绸行情更加萧条，销售日趋萎缩，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汪永亨敬寅记绸行遂告歇业。汪鞠如也于此年逝世，享年79岁。

汪钦成（1892—1990）在接管父业后，也当了一任盛泽商会会长，晚年定居于上海宝山区。由于汪钦成是长子，因此汪鞠如将世博会上获得的奖状与奖牌都交给他保管。他把这些奖状、奖牌当作了传家宝，呵护备至，即使在抗战时期外出逃难时也带在身边。遗憾的是这些奖状、奖牌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杳无踪迹。

汪钦成晚年十分牵挂故乡盛泽的丝绸业，他于1987年将珍藏于箱底的唯一的一张汪永亨敬记绸庄仿单以及意大利都灵博览会最优等奖牌的新办印模捐给了故乡，现在存放于吴江丝绸陈列馆中，成为镇馆之宝。

汪钦成曾于1988年作《绸乡颂》一首，寄托他对故乡的情怀；时年97岁。

蚕桑丝绸	中华瑰宝
远溯上古	嫫祖亲教
汉唐西输	山高路遥
衣被天下	云锦天造
苏宁湖杭	各领风骚
由泾而盛	尤著纺绩
徐綾沈濮	先河首肇
机杼万户	估客如潮
庄领互济	共策丰饶
益源永亨	懋迁有道
分行春申	腾誉海峽
东夷侵袭	百业俱挠
抗战胜利	尘烟未消
人民作主	国换新貌
日新月异	缤纷竞超
百岁过客	欣看今朝



汪永亨绸行所获都灵博览会奖牌

郑辟疆

郑辟疆（1880—1969）字紫卿，著名蚕丝教育家、我国现代蚕丝业奠基人之一，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校长、苏州丝绸工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行政公署委员、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蚕学会第一届名誉理事长、江苏省蚕学会理事长等职；先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第三届政协常委。



郑辟疆像

清光绪六年（1880）11月28日，郑辟疆生于盛泽，家中兄弟5人，姐妹2人，辟疆排行第二。祖父曾开设郑利昌绸行，父亲名雍，本是一儒生，以行医为业，因为不事产业，故而家道中落，家境渐趋清贫。母亲张仪贞，是一位织绸的好手，每天辛勤劳作，常常熬夜到鸡鸣之时，以卖绸的收入贴补家用。母亲辛劳的一生，在郑辟疆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盛泽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几乎家家养蚕、户户织绸，丝绸交易十分繁盛，故乡丝绸文化的熏陶以及母亲在油灯下熬夜织绸的情景，培育了他对蚕桑丝绸的深厚感情。

19世纪末，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在各地兴办新式学校。杭州知府林迪启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杭州西湖创办蚕学馆，改进栽桑、养蚕、缫丝技术，

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培养蚕丝业科技人才的学校。

光绪三十四年(1898),郑辟疆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杭州西湖蚕学馆。求学期间,他在新思潮的熏陶下,拓展了视野,同情和支持维新派,尤其是学校教员稽慕陶“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努力钻研学业,立志以新的科学技术来振兴我国历史悠久的蚕桑丝绸业。

光绪三十八年(1902),他毕业后留校执教。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蚕桑技术,他旋即于次年东渡日本,进入长崎农林高等专科学校蚕丝科深造。在长崎学习期间,他寄居在一个兼营蚕种的蚕农家中,每天课余时,帮助这位蚕农养蚕育种,并利用蚕农家的设备,进行育种培桑试验,育成一种成熟快、个体大的新原种和生命力旺盛、极易栽活的山地桑。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先后考察了爱知县、群馬县、长野县、静冈县等主要蚕区,访问当地的蚕学专家,了解到日本蚕丝业在明治维新后应用先进科学技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00年日本生丝出口量达到8万公担,而中国同期的出口量才5万公担,日本成为与我国竞争的主要对手。他深感必须急起直追,改变我国蚕丝业的落后状态。

1905年,郑辟疆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收到了多个地方的邀请,其中就有山东青州蚕桑学堂的教职聘书。虽然当时山东的蚕桑业远逊于江南,但鉴于他在日本培育的山地桑正适合山东一带的旱地栽种,因此毅然接受了青州的邀请。

郑辟疆到了山东后不久,就拟就了《提倡蚕桑十二条陈》呈送山东巡抚。由于当局的昏庸,送出的条陈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他振兴蚕丝业的决心已定,遂以全部精力投身于蚕丝教育事业。

在青州蚕桑学堂,他吸收日本蚕丝科学技术的新成就,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编纂并出版了包括《桑树栽培》、《蚕体生理》、《养蚕法》、《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制丝学》、《蚕丝概论》和《土壤肥料论》等内容的我国第一部蚕丝教科书,为我国的蚕丝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这些教科书立意新颖,内容精邃,图文并茂,因此深得各蚕校、农校的欢迎,至1928年先后重版达10余次之多,是我国蚕丝教学最早最系统的教科书。与此同时,他亲手培育的优良山桑在青州所属五县得到了普遍栽种,他还改良和繁殖了优质的原种,并进行了大批量的应用。

从1905年到1917年,郑辟疆先后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正当他振兴中国蚕桑事业的宏图在山东初现成效之时,黄炎培与史量才邀请他出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于是他在民国七年(1918)回到了故乡苏州。

自日本回国后，郑辟疆与我国知识界进步人士黄炎培、史量才、王尧钦、费迈枢、费璞安等人交往甚密，他受“实业救国”、“职业教育”等思想的影响，认为必须振兴实业，才能富国强民。当时，蚕丝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与列强竞争的重要阵地，他认为振兴蚕丝业必先提倡蚕丝教育，培养实干人才，决心以挽回权利与荣誉为己任，以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为基地，培养人才，推广科学技术，为振兴我国的蚕丝业奋发献身。

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前身是史量才先生于1904年创办的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1911年改为公立，1912年迁址于吴县浒墅关，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简称女蚕校）。女蚕校的第一任校长是章孔昭，1917年辞职；第二任校长侯鸿铨，任职才半年；郑辟疆是第三任校长。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女蚕校先后改名为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苏南蚕丝专科学校、苏州蚕桑专科学校等，而郑辟疆一直担任着校长的职务，直至1969年九十高龄时逝世，时间跨度长达51年，实为我国教育史上所罕见。

郑辟疆到任之时，学校已有两届毕业生，但由于当时的妇女就业者极少，因此女蚕校的毕业生人大多未能踏入蚕丝界。我国蚕丝业向来以农村妇女为主力，无论是栽桑、养蚕还是缫丝、织绸，都以女劳力为主，为便于接近广大蚕农，指导推广先进技术，必须培养一批女性科技人才。当年创办女蚕校，其原因就在于此。为此，黄炎培与史量才寄语郑辟疆：“希望女蚕校毕业生能为蚕丝界服务。”

有鉴于此，郑辟疆认为：“只有自动打开封建局面，方能实现教育之初衷。”他明确提出，女蚕校的宗旨是培养蚕丝界技术人才，以改进我国的蚕丝业。他亲自制订了女蚕校的四条教育方针：一、启发学生的事业思想，二、树立技术革新之风尚，三、以自力更生和节约办法充实实习设备，提高教育质量，四、坚决向蚕丝业改进途径进军，使学生有用武之地。他要求女蚕校的同人们依此四项进行，“使学生自动投入蚕丝战线，蚕丝业由此可得到改进。学生投入蚕丝业者愈众，蚕丝业的改进则愈速。”

郑辟疆在女蚕校实施的教育方针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他到任后第一次向全校师生讲话，就大讲嫫祖教民育蚕的故事。他说：“我们炎黄子孙，要把祖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现在列强称霸，蚕食中国，河山破碎，百业凋敝。我们学蚕业的，要不惜一切为祖国振兴蚕丝业而献身。”为了激励全校师生，他特邀费迈枢作词、季绕西谱曲，创作了一首校歌，并亲自改定歌词：“宁沪苏常，淮海徐扬，高圩壤地辟蚕桑。女红无害，农事无伤，实业教育此提倡。意法日本，继起竞争，挽回利权谁之任？勤朴则能，

诚谨则成，英才会起成绩彰。阳山之阳，我校恢张，声名日蒸布四方。”他的讲话和校歌激励着全校师生的爱国精神。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带领师生到苏州游行示威，发表演说，反对巴黎和约，不少女蚕校的学生当场折断日制发夹，以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

其次，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他教育学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他说：“知是手段，行是目的。”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只有在应用中才能掌握到真正的知识。他鼓励学生“愈研而精，愈证而明”；他重视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手脑并用，提高动手能力。在民国十一年（1922）校庆十周年纪念会上，他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口号。他先后在校内创办了蚕桑试验场、原蚕种部、蚕丝推广部、制丝实习厂，还在校外农村、工厂建立了众多的实习基地。校内外的实验、实习活动，使学生既获得了书本知识，又得到了实际锻炼，并对蚕丝业的改进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规定“诚、谨、勤、朴”四个字为女蚕校的校训，并指出：诚则能谨，勤则能朴。他自己身体力行，为师生之表率。1921年春，学校试验新蚕种，开始时蚕体生长良好，但几天后发生蚕病，蚕连续死亡。有人说是新蚕种不行，有人说是饲育上有问题。为了弄清原因，他决定把试验部和原种部分开，一面对新蚕种作检验，一面精心再度试养，最终证明新蚕种品质是好的，是饲育中防病消毒不好。为此，他亲自写了“检讨书”张贴在会场：“此次失败，余身为校长，应引咎自责，望同人引以为鉴戒。”大家深为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严以律己的精神所感动。

四是鼓励妇女自尊、自强、自立。为引导学生奋发学习，向蚕丝界进军，他教育学生冲破封建束缚，跻身社会，与男子共享平等权利。他赞扬女子心细、手巧，是蚕丝事业的主力军。鉴于旧社会的女子大多体质柔弱，他力主将体育课列为必修课，开辟了运动场，设置秋千、浪木等运动器具，鼓励女生加强锻炼；又创建医务室、浴室等，关心女学生的健康成长。

五是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他聘请德高望重、造诣深厚、事业心强的教师任教，为适合女校特点，还专门从北京女子师范等校聘来多名教师。每位教师到校，他都亲自迎接，并努力为他们发挥才能创造必要的条件。他同各方来的教师推心置腹，合作共事，不以领导者自居，使教职员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后人称郑辟疆办学的特点是“精选教师，苦练学生。”在他的教育熏陶下，学生的诚、谨、勤、朴蔚然成风；走向社会后，忠于职守，精心服务，与男子并肩前进，不仅促进了蚕丝事业的革新和发展，而且为社会开创了新的风尚。

郑辟疆从事教育实践的最显著特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他组织

师生深入农村、工厂，推广新的科学技术，革新我国的蚕丝事业。

他积极倡导“土种（土蚕）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国传统的养蚕法，采用自繁土种。土种未经科学方法配制，多为近亲繁殖，品种混杂，而且未经严格消毒，故而蚕种退化，蚕病多，蚕茧烘折、缫折大，出丝率低，影响丝的品质。虽然自杭州蚕学馆成立之时起，就有人提倡改良蚕种，但是因改良仅停留在口头上，或是只有少数专家在小范围内实验，未与广大蚕农结合，因此虽有成果，却未能推广、普及。

郑辟疆认为，改革蚕丝业，首先要从改革蚕种入手，而蚕种的改革，必须与千家万户的蚕农结合，因此他称这是一场“土种革命”。他带领师生到庙港开弦弓村作实地考察，逐户指导村民对蚕严格消毒，并献出自己精心饲养的我国第一期原种，使该村蚕茧获得大丰收。

郑辟疆鼓励学校的毕业生经营新蚕种业，最早成立的有虎嘯、蕲溪等蚕种场，他的弟妹们也创办了壬戌馆蚕种场。1921年，学校设立了原蚕种部，生产原种、原母种，供新蚕种业的需要。郑辟疆还派他的胞妹郑蓉镜去日本学习蚕业，回国后在学校内从事蚕种改良的教学和实践。

1925年，郑辟疆聘请日籍教师白泽干来校，协助蚕种改良工作。先是建立了冷藏冰库，实行蚕种冷藏和人工孵化；接着又进行一代交杂春种和秋蚕种的试验，并在农村试养、推广。至1927年，正式制成交杂春种3547张，秋蚕种5023张，受到广大蚕农和丝厂的欢迎。当时由土种改为中——中交杂种，出丝率从5.5%提高到8.3%，增加2.8个百分点；后又用中——日交杂种，缫1公担丝可节约鲜茧500—600公斤，经济效果十分显著。从纯种到交杂种，从只养春蚕到兼养秋蚕，是我国蚕业生产的一大改革。

此后，各地的蚕种场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创立，至1930年江苏全省生产春、秋蚕种达140万张。为了保护新蚕种业的兴起，确保蚕丝业健康发展，郑辟疆于1930年初商请江苏省政府农矿厅，组织技术人员起草、颁布了《江苏省蚕业法规》，从此，依法进行视察和施行蚕种检查，使蚕种生产置于法规指导之下。至1936年，江苏春、秋蚕种产量达286万张，土种基本上被淘汰。

与此同时，他带领女蚕校的师生们广泛开展蚕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指导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蚕业经营都是小农经济的方式，技术落后，思想保守。为此，郑辟疆积极倡导蚕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引导广大蚕农组织起来，走合作社道路，并指导蚕农们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来养蚕制丝。

1923年，女蚕校成立了蚕业推广部，由早期的毕业生胡咏絮、费达生担任正、

副主任，许多师生参加了这项工作。郑辟疆再三告诫推广部的指导人员：“唯有虚心、踏实，才能稳步前进。”他还拟订了《指导人员五项注意》：1、指导以达到蚕农自动为目的；2、不涉及地方纠纷，不增加蚕农负担；3、注意蚕农经济能力及地方风习；4、改革先要有实际证明，不能强求接受；5、尊重蚕农原有技术的优点。

推广指导工作开始之前，郑辟疆带领指导人员在蚕丝业繁盛的吴江县农村展开了一场宣传运动。他雇用了两只大船，满载蚕桑、丝茧、蚕种、蚕室、蚕具、丝车等实物、模型、标本、图表和浅说等，每到一处，他都亲自宣讲科学养蚕的知识，指导人员介绍展品，蚕农仔细倾听；又将改良丝车置于船上，进行实际操作，两岸观众鼓掌叫好，都说应该学习新技术。宣传运动历时两周，有效地扩大了影响。

此后，他又在吴江县的开弦弓村建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当地群众组织蚕业合作社，推广养蚕新技术；之后，蚕业指导所逐渐扩大到吴江、吴县、无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武进、江阴、宜兴县的一部分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蚕丝业的革新和发展，使这些地区成为我国蚕丝业的先进基地。

各地的蚕业指导所，由若干指导员组成。她们不辞劳苦，深入农村，和蚕农打成一片，通过蚕业合作社，指导社员选用良种，实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从事新法养蚕，取得了显著效果，深得蚕农的信赖。指导员每年春、秋二季自养蚕开始到新茧上市，逐日到各户巡回指导，风雨无阻，历尽艰辛。她们全心全意为蚕农服务的精神，受到蚕农和社会人士的赞扬。

蚕业合作社成立后，蚕茧的产量、质量提高了，但因为售茧环节还没有组织起来，蚕农仍苦于茧行的中间剥削；而且零星售茧使茧质混杂，增加了缫丝加工的困难；于是郑辟疆又提倡共同售茧，普遍实行了鲜茧共售，个别地区还发展到干茧共售。1930年，吴县的光福蚕业合作社由女蚕校推广部介绍，与无锡永泰、乾牲等丝厂订立鲜茧买卖合同，最早实行了鲜茧共售。后来，光福又成立了干茧运销合作社，协助蚕农建造烘茧灶，对蚕农进行干茧制作技术的指导，将制成的干茧直接售与无锡、上海等地的丝厂。共同售茧，减少了中间剥削，实行优质优价，蚕农得益更多，同时也促进了蚕茧质量的提高，对提高生丝的品质大有裨益，因此也得到了丝厂的欢迎。

农民养蚕，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足，无奈之下只能借高利贷，忍受重利盘剥。郑辟疆急蚕农之所急，时常奔走于各处，以女蚕校和他自己的技术信用作担保，为蚕农向银行争得低息贷款，售茧后，蚕农如数偿还银行本利，从未发生过拖欠之事，蚕农和银行都很满意。

为了提高蚕农的文化和技术素质，郑辟疆要求女蚕校推广部在农闲时举办妇

女工读班和养蚕技术训练班，编印了《识字课本》、《养蚕大要》、《上簇须知》和《消毒法》等四种教材进行培训，深受蚕农的欢迎，使科学养蚕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

郑辟疆倡导的蚕业科学技术推广指导工作，是我国农村开展合作社运动和介绍科普知识的科技兴农的先声。

在展开蚕业科学技术推广指导工作的基础上，郑辟疆还致力于制丝技术的改进。自1921年起，他先后派送费达生、张复升等人去日本学习最新的制丝技术，1925年，他又将技术推广的重点从养蚕拓展到制丝，把学校的蚕业推广部改名为蚕丝推广部，兼管蚕、丝新技术的改进。

南浔、震泽一带的蚕农，自古以来习惯于自制土丝，并选择优质蚕丝翻成“辑里干经”行销国外（南浔及震泽一带出产的优质丝名为“辑里丝”，再经整理加工成干经，打绞成包转售洋行出口，称“辑里干经”）。郑辟疆指示推广部的指导人员，要重视土丝的制造技术，保留其优点，促进其改良，提高其品质。1925年先在震泽和开弦弓村试行土丝改良，1927年又在震泽镇设立土丝改良传习所，改良了92台丝车，改良后的土丝品质有所提高。

1929年，郑辟疆指导开弦弓村成立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是中国农民在农村自办机械缫丝的创举。该社的缫丝机原是孙中山先生赠予粤商欧谭为然女士的，她未曾使用又转赠给女蚕校，郑辟疆就将此设备无偿借给开弦弓村合作社使用。合作社运营的资金，一部分由社员们自筹，另外部分由女蚕校推广部与江苏农民银行协商，请银行给予贷款解决。由于合作社采用的是日本式小复摇式机器，比当时一般丝厂所用的欧洲式机器更优；同时合作社还采取煮缫分业，改进煮茧技术，所以该社生产的蜜蜂牌生丝品质比较优良。1930年丝价暴跌，但该社所产生丝因为成本低、质量好，生产依旧蒸蒸日上。

1930年，女蚕校又增设制丝科和制丝实习工厂。郑辟疆指出，“制丝科是改进制丝业的秧田，实习工厂是制丝改进实验的示范田。”此时，我国制丝业的弱点已在国际竞争中完全暴露，主要问题是设备陈旧，管理落后，随着国产生丝市场的日益萎缩，不少丝厂倒闭。为此，郑辟疆组织技术人员，悉心钻研，改进设备。当时日本的缫丝技术，已由坐缫改为立缫，但他们严禁立缫车出口。张复升与费达生两人在日本留学时看到过日式立缫车，因此郑辟疆就委托他们两人按日式立缫车进行仿制。经无锡合众铁工厂与上海寰球铁工厂共同施工，“女蚕校”式立缫车终于试制成功，经女蚕校制丝实习工厂和开弦弓村制丝合作社试用，效果良好，以后又陆续在其他丝厂推广应用。与此同时，他们又研制和改进了烘茧机、剥茧机、煮茧机、复摇车和生丝检验设备等，对制丝机械和工艺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

提高了生丝的品质，扩大了销路，渡过了国际市场上丝价猛跌的难关。

郑辟疆除了实行生产技术革新外，还推动丝厂业主进行管理上的改革。当时的厂主们大多只知道赚钱，管理人员都是大小把头（俗称那摩温）。1932年，女蚕校毕业生在无锡乾鞋丝厂进行改革时，受到厂里保守势力的排挤，而瑞纶丝厂的厂主吴中伯年轻有为，有改革的要求，郑辟疆便派费达生等人去该厂进行全面改造，将瑞纶丝厂改为玉祁制丝所，从厂房建筑、工艺设备、生产技术、管理机构到管理方法都进行了革新。虽然也遇到重重阻力，但终于收到了良好效果。

继开弦弓村生丝精制合作社之后，又在女蚕校推广部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震丰丝厂进行了改革，并于1935年成立了平望制丝所和震泽制丝所，经营蚕业合作社委托的代烘、代缲业务。郑辟疆当时就指出：“这种经营方式，是以农村劳动力为基础，不仅有利于农业经济，且于国家经济、地方经济大有裨益，是振兴蚕丝业的道路之一。”

随着制丝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急需一批高级技术人才，于是郑辟疆又于1935年创办了制丝专修科（大专），招收男、女高中毕业生，培养高级制丝人才，这是我国制丝高等教育的开端。1936年，专修科改称江苏省立制丝专科学校；1937年又增设养蚕专科，改称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

从1918年至1937年的19年间，郑辟疆为中国的蚕丝教育和蚕丝业的革新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同时，这期间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得到充分发展的阶段。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学校和玉祁、震泽、平望制丝所以及开弦弓村制丝合作社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战火中校舍、厂房被焚毁，设备被洗劫一空，学校被迫停办，郑辟疆在苏南苦心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面对毁灭性的打击，郑辟疆没有灰心，他率领同仁们在上海继续办学。1938年，女蚕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召集学生复课；同时在上海租界内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的觉园设立蚕丝专科沪分校。汪伪政权建立后，他誓不作“亡国奴”，毅然将学校迁至四川乐山。入川时，他带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苏南的优良蚕种，协助乐山蚕丝实验区开展蚕丝改良工作，推广苏南的经验。他积极宣传和实施改良蚕种，设立蚕业指导所及大小桑苗圃，并开设蚕种场和冷藏库，使川南一带的蚕丝业面貌为之一新。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辟疆带领学校师生回到浒墅关，克服种种艰难困苦，恢复教学事业。1946年学校开始招生，11月，学校的实习工厂复工后，开展代缲，以所得的收入充作复校经费。在此期间，他还协助中蚕公司接收日商瑞丰丝厂，并改名为苏州第一丝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1950年，江苏省立女子蚕校和蚕丝专科学校合并为苏南蚕丝专科学校；1956年蚕、丝分校，分别建立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1960年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升格为苏州丝绸工学院。作为两所学校的创始人之一，郑辟疆同时担任两校的校长一职，直到1969年逝世。1954年，郑辟疆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由黄炎培引见，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亲切地勉励他“把我国的蚕丝业发扬光大”，给了他巨大的鼓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20多年里，郑辟疆进一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思想，积极促进蚕丝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他的主持下，苏州丝绸工学院逐步发展成为制丝、丝织、印染整理、染织美术等专业配套的丝绸高等学府。他十分重视缫丝技术的革新和推广，1952年，学校首先引进日本多摩定粒式自动缫丝机，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总结了一套操作规程，使生丝的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62年，他又主持设计和试制400绪定纤式自动缫丝机，经过长期中间试验，通过了国家鉴定，定型为D101型定纤式自动缫丝机，成为我国新一代缫丝机并在全国推广，为推动我国丝绸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数十年来，郑辟疆以事业为重，未顾及个人的婚姻，直到1950年才在亲友与学生的敦促下，与追随他二十余年的学生和助手费达生喜结良偶。此时郑辟疆已71岁，费达生也已48岁，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老朋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闻讯后，挥毫赋诗：“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近金婚。”

晚年时的郑辟疆，积极从事我国传统蚕丝技术的挖掘与整理工作，校译出版了《蚕桑辑要》、《鬲风广义》、《广蚕桑说辑补》、《野蚕录》等蚕丝古籍，使我国的传统蚕丝文化得到弘扬。

文化大革命期间，郑辟疆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9年11月29日含冤病逝，享年90岁。在病榻上，他遗诗一首：“生存有止境，好比灯油尽。油尽灯自灭，永别无需惜。遗体服火化，灰烬一扫光。寿丧是喜事，大家都欢欣。一生无贡献，未尽人民责。徒餐三百石，无以报农人。”

郑先生的一生就像一条春蚕，为人民吐尽了丝，结成了茧，然后悄悄地离开人世。他是盛泽的骄傲。

邵力子



邵力子像

邵力子（1881—1967）原名闻泰，字仲辉，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中取“力子”二字为笔名，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

邵力子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参与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之后历任中国公学校长、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宣部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到北平参加国共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邵力子原籍会稽（绍兴），他的父亲邵霖，字诚哉（亦作诚斋），于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两度任吴江县丞（县丞衙门设在盛泽）；母亲张氏是盛泽人，是他父亲的继室。邵霖在盛泽置有田产，家在盛泽后街。光绪二十三年（1897），邵霖由镇江府经历调补常熟县丞，在赴任途中病逝于苏州，自此家道中落。

邵力子7岁时随父来盛泽，在家塾中读书。

父亲亡故后，母亲张氏带着他及其兄伯谦，靠着外祖父的接济和到绣花庄领料作绣花手艺艰苦度日。后来，邵力子又去郑慈谷家塾中继续求学，与郑咏春、郑桐荪同窗。受戊戌维新的影响，他去上海求志学堂求学，一年后考入广方言馆，不久又考入苏州中西大学堂（即江苏高等学堂）读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22岁的邵力子得中补庚子正科、辛丑恩科举人，里人为之庆贺，赠送横匾一块，上书“文魁”两字。光绪二十九年（1903），邵力子与绍兴平水人屠玉瑛在故里旧宅结婚，婚后即偕妻居于盛泽外祖母家。

1904年，邵力子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又转入复旦公学，结识陕西“奇才”于右任，并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与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1907年春回国后协助于右任等筹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同年再次随于右任赴日，在东京会见孙中山，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鼓吹革命，才办了三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他随即于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仅42天又遭查封；11月后，他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又因为在学校中宣传新思想而被当局驱逐出境。

1910年夏末，邵力子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他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后又任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1914年，他参加了当时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6年1月，邵力子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民国日报》以拥护共和、发扬民治、唤起国民奋斗精神为宗旨，刊载全国各地讨袁斗争的消息，积极参加护法运动和随后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报导“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1919年，《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邵力子自任主编，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后来，《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



邵力子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邵力子随即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参加），并于1921年参与筹备中共一大。1922年10月，邵力子与于右任等人筹办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历任副校长、代理校长，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新南社。

1924年1月，邵力子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夏，他因为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只得离开上海去广州，5月起，历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并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察委员，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

1926年11月，邵力子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与他同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谭平山），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在赴莫斯科之前，他途径上海，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要他“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他接受了这个建议，脱离了中共组织关系。

在苏联，邵力子认识了傅学文，此时他的妻子屠玉瑛已逝世多年（屠氏死于1919年），1931年两人在南京完婚，从此互伴一生。

1927年5月，邵力子从苏联回国，1928年2月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国公学校长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省府主席、

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他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

1935年11月，邵力子任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一度遭拘禁，后又参与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与蒋介石、张冲组成国民党代表团，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



双十协定

古、林伯渠在庐山会谈，奠定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邵力子先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他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批准《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1940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邵力子参加重庆谈判，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一起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谈，为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次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委员。

1949年2月，邵力子以私人身份随李宗仁组织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周恩来；4月，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后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他与张治中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

1949年9月，邵力子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先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同时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力主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更致力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

“文革”中，邵力子遭受批斗，忧愤成疾，于1967年12月25日卒于北京。

毕生倾心教育事业

邵力子一生最大的兴趣是读书，最倾心的事业是教育。少年时代，他在盛泽的私塾读书，后来因受戊戌维新的影响，去上海求学；中举之后，他放弃仕途，

进入马相伯创立的上海震旦公学求学。1905年震旦公学因外籍传教士篡夺校政发生风潮，邵力子、于右任等学生脱离震旦，拥戴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边学习，边工作。

1909年11月，他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为在学校中宣传新思想而被当局驱逐出境。1914年他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先后任教11年，常常是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报社工作，十分辛苦。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邵力子应聘为中文系主任，讲授《经史百家简编》。他上课时从不带课本，一面背诵，一面讲解，阐述精辟，思路明晰，博古通今。上世纪二十年代，邵力子在复旦已是著名的教授，他所讲授的新闻学，没有现成的教材，都是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编写讲义；在讲授过程中，抓住重点，旁征博引，结合时事，畅谈自己的观点。每逢他讲课，总是听众满堂，普通教室容不下太多的学生，就改在大礼堂上课。

1922年10月，邵力子与于右任等人又一起筹办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历任副校长、代理校长；他从苏联回国后，又一度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他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亲自主持创办了陕西农林专科学校，还支持夫人傅学文在西安创办了第一所助产士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协助她在南京创办了力学小学；此外，还支助祖籍绍兴创办绍兴中学、明强小学和棠荫小学。

邵力子创办学校，十分注重“为应社会之需要”、“发展科学，学以致用”的办学方针，不分男女，不分家庭贫富一样入学，一样对待，并对新教育制度进行大胆的探索。注意组建有真才实学又有革命抱负的教师队伍，在学校中推行“学生自治”，在课堂教学中提倡学术自由争论，提倡师生教学相长，故而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办报纸名扬天下

邵力子是清末民初期间卓有建树的著名报人，他与于右任、叶楚伦等人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民国日报》，宣扬民权、共和思想，倡导国民独立精神，进行革命宣传。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与《民立报》当时被称为“竖三民报”，邵力子以辛辣犀利的文字针砭时弊，很快就名闻大江南北。对于自己的办报经历，邵力子曾愤慨地说：我们“呼”之不成则“吁”，“吁”之不准则“立”。他倡导绝不退缩、

绝不妥协的精神。当时办报的处境十分艰难，报纸的印刷费用经常短缺；邵力子爱报如命，曾经脱下身上的皮袍拿到典当里换取现款，用以支付报纸印费。因此，朋友们说他是“毁家办报”。

《民国日报》的总编辑是国民党理论家叶楚傖，负责操刀社论，邵力子主编副刊《觉悟》，常发表与社论唱反调的言论，而将叶楚傖给《觉悟》的稿子扔进废纸篓，造成了读者不爱读正版，却争看副刊的现象。在邵力子担任主编的6年间，《觉悟》副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是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据丁玲回忆，她在长沙读书时，老师读得最多的报纸是《觉悟》。

邵力子在主编《觉悟》副刊期间，亲自撰写和发表了950多篇文章，几乎讨论了“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关系的一切问题，如反对包办婚姻、正确地理解自由恋爱、女子争取求学机会、学校中的新旧思想斗争、女子剪发、尼姑解放、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等。《觉悟》所刊登的文章大多一事一议，具体生动，有血有肉，很有感染力和针对性；特别是邵力子撰写的文章、评论或报道、随感录，短而精，尖锐泼辣，敏捷卓识，寓意深刻，常常“几分钟立即写成短评或小文”。

据统计，《觉悟》刊登介绍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专论50多篇，还刊登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文章200余篇。

1917年，《民国日报》率先报道了俄国革命，1919年，在得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后，邵力子连夜排版刊登大篇幅的醒目报道，第二天又带着《民国日报》到复旦大学，紧急召集学生冲进英、法租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五卅”运动爆发那天，邵力子不顾个人安危，以《民国日报》主编的身份带了几个记者到现场采访、拍照，在报上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

参与筹备中共“一大”

1920年，邵力子与陈望道同住在法租界三益里，他们都觉得要彻底改造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当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上曾多次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因此陈独秀于1920年到上海后，先是住在邵力子家，不久又搬到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自从陈独秀住进渔阳里，住在三益里的四

支笔杆子——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了过去。邵力子还与陈独秀一同会见了到访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谈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还请孙中山为之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当年8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会上专门研究了邵力子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

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为兴业路76号）是李汉俊、李书城兄弟俩的寓所，同时也是《新时代丛书》社的通讯处，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此召开。为了筹备中共“一大”，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常在邵力子家通宵达旦地工作，邵力子参与了一大文件的起草，还参与了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一大”召开时，邵力子因事务繁忙，“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而没有参加会议。

“和平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涌起抗日怒潮，邵力子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933年春天，邵力子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两人分治军政；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他尽力缓和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以期和衷共济，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后，邵力子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与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邵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要邵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

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必须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

1938年，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主张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邵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1940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行国内。

邵力子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和平谈判，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了和谈。由于他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了“和平老人”的美称。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大力赞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召开“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国大”的选举。

1949年初的国和共谈，邵力子和章士钊、张治中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就任后，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在正式谈判之前，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章士钊等3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关和平问题交换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经过初步商谈，取得中共谅解，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3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组成，原定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他一再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举行谈判。和谈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条款，惟邵力子例外。谈判结果虽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不肯签字，谈判遂告失败，邵力子毅然决定留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邵力子庄严地表示：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一方面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1956年，邵力子任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联系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上层人士，经过学习，启发自觉，并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为社会服务，很多人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爱国观念有了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邵力子始终关注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他不顾耄耋高年，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对台湾有关当局以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志、老部下进行争取工作和宣传工作，介绍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邵力子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

思想开放性情淡泊

邵力子思想极为开放。1902年中举后，他由世交陈紫仪、谢祥霖为媒，与绍兴平水人屠玉瑛对亲。邵、屠两家可谓“门当户对”，但邵力子对女方提出了两个条件：一要女方开放缠足；二要她进校读书。解放小足，女方很快便表同意，但对第二点则颇感为难，因为当时的大家闺秀，大多不愿抛头露面出外上学。最后，两位媒人想出妙计，由眷属陪同女方上学，才打开僵局。

邵力子次子邵志刚的妻子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邵志刚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期间，与瞿秋白夫妇常有联系。三十年代初，邵志刚回国从事地下工作，到上海后暂住在杨之英家中，两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最终结为伴侣。邵志刚故世后，邵力子待杨之英如同女儿，不仅支助她赴日本留学，还支持她改嫁，亲自为她张罗婚事。在婚礼上，邵力子作为主婚人发言，他说：“新娘是我的儿媳妇。自古以来女子丧夫要终身守寡，而男子丧妻则能续弦；但是今天我要把我的儿媳妇作为我的女儿一样出嫁，我要冲破这些封

建思想的桎梏，为新潮流树立新的榜样……”

邵力子还是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主张的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1921年，邵力子在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又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1953年冬季，他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了避孕节育问题，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的计划生育观点。1954年9月17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

邵力子对计划生育的关注，与他切身感受到的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的关系。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了，但当年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因此她从32岁起就与丈夫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与屠玉瑛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妻子怀上第六胎时，她十分痛苦，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然而找遍了各大医院，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采用狂奔的方法堕胎，结果胎是掉了，却因大出血而死。这个悲剧让邵力子刻骨铭心。

邵力子毕生淡泊名利，他宦海沉浮数十年，不因位高而得意，也不因下野而失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保持着一介书生的清高与气节。他一生不事产业，淡于钱财，自奉甚为节俭，平时写信从不使用公笺，信封也是利用旧的改制，并亲自动手，从未借手于人；却又热心公益，关怀故旧，乐于助人，为办报甘于冬夜当皮袍，为办学校可以一掷千金，故旧亲友、贫寒学生得到过他帮助的更何止百千。当年方志敏漂泊到上海，虽与他素昧平生，却得到了他的无私帮助，不但继续了学业，还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向警予等中共领导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邵力子家在盛泽有多处住宅，后街是邵氏老宅，另外还在东港东岸带福桥堍、中浜等处居住过。1956年6月，吴江县人民委员会为整顿房产曾致函邵力子，邵于7月4日复函称：“我是一个‘不事家人生产’者。盛泽镇的房屋，是我先兄伯

谦购置的……接你会来信，觉得当地人民委员会代管该屋很好，拆除改建更好。”

邵力子与盛泽

邵力子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7岁时随父来盛泽居住，光绪二十九年（1903）结婚后仍携妻居于盛泽，在上海工作的那些年里，还是居家盛泽，他前后在盛泽生活了三十来年，参与过当地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还结交或提携过许多吴江的朋友与后辈。他与柳亚子共同从事过吴江地区的革命活动，因此在当时社会上流传过“吴江两个子，一个邵力子，一个柳亚子”之说。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柳亚子在吴江地区组织东南沿海最早的国民党地方组织之一——吴江县党部（左派），邵力子曾给予有力的支持与协助。那年初夏，邵力子委派复旦大学学生党员黄雅声（又名学诗）在暑假期间协助柳亚子工作，黄雅声是吴江震泽人，与邵力子之子邵复同住一个宿舍。黄回到吴江后，立即赴黎里镇与柳亚子、汝景星联络，并受柳亚子委托去震泽一带秘密发展党员。

8月24日，吴江县党部在盛泽镇成立，吴江所辖各区都有代表参加。这一天，邵力子、朱季恂、邵季昂、柳亚子、侯绍裘、张应春、陈亨利（陈去病之女）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其中侯绍裘与张应春都是共产党员。会上，邵力子、朱季恂、邵季昂、柳亚子等都作了演讲。

吴江县党部的建立，是柳亚子、邵力子积极推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成果，是国共合作的范例，它有力地推动了吴江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邵力子家在盛泽后街，与里中名儒徐佩青相邻，过从甚密，故而佩青之子徐蔚南从小与他相识，为世交。徐蔚南是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1923年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因邵力子的推荐，到绍兴省立第五中学任教。徐蔚南的散文力作《龙山梦痕》最早发表于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他的从兄徐遽轩也曾担任《民国日报》的编辑。1936年，邵力子任国民党中央宣部长，徐蔚南任主任秘书。盛泽大谢乡的陆荣光受邵力子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总干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里人张士一赴南洋公学读书，就是随同邵力子到上海的，后来张士一任中央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与邵力子仍有交往。里中汪永亨绸庄的老板汪鞠如，对盛泽丝绸业的发展多有贡献，他与邵力子也保持着经常的

往来。

邵力子与里人仲颐、沈鹏、张士一、徐蔚南、陆荣光、洪藩生等相友善。邵力子之兄邵伯谦是前清秀才，后业医为生，曾任上海某慈善机关的医药顾问。上世纪二十年代，邵伯谦与邵力子均为吴江旅沪同乡会成员，1926年夏，盛泽时疫流行，病死者甚众，里人惊恐，邵伯谦以旅沪吴江同乡会的名义，与上海红十字会斡旋，促成在盛泽分设时疫医院。医院于当年8月正式开业，免费为里人治病，里人得益颇多。

刘天韵



刘天韵像

刘天韵（1907—1965），“苏州弹词”艺术家，中国曲艺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委员。

刘天韵祖籍山东，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生于盛泽。父亲刘松山是山东济南府人，在家乡当了兵，随部队驻扎到江南，结识了上海南翔的一位姑娘，结婚成家。后来他转入了盛泽的水警队，定居于盛泽镇毛家弄。刘松山在水警队里的饷银很是菲薄，常常入不敷出；妻子持家甚俭，还在家中排了一台绸机，终年织绸以补贴家用。刘天韵有一个哥哥刘新声，比他大5岁；兄弟二人幼年时，父母就为他们领养了两个童养媳，刘新声婚后，夫妻间仍以兄妹相称。

盛泽是著名的丝绸之都，四方商贾云集盛泽采购绸缎，“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羸金至者无虚日”，故而市面十分繁华。本地的绸商每日上午聚集于“庄面”一带，从事丝绸交易，四乡农村织绸的机户也在“庄面”交绸卖绸，到了下午，“庄面”一落市，成群的绸行老板、伙计以及交绸的机户有了闲暇，大多喜欢“解茶馆”听书，故而盛泽镇上茶馆书场众多，是名闻遐迩的“书码头”。

苏州评弹是吴语地区（苏南、浙北和上海一带）最为普及的曲艺形式，评弹演员俗称“说书先生”，用苏州方言“说书”。苏州评弹分为评话和弹词两类，评话又称“大书”，由一人“说”、“表”，道具仅一块“醒木”和一把折扇；弹词又称“小书”，一般两人弹唱，以三弦、琵琶伴奏，有说有唱。

盛泽的书场多数为茶馆兼营，上午为茶座，下午与晚上略事布置就成了书场；此外还有一类是旅馆附设的书场，设施相对较好；最盛之时，盛泽有书场十余家。

刘天韵家的毛家弄北口是繁华的南大街，酒肆茶楼很多。畅乐园书场坐落在毛家弄口，书场为跨街楼建筑，外设茶馆，兼营点心，门面宽敞，终年生意兴隆，苏州评弹名家常在此献艺。

旧时，精明的书场老板经常在演出过半后放小孩子进场听书，俗称听“馊壁书”，意在培养后备听众。刘天韵幼年时经常进书场听“馊壁书”，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受到苏州评弹的熏陶，对评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5年，著名弹词名家夏莲生在畅乐园书场演出苏州弹词《三笑》。夏莲生本来是父子两人拼双档演出，不幸中年丧子，无奈只能放单档。夏莲生在演出时发现，每天总有一个小男孩在台下神情专注地听他弹唱，十分伶俐可爱，便有意收他为徒，以弥补失子之痛。这个男孩就是刘天韵。

夏莲生与刘天韵的父母商谈收徒学艺之事，刘松山夫妇虽然愿意让儿子拜名师学艺，将来也能成为“响档”挣大钱，无奈家境贫寒，一时拿不出一大笔拜师金来。最后夏莲生答应少收学艺的拜师金，但在学艺的“关书”上写明，跟师三年后再帮师三年。这叫“树上开花”，就是满师之后，跟师父上台演出，三年里分文不取。这在当时也算是通行的条件，故而刘松山只好应允，于是刘天韵辍学从艺，开始跟先生（师父）学习说书。

夏莲生师从谢少泉，自宣统二年（1910）出道登台后，继承了“谢派”《三笑》艺术特点，以噱头和起祝枝山、大跛、二刁等脚色见长。他与儿子夏筱莲拼档，说唱俱佳，名闻江南，成为民国初年的弹词响档。夏筱莲的早殇，对他打击很大，后卒于三十年代。夏莲生的徒弟徐云志、刘天韵后来都成为著名弹词名家。

那时所谓学艺，其实先生并不正式教课，只是跟先生“跑码头”，听书默记。学艺之外，更多的时间要为先生做各种家庭杂务，服侍先生一家。由于夏莲生当时嗜吸鸦片，教唱时常常感到精力不济，故而刘天韵主要由师母给予指点，每天学唱一只开篇，反复练唱，直到背熟为止。刘天韵从小聪明，悟性很高，学艺时一点就通，因此很快就有了长进。他每天清晨即起，吊嗓子，学弹三弦和琵琶；盛夏时节，关在房间里背开篇；隆冬季节，把冻得通红的小手浸在冰冷的水里，

然后练弹琵琶，直到手指弹热为止。经过这一段幼年的苦练，刘天韵终于练就了久唱不疲的童子功力。

1918年，才满十周岁不久的刘天韵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随师登台，每天在开书前加唱一曲开篇，挂牌艺名为“十龄童”。当时，说书先生在每家书场的演出时间都很长，动辄连演数月，而每日所唱的开篇又不可重复，刘天韵能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如此多的开篇，其艰辛可想而知。刘天韵口齿伶俐，字正腔圆，所唱开篇深得听众好评，“十龄童”小先生就此一炮打响。

在上海演出之后，他又跟着先生到处去“跑码头”。当时刘天韵还是个孩子，穿了长袍坐在台上，用清脆的童音说唱，很招听众喜欢；尤其是那些女听客，看他满脸的稚气，更是怜爱有加。夏莲生靠着刘天韵的吸引力得益良多，于是越发舍不得放他离去。虽然“关书”上写明帮师三年，但实际上他与先生拼档说书，足足帮了五年，直到17岁成年之后才离开先生。

当时学说书最要紧的事在于得到一部完整的脚本，那是说书的主要资本，脚本越丰富、完备，演出的竞争力就越强。刘天韵的出科书是弹词《三笑》，他与先生分手时，先生交给他一个纸包，他打开纸包一看，里边并不是《三笑》的脚本，只是一些零星的唱词和开篇。就这样，一位年轻的说书先生，开始了他艰难的闯江湖的生涯。

刘天韵决心首先要把自己的脚本充实起来。他先后与师叔郁莲卿、潘莲艇、崔莲君拼档，充当下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还与王亦泉、王似泉拼三个档说唱《三笑》。他在拼档说书的实践中，努力学习书艺，积累脚本，还抓紧一切机会，聆听夏荷生等名家响档的演出，以弥补自己“奶水不足”的弱点。后来刘天韵的《三笑》演出本，博采各家之长，内容充实，语言机妙，镂刻细致，理顺辞畅，有不少地方超过了先生。

他在辗转于江南城乡的码头说书献艺的过程中，注意观察生活，了解社会各行各业的习俗，同时虚心学习各派名家说唱弹唱的长处，渐渐地熟悉了书台，熟悉了听众，磨砺了自己的说唱技艺和表演能力，也磨砺了对人生的观察和剖析能力，故而艺术日渐精湛，在码头上声誉日臻。

由于当时说《三笑》的人比较多，为了增加一部演出书目，他又向金耀荪的传人张梅卿补学了传统书目《落金扇》，同时虚心向与他拼档并会说《落金扇》的唐竹坪讨教，一度还把弹唱《落金扇》的名家潘莲艇、庞学庭请到家中来指点、辅导。为了创出自己的特色，他另辟蹊径，避开自己不擅长的生旦角色，致力于副末、彩旦、小丑一类角色，以发挥自己的特长。1938年，他与徒弟谢毓善拼档，

说唱《三笑》与《落金扇》，世称《刘谢档》，名噪一时。

刘天韵一生追求进步。上海解放前夕，他借住在沧州书场底层的小屋里，与评话名家唐耿良为邻。1949年5月，解放大军已经迫近上海，一天深夜，他在阳台上看到国民党军队仓惶逃窜，第二天清晨，又见解放军战士露宿于街头，心情激奋不已。当时，闸北地区还在激战，他不顾特务寄给他的恐吓信，毅然上台播唱喜庆上海解放的开篇，表达他对新中国的向往与热爱。

新中国成立后，刘天韵积极参与现代书目的创作与演出。1949年，上海评弹改进协会组织演出书戏《小二黑结婚》，刘天韵积极参与，扮演戏中的三仙姑，由于他对这一类角色比较熟悉，因此它的表演在整部戏中尤为出彩。在紧接着掀起的说新书的热潮中，他与谢毓菁搭档说唱长篇弹词《小二黑结婚》，赢得了听众的好评，在1951年上海市戏曲春节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刘天韵在编新书、说新书上所表现的热忱和展示的书艺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同行们也在他身上看到了编说新书的潜能。1950年抗美援朝时，评弹界为了捐献飞机大炮，排演书戏《三雄惩美记》，他与张鉴庭、姚荫梅三人珠联璧合的精彩演技，使书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接着又排演书戏《林冲》，他把陆谦这个人物的阴刁险恶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一时期，刘天韵不仅在艺术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且他积极参与评弹界的各种社会活动。1951年，上海评弹界组织抗美援朝宣传队赴北京、天津巡回演出，他是宣传队的主要演员；为了推广新书，他与蒋月泉、张鉴庭等人组成说唱新编长篇书目的小组，克服种种困难，背了乐器、行李，去苏南一带城乡演唱。

1951年，上海组建第一个国营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前身）。由于旧时的评弹演员都是自由职业者，从事单干，经济收入十分可观，如果加入国营艺术团体，拿固定工资，收入将大大减少，因此评弹界的许多名艺人都持观望的态度。此时，刘天韵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憧憬，毅然放弃单干的高额收入，率先参加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成为首批加入的18位演员之一（被称之为“十八艺人”的是刘天韵、蒋月泉、唐耿良、周云瑞、陈希安、谢毓菁、王伯荫、张鉴庭、张鉴国、张鸿声、姚荫梅、徐雪月、程红叶、程红霞、吴剑秋、朱慧珍、韩士良、姚声江），为广大评弹艺人作出了表率，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团长。

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成立后，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工厂、农村和海岛前线，满腔热情地为群众演唱，同时通过深入生活，提高思想觉悟，创作了一批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书、新脚本。

1951年11月23日，成立才数天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18位艺人参加

了上海文艺界“治淮”工作队，赶赴安徽的治理淮河水利工地，一边参加劳动，体验生活，一边为工地上的劳动者演出，进行文艺宣传，前后历时四个月。

“治淮”工地上的所见所闻，让评弹艺人们深受感动，他们以“治淮”工地上的劳动者为原型，创作了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于1952年4月首演。这是苏州评弹第一次以中篇的形式反映祖国建设的作品，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艺术风格和新的故事内容，引起了社会广大观众、听众的热烈反响和文艺界对评弹艺术的高度关注，也提高了评弹在文艺界的地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连演数月而不衰，场场客满；刘天韵在其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贫农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书中的一些唱段如《赵盖山报名》、《留过年》、《新年锣鼓响连天》等迅速为听众所熟知，至今传唱不绝。刘天韵也通过参加“治淮”劳动和演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艺术创造和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

1953年，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演员们又深入部队生活，创作了一部反映海防前线英雄业绩的中篇评弹《海上英雄》，刘天韵参加了中篇的首演，深受听众好评；随后，他们又赴广东沿海各海军驻地作慰问演出，慰问部队官兵。同年秋，他又参加了中篇评弹《刘胡兰》的演出。

作为评弹团的第一任团长，他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但他深知当领导实在非己所长，只有在艺术创作的领域里，才是他施展才能、翱翔自如的广阔天地；因此他把团里的行政工作交给上级派来的政工干部主持，自己仍然致力于评弹新书的创作和演出，直到1954年，上级才批准他解脱了行政工作的重负，改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艺术委员会主任。

1954年，评弹团根据评弹艺术的特点和听众的要求，恢复了一度停演的逐日连续说唱的长篇书目形式。刘天韵与苏州弹词流派“丽调”的创始人徐丽仙拼双档，演出长篇弹词《杜十娘》和《王魁负桂英》。长篇书目的表演注重制造悬念，安排好书中的“关子”，以吸引听众，但是这两部书的情节都并不曲折，矛盾冲突也不太剧烈。为此，刘天韵在编演中致力于人物的刻画，成功地创造了两个善良、多情而又性情刚烈的女子对利禄熏心的负心汉进行勇敢抗争的艺术形象。刘天韵的卓越的说表和角色的刻画，加上徐丽仙悦耳动听、声情并茂的唱腔，使《杜十娘》中的《梳妆》和《沉箱》、《王魁负桂英》中的《阳告》和《情探》等回目超越了一般传统书目的水平，成为脍炙人口的保留回目。

1956年，刘天韵开始对长篇弹词《三笑》进行整理和加工，删除低级庸俗的笑料，提升脚本的品位，使此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为提高，演出效果更佳；1958年后，他与徐云志的学生、弹词名家华士亭拼档说唱《三笑》，名闻江南。

自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成立之后，刘天韵除了说唱长篇弹词《三笑》与《落金扇》外，参加演出的中篇有《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林冲》、《猎虎记》、《刘胡兰》、《后方的前线》、《雪里红梅》、《老地保》、《三约牡丹亭》、《点秋香》、《王佐断臂》、《白虎岭》等许多部，其中有根据传统书目改编的，有历史题材，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现代题材；参与改编和演出的现代题材短篇书目有《孟广泰老头》、《错进错出》、《营业时间》、《学旺似旺》等，演出的选回有《玄都求雨》、《义责王魁》、《面试文章》、《姜拜》、《小厨房》等，演出书目之多，题材之广，在当年的老艺人中实属少见。

1962年，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赴香港演出，刘天韵任副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苏州评弹第一次去香港演出，它直接影响到祖国文艺事业的声誉，因此方方面面都予以极大地关注。刘天韵除了以自己的拿手杰作《玄都求雨》、《三约牡丹亭》等作为主要节目外，还主动为其它演员充当下手。

他们在香港的演出大获成功，盛况空前，媒体上有“掌声掀翻屋顶”之称誉。在演出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刘天韵突然发病，手脚麻木，不能登台演出。从香港回来后，他基本上脱离了书台，在家里养病。在病中，他还是牵挂着评弹事业，每天除了授徒，就是记录、整理长篇弹词《三笑》的脚本。

对于脚本，他是有着切肤之感的。在旧社会，评弹演员要得到一本完整的脚本是十分艰难的；他的《三笑》脚本语言精练，内容完整，是许多演员梦寐以求的珍本，现在他要把自己的脚本完整地纪录下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评弹事业。同时，他还以单档的形式，将其中的《王老虎抢亲》一段在电台录了音；他还把评弹团学馆的学员叫到家里，手把手地进行辅导。他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总想尽可能地把一生积累的艺术创造与心得多留一点下来。可惜的是刘天韵辛辛苦苦记录整理的《三笑》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送进了废品回收站，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1964年冬，刘天韵的病情日趋严重，在卧床半年多之后，渐渐失去了意识，最后于1965年9月逝于上海，终年59岁。

刘天韵从艺后，没有与家中的童养媳成亲，后来在上海结了婚。家中的童养媳对刘天韵爱之甚深，竟然因此而抑郁成疾；刘天韵为她延医治病，病好后另行嫁人。

刘天韵的侄女刘韵若，自小聪颖活泼，富于艺术气质；然而刘天韵因备尝旧社会艺人的辛酸，故而不准她从艺，他说：“刘家第二代不吃开口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他才允许侄女正式学艺。刘韵若得到叔

父的亲授，书艺精进，很快就成为响档，在1965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刘韵若以一曲《送瘟神》开篇名动江南。刘天韵与侄女多次合作，弹唱《三笑》中的《追舟》、《小厨房》、《误入房厅》等，叔侄同台，相得益彰，颇获听众好评。

在近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中，由于刘天韵经常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善于向兄弟艺术剧种借鉴和吸收营养，广采博引，并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卓越而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刘天韵的唱腔以“山歌调”和“陈调”见长，所起角色以丑角见长。

他在说唱长篇弹词《三笑》时，以“山歌调”（如《追舟》）、“乱鸡啼”（如《祝枝山看灯》）最为擅长。虽然他的唱腔基本采用一般的书调，个人风格并不鲜明，但他注重从生活及书情内容出发，往往以平直的唱腔，生动地表现出人物性格及特定环境下的思想感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老地保·茶访》中洪奎良的唱段中，他充分发挥了弹词唱调中的语言因素，平易朴质，流畅达意；其中“老客人僚啥能格资格好，看来僚从前亦做过老地方”两句，旋律平淡，而语气生动贴切，现场效果极好，是体现弹词唱腔说唱特点的成功范例，常为听众称道。

刘天韵善唱抑扬顿挫、慷慨苍凉的“陈调”。中篇弹词《林冲》中的选曲《踏雪》，经过他的二度创作，唱腔更显得气魄雄健，情景交融，成为脍炙人口、百听不厌的弹词选曲作品。此外，在长篇弹词《王魁负桂英》的选回《义责王魁》中，王忠的唱篇以“陈调”来抒发这位耿直老人的凛然正气，赋予传统曲调以新的意蕴，充分发挥了刘天韵弹唱艺术的情真意切的现实主义特色，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评弹着力于塑造人物，刘天韵也以角色表演为其特长。他注意观察生活，熟悉各种人物的性格，熟谙各种戏曲的表演艺术，又有演出书戏的舞台经验，由此他发展了评弹的表演艺术，尤其注重研究彩旦、小丑一类脚色的表演，在书台上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如《三笑》中的祝枝山、石榴和大跛、二刁、《落金扇》中的孙赞卿、陆福、《林冲》中的酒店小二和山神庙中的陆谦、《猎虎记》中的乐和、《白虎岭》中的孙悟空、《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王佐断臂》中的哈迷蚩等众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以精湛的演技、深厚的艺术功底，通过说与演，体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活动，可以说他把这些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都演活了。他创造性地塑造了《义责王魁》中的王忠，不但人物形象生动感人，而且由于他的表演，使整个选回成为评弹新编书目中的精品；后来这一选回改编为京剧，成了京剧大师周信芳的保留剧目。他说唱《三笑》，不但注意唐伯虎、秋香、祝枝山等主要角色的塑造，而且对次要角色的塑造也一丝不苟。如描绘石榴爱唐寅之深，通过她爱中含怨、怨中含爱的一片痴心来进行烘托，使听众越品越有味。

他的说表凝练老到，富于激情，语言丰富生动，形神兼备，情意交融。他对《三笑》一书，钻研得极深，经过他的重新整理后，去芜存菁，主题鲜明。在旧社会，他常常不得不以嗝噓媚俗；而在新书坛上，他认识到“噓”应该从人物性格和情节需要出发；因此他在演出中大胆地摒弃脱离书情、破坏人物形象的低级噓头，着力于塑造人物和组织情节，提高了书目内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净化了舞台。他擅演丑角的艺术才华在新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往往一段说罢，彩声满堂。在《三约牡丹亭》的演出中，尽管他对起大跛这个角色早已驾轻就熟，但他根据整理旧书目的要求，不满足于浅层次的滑稽调笑，而是从挖掘人物愚蠢、自私、怯懦的个性内涵出发，着重对这个低能、好色的相府公子的卑琐灵魂的刻画，增加了嗝噓的深度。

刘天韵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十分娴熟地掌握了评弹的艺术规律，已经使自己与书台化为一体。他能运用自如地调动评弹的各种艺术手段，得心应手地表现自己所要表现的一切，一上书台，便左右逢源。他以自己的语言、声调、表情和形体动作，淋漓尽致地表现书目内容，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使整个书台成了他挥洒自如的表演空间。在中篇评弹《雪里红梅》中，他甚至背朝听众，照样能表现人物内心的激动，称得上“背上有戏”。在《林冲·酒店》中，他通过店小二一个人接待张勇、林冲、陆谦三批客人，叙述了林冲的艰难处境和陆谦到沧州图谋加害林冲的情节，整回书的进展全由店小二一人贯穿。由于他借鉴了昆曲丑角的手面动作，凭着一方手帕，有说、有唱、有做地描绘了店小二机敏热情的性格，应对流利，使整个书台活跃热烈，书情贯串，充实动人。

刘天韵十分重视向各类艺术形式学习和借鉴，他在传授学生时常说：“艺术是相通的，要多听京剧、昆剧，以加厚艺术底子。”他很喜欢听京剧名家李桂春的《包公怒铡陈世美》，有一次在剧场听京剧时，因为听得如醉如痴，连身上穿的皮袍背面被毛贼剪掉了一大块也毫不察觉，到了散场之际，狼狈不堪，此事在同行中被传为笑柄。他平素还爱好种花和养鸟，以从中寻求艺术的灵气。

刘天韵在塑造人物和表演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一是由于他对民族曲艺表演艺术的深厚功底，二是他自幼浪迹江湖，接触社会底层，对生活有着丰富的积累和深切的感受，他熟悉各阶层的人物，又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对是非善恶，爱憎分明。他以人生境界化为自己的艺术境界，情动于中，因内符外，从而形成形神合一、心入于境、物我同化、注重真情实感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并在这种风格的推动下，发展了“融说、演于一体”的艺术特色和“化表叙语调为人物口吻的角色道白”的说表方法，说也如演，演也如说，增加了表演的真挚、真诚和真实感，

也加强了感染力。他的表演风格受到美学家王朝闻的高度评价。

刘天韵在书台上既充满激情又严谨认真，他从服饰、台风到表情动作，都注意艺术形象的完美，一丝不苟：衣着必求整洁得体；所用道具，虽只有手帕与折扇，也求雅洁大方；手面动作，一招一式从不乱动，动必规范到位；一切为了刻画人物，表演人物，抒发人物的真挚感情。有一次，他在演出新书时有一段急口唱词，因为初次上演，尚欠熟练，因此在演唱中“吃了螺蛳”（出现口误），下台之后，他竟坐在后台暗自流泪自责。

在评弹界，刘天韵有“艺术大师”之誉。他参与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小二黑结婚》等作品的创作，在同行中有较大的影响；他还对传统弹词脚本《三笑》、《描金凤》以及《林冲》、《王魁负桂英》等进行了整理与改编。刘天韵的弹词代表作《玄都求雨》的演出脚本曾被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发表。他还对弹词曲调中的“山歌调”和“乱鸡啼”等曲牌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润色，使之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更接近于主人公的劳动者本色。他在弹唱时，对曲调的快慢、高低和跌宕起伏的节奏掌握得恰到好处，臻于完美，入于化境。谢毓菁曾叹服说：“先生已把这种曲牌唱绝了。”

刘天韵的表演艺术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也得到许多领导、专家的高度评价。在为中央领导演唱著名的“陈调”唱段《林冲踏雪》时，毛泽东曾为之喝彩：“唱得好！”他也为刘少奇演唱过《玄都求雨》，弹唱时欢哈嗝噱，情动四座；周恩来曾与刘天韵切磋书艺，建议他“悲哀的方面要减少些，反抗的方面要增加些。”他听后极为心折，后来他的《林冲踏雪》唱段充分突出了林冲的满腔义愤，演出效果更好；酷爱评弹并对评弹艺术有着极高欣赏水平的陈云也称赞“刘天韵是个好脚色”，并说：“青年演员要多听说表好的传统节目，象刘天韵的《求雨》、《老地保》等。”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对刘天韵的说书艺术十分钟情，他曾说：“我很敬佩刘天韵，他演的角色，不管是正面或反派角色，都演得出神入化。春、夏、秋、冬四香（四个丫头）的不同性格和神情，都能从他的口、眼、身、手中表现出来，让我很受启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天韵的说唱艺术进入了他的巅峰状态，而最足以代表他的现实主义表演体系的优秀作品，当推1956年演出的选回《玄都求雨》和1959年演出的中篇《老地保》。

《玄都求雨》原是长篇《描金凤》的关子书，共有六七回，经过评弹名家姚荫梅的精心改写后，去芜存菁，浓缩成一部80分钟的短篇书目。原书的基础很好，但过去因为演唱者思想上的局限，单纯从增添笑料着眼，过分渲染了钱志节的诈

骗和生活不检点的一面，从而削弱了对官僚愚昧、昏庸、残忍的讽刺。刘天韵从自身江湖卖艺的经历与感受出发，以设身处地的体验，入木三分地描述了钱志节因误揭皇榜而陷入官僚们的圈套，在困境、绝境中的忧急、愁苦、怨愤的交织心情，把钱志节在九死一生中为求一线生机而采用的装神扮仙，嬉笑怒骂，刻画得淋漓尽致。为了表现钱志节心中想哭，但又要强装嘻笑的复杂心情，他运用深入人物内心的独特演技，“看，是人物在笑；听，是人物在哭”，人物的以笑代哭，给听众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在中篇《老地保》的《茶访》一折中，刘天韵所演的洪奎良在听到清官白溪愿意为徐慧兰平反冤狱的承诺后，眼望苍穹，以手指天，充满喜悦、振奋和感激之情，高呼一声：“头上到底是天啊！”这完全是刘天韵画龙点睛的创造，道出了人物深信公道自在人间，正义定能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刘天韵用自己的精湛艺术塑造的不仅是人物的性格，他更塑造了人物的人格。他以一种热烈、崇高的感情力量，打动听众，并给他们以审美上的极大满足。

从《玄都求雨》到《老地保》，刘天韵形成了自己杰出的现实主义说书风格。他的艺术发展所达到的高度，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评弹艺术发展的高度。

1995年10月26—30日，上海市文联等单位举行刘天韵艺术成就研讨会和纪念演出，纪念刘天韵诞辰90周年。

2002年9月16日，上海市文联、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与盛泽镇人民政府共同



刘天韵铜像

在盛泽目澜洲公园内举行评弹艺术大师刘天韵铜像揭幕仪式。铜像由上海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章永浩创作，基座的正面镌刻着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书写的碑名：“评弹艺术大师刘天韵像”；基座背面的文字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吴宗锡撰文的刘天韵生平：“刘天韵（1907—1965），出生于江苏吴江盛泽镇，八岁习评弹，十龄登台，广采博纳，造诣精深，卓然成家，驰誉海内。建国后，注力评弹改革，潜心整旧创新，成果丰硕。其说唱贯珠振玉，表演动情传神，以热烈纯挚之真情实感直面人生，自成现实主义说书体系。艺馨德劭，时人奉为大师，陈云赞称‘是一好脚色’。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评弹艺术颠峰时期领军人物。二零零二年九月吉日立。”

刘天韵生前深爱家乡的水乡风貌，尤其对目澜洲的景致情有独钟，曾说：“目澜夕照，水天空阔，使人情思无限，是孕育艺术性灵的！”如今，刘天韵的铜像矗立在目澜洲的旱船处，他额头宽阔，目光炯炯，身穿长衫，手执折扇，嘴角略露笑容，再现了他在书坛上说唱贯珠振玉，表演动情传神的舞台形象。

潘文渊

潘文渊（1912—1995）是世界著名的无线电专家，美国无线电公司微波研究室主任、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发展集成电路技术和电子产业的主要推手，被誉为台湾的“半导体之父”。

潘文渊祖籍浙江嘉兴市油车港镇。潘氏为油车港望族，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嘉兴，潘氏家族在战乱中举家迁至盛泽定居。潘氏后人潘筱波（1870—1930）有四子，依次为伯良、友良、国良、简良。潘伯良（1892—1954）在盛泽镇区的丝绸交易中心区域——“庄面”北侧的潇湘弄内开设一家“潘伯记丝行”（今潇湘弄12号），前边的门面为丝行，后边三开间两厢房的楼屋作住宅。

潘文渊是潘伯良的儿子，生于1912年7月15日，他在盛泽读完小学后，于1925年考入了嘉兴的秀洲中学。嘉兴虽属浙江省，但与盛泽相距仅18公里，是离盛泽最近的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地在人文与经济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当时盛泽还没有中学校，因此许多盛泽的学子都报考近在咫尺的嘉兴秀州中学。

秀州中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0年的秀州书院，1918年改名为秀州中学，是当时嘉兴地区的最高学府。学校以“培养高尚人格，增进学生智能，



潘文渊像

预备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以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就有陈省身、李政道、潘文渊和程开甲等 10 位中外科学院的院士。

在中学期间，潘文渊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曾担任秀洲中学的学生会总务部主任。1931 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在学习期间，他将报考时填写的籍贯浙江嘉兴改为江苏省吴江县。

潘文渊大学毕业后，于 1937 年公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无线电系留学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无线电权威弗雷德·特曼教授（1900—1982）。

弗雷德·特曼自 1924 年起任斯坦福大学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并着手创办电子通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是美国西海岸技术革命的中心。1945 年弗雷德·特曼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并从 1951 年起筹划成立斯坦福工业园区；后来工业区改为研究区，奠定了“硅谷”电子产业的基础，成为美国和全世界纷起效尤的高技术产业区的楷模。同时，研究区也为斯坦福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财力，用以聘进名流教授，培养“人材尖子”。到 1960 年，斯坦福大学已经跃居美国学术机构之前列，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名牌大学，而弗雷德·特曼也被誉为“硅谷之父”、“电子革命之父”。

在弗雷德·特曼教授的指导下，1939 年潘文渊获得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硕士学位，1940 年又获博士学位，旋即任职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电波放射实验室。据潘文渊的四叔潘简良（原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稻麦专员）介绍，潘文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参与了雷达的研制与改进，是雷达的重要发明人之一。雷达的发明，曾经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与战争背景，也因为雷达的重要性，有许多国家都在极度保密的前提下各自进行独立的研究，而且对于雷达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公诸于世，因此，也许很难认定究竟谁是具体的发明人，完全可能是一项“同时发明”的新技术。

1945—1974 年，潘文渊进入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普林斯顿实验室，出任微波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超短波（UHF）技术。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凭着顶尖的技术，成为全球无线电行业的泰斗；1950 年又发明了全世界第一只全电子彩色电视显像管，标志着彩色电视时代的来临。

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的 30 年里，潘文渊先后发表了科技论文上百篇，获得 30 项美国专利和 200 项国际专利，其中包括彩色电视的研发，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无线电专家。1958 年，潘文渊成为美国无线电工程学会（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前身）会士，1961 年，又获得纽约中国工程师学会杰出成就奖，美国科学促进会向他颁赠会士资格，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潘文渊的夫人沈文采是盛泽开明绅士沈鹏的次女，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沈鹏（1883—1982）是民国初年活跃在政、商两界重要人物，他于1906年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第五期，曾在上海两次参加辛亥革命武装活动。在革命低潮时，他回到盛泽创办实业，1916年在华阳街开办经成丝织厂。由于沈、潘两家近在咫尺，又有商业上的来往，因此经人作伐，结成了秦晋之好。1949年，沈鹏去台湾定居，在台湾的军界、政界、经济界人脉极广。

潘文渊、沈文采夫妇在赴台湾探亲之际，与台湾的经济、科技界人士有着较多的联系。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潘文渊在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如日中天，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因此受到台湾有关当局和实业界的瞩目。

1968年，受时任台湾“交通部长”的孙运璿的委托，潘文渊为台湾“交通部”及电信研究所组织顾问团，协助台湾策划技术研发的方向。1973年台湾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时任台湾工程师学会理事长的费骅与潘文渊讨论台湾科技发展的方向，决定向电子业发展。1974年，潘文渊应台湾“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等人的邀请，考察台湾电子工业。他向台湾“行政院秘书长”费骅和“经济部长”孙运璿提出建议，以发展集成电路技术作为未来台湾新兴工业的发展方向，以技术密集型工业区取代过去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区。

潘文渊所提出的关于发展集成电路技术的建议，是帮助台湾产业向高科技转型的最有效的方式。在得到台湾有关当局认同后，潘文渊随即回到圆山饭店“闭关”十天，写出了“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计划草案”。此后，他又受聘担任台湾“经济部”顾问，并说服了当时的台湾行政领导人，获得上千万美元的经费用于引进美国的集成电路技术。

集成电路又称微电路、微芯片，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它采用一定的工艺，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二极管、电阻、电容等元件及布线互连一起，制作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成为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构；其中所有元件在结构上已组成一个整体，使电子元件向着微型化、低功耗、智能化和高可靠性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当今半导体工业大多数应用的是基于硅的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引出线和焊接点少、寿命长、可靠性高、性能好等优点，同时成本低，便于大规模生产。它不仅在工业和民用电子设备如收录机、电视机、计算机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在军事、通讯、遥控等方面也得到广泛的应用。用集成电路来装配电子设备，其装配密度比晶体管可提高几十倍至几千倍，设备的稳定工作时间也可大大提高，因此成为近几十年来发展最

为迅猛的一个产业领域。

1974年9月，潘文渊决定提前退休，集中精力协助台湾发展集成电路技术，他努力说服了自己的夫人，并在夫人的支持下正式向美国无线电公司提出辞呈。同时，他向台湾有关当局提出了“不做官，不受薪，只收回旅费及住宿费用，每年去台湾三次，每次停留两个月”等三项原则。

他还与孙运璿、李国鼎等人发起成立以海外华人为主要成员的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由他亲自担任领导人，充分运用他在美国工业界的关系与影响力，并发挥他领导科技研究的经验与天赋，带领这个百余人的顾问团队，为台湾发展集成电路提供技术谘询，为台湾电子工业的发展做了不少开路奠基的工夫。在他的带动下，一批长期在海外从事电子技术科研工作的高科技人才来到台湾，投入半导体产业，成就了台湾近30年来半导体、光电产业的快速发展。

1975年，潘文渊又说服了他曾为之服务了30年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层主管，以350万美金的较低价格，向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转移集成电路先进技术，并为台湾培训300余名技术骨干人才。

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没有人懂得半导体，对于如何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在潘文渊的牵针引线下，1976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工业发展中心的40余位青年工程师参与了第一期集成电路示范工厂的设置计划，赴美国无线电公司培训，成功引进了集成电路技术。

1979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工业发展中心的集成电路技术开始向民间转移，开办了一大批现代化的电子工厂；1982年，潘文渊又协助台湾进行超大型集成电路的研究，1987年在完成超大型集成电路研究的基础上，衍生了“台湾集成电路公司”；1993年又协助台湾进行“次微米制程技术计划”的研究。

台湾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科技研究和生产很快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94年，台湾半导体产业规模居全球第四，翌年则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三大半导体产地，并由此而导致台湾经济的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应该说，潘文渊功不可没。

潘文渊为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长年奔波在美台之间，而它的夫人沈文采则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毅然放弃了美国新泽西大学长达18年的教职。潘文渊是一位谦谦君子，他总是把功劳归于别人，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为台湾所作的努力。沈文采曾在197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说到他们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奔走的往事：“多年来，文渊经常与我讨论如何帮助中国做些事，显然，这是他在尚未老到无法做任何事之前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在1975年之前，（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集成电路计划正在进行，文渊花了许多心力协助。这多少影响到我们家庭，于是我

们做了一次家庭讨论。文渊希望立即放弃自己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管理职位，提早退休；其次是我必须配合文渊经常得飞回台湾，放弃在新泽西州永久任教之资格。那时候，我已教了18年的书，工作的安全感与高薪让我难以割舍，再加上财务上骤然的庞大损失，让我难以同意他的一腔热血。后来，我们做了更多的讨论，我终于同意国家第一，个人幸福第二。我是女性，而女性应与男性担负同样的责任。集成电路计划对台湾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它可以让台湾电子工业由劳力密集转向技术密集，对我们潘家而言，这是一个能为祖国经济繁荣贡献心力的机会。”沈文采坦言：“了解文渊如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披荆斩棘让计划成功，因为他过去营运的计划从未失败过，而且他是多么需要家人的体贴和支持，所以，我终于投降了。尽管有如此之牺牲，但我还是很高兴得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已有成功的产品问世。像吉普赛人似地两地奔波，令我痛苦，但如今回想起来，一切都是值得的。”

作为一名海外学人，潘文渊没有受过台湾的教育，没有在台湾定居，没有领过台湾的薪水，却为台湾制定了第一份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计划，之后又为落实这项计划而提前从美国无线电公司普林斯顿实验室总监的岗位上退休，转而在美国和台湾两地之间奔走，竭尽全力让集成电路技术在台湾扎根；他还先后辅导工业技术研究院的5位院长以及多位台湾科技领军人物的研发工作，关心华裔子弟的科技教育，时刻不忘集成电路以及其它科技在台湾的发展。由他领导的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也一直为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科技研发方向进行指导。正是在潘文渊一系列呕心沥血的努力之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经济腾飞的支柱，因此潘文渊被台湾科技界尊称为台湾的“半导体之父”。

1993年，台湾交通大学向潘文渊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及“杰出校友”称号。

1995年1月，潘文渊在美国病逝，享年84岁。为了纪念这位台湾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台湾的“半导体之父”，1996年在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内成立了“潘文渊文物纪念馆”，并由台湾科学界和产业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潘文渊文教基金会”，用以培训与半导体相关领域的技术人才和奖励杰出科技人士，藉以延续潘文渊的遗风，为科技界的后起之秀提供发展的机会。

2001年，为纪念集成电路技术引进台湾25周年，纪念潘文渊这位台湾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推手，传承他开创台湾科技产业的先锋精神，表彰他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由当年赴美受训的团队共同发起，在“潘文渊文教基金会”名下设置“潘文渊奖”，奖励对台湾科技产业的拓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奖金额达500万元新台币，为台湾科技界的最大奖项。

长年生活在海外的潘文渊心中始终牵挂着祖国和家乡，当他得知国内正在研发彩色电视时，便托人捎带彩电样机及彩电线路图回国，供国内科研人员参考。当家乡有关部门因撰写文史资料向他索要个人的业绩资料时，他亲笔回信，谦虚地表示：“过去的所谓‘发明创造’，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堆玩具而已，不值得称道”，信中以“不求闻达”婉辞，表现了一位大科学家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引进“外智”工作。1983年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接着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1988年，张劲夫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席的名义，邀请“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文渊访华。

1991年5月，潘文渊应邀携夫人及子女回国访问，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了他们一行，之后，他们又在国家科委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回到了家乡盛泽，在潇湘弄潘氏旧居停留数小时，缅怀历历往事，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

“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是在美华人工程技术界人士最大的组织，在世界华人圈中有着很大的影响。随着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在潘文渊的努力下，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大陆的合作前景柳暗花明。1992年，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在旧金山召开的理事会年会上，通过了一项同大陆开展技术交流的决议。1993年10月18日，首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开幕，此后，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双方通过广泛的合作，对中国的产业调整和技术研发提出建议；同时，这种机制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通过学会专家一轮轮的回国考察和研讨，不断地在国外扩散影响，而由此产生的辐射效应，又带动更多的华人回归国内发展。

上世纪末，随着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渗透着潘文渊许多心血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国内转移，吴江也成为半导体产业集聚发展的重点地区之一。近年中，台湾的半导体工厂纷纷落户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吴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添砖加瓦，成为吴江经济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许是潘文渊当年没有想到的。

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出生于盛泽，中共党员，物理学家、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常委；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代表、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

程开甲的家在盛泽镇的毛家弄。程氏祖籍安徽，祖父程敬斋在盛泽经商，然而他对子孙的最大期望却是读书，走功名之路；但是他惟一的儿子程侍彤最后连秀才也没有考上，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的身上，还为未出生的孙子取名开甲。程开甲的母亲董云峰是程侍彤的小妾，就在程开甲出生的前一天，祖父咽了气，父亲又不善经营，于是程家的家境日渐败落。

程开甲8岁那年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因地位低微，忍受不了屈辱而离家出走，使他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创伤。少年时代的程开甲在盛泽绸业小学读书，由于饱受冷落，他的性情变得孤僻



程开甲像

而胆怯，在读二年级时竟然连续留了两级，家人只得将他转到了淘沙弄小学。后来，他的五姐调到盛泽的观音弄小学（现在的盛泽实验小学）教书，于是又将他转学到了自己身边。在五姐和校长简晓峰的关心和督促下，程开甲开始振作起来，发奋读书，立志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才。

小学毕业后，程开甲于1931年考入了浙江嘉兴的秀州中学。秀州中学创建于上世纪二十世纪初，在著名教育家顾惠人校长的倡导下，学校的教育具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的特色，十分重视创新思维的训练，在江浙一带颇具盛名。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中先后有陈省身、李政道、顾功叙、谭其骧、周廷儒、周廷冲、钦俊德、方怀时、潘文渊和程开甲等10人成为院士。

程开甲在这里读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巴斯德、居里夫人、詹天佑等许多科学家的传记，他深深地被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所打动，从此他处处以科学家为榜样，刻苦钻研，学习成绩迅速上升。初一时他的成绩平平；到了初二，他开始冒尖了，尤其是数学和英文非常出色。他对数字的超常记忆力让全校师生为之折服，能轻松地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之后60位，还能将1—100的平方表倒背如流，能记住每一个数学公式……他还在浙江省首次举办的中学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此后，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为一生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对数字和数学公式的超常记忆力，在他日后70余年的学习和科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程开甲高中毕业，报考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所大学同时向他寄去了录取通知书，由于浙江大学给了他只有个别优秀考生才能享受的“公费生”的待遇，因此他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成了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不断地“流亡”，从杭州迁到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再到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程开甲就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学业。

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的严格的科学精神的训练，奠定了扎实的功底，同时也坚定了科学报国的信念。三年级时，他在听了陈建功教授的复变数函数论后，撰写了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的赏识，并推荐给英国数学家Tischmarsh教授发表；之后，文章又被苏联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1年，程开甲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助教，他边工作边坚持学习研究，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他受束星北相对论的启发，完成并发表了论文“用等价原理计算水星近日点移动”；又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上，用正则运动方程

推导出物理学权威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完成了“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后来这篇论文由狄拉克推荐发表于剑桥大学的《剑桥哲学杂志》。

1944年，程开甲完成了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亲自对其修改后送交狄拉克。遗憾的是狄拉克对基本粒子的看法有些偏执，他给程开甲的信中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因此使文章未能发表，程开甲也就此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后来被外国人的一个重要实验所证实，而且实验所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这项成果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程开甲就这样遗憾地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程开甲还和王淦昌合作研究，写出了论文《基础粒子的五维理论和质子的质量》，寄给《物理评论》发表。

1946年8月，经李约瑟博士的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物理学大师、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玻恩教授的学生。在玻恩的门下，出过不少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其中有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福克斯、海森伯、费米，还有中国的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等四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玻恩那里，程开甲主要从事超导理论的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锚》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份量的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双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超导电性来源于导带之上的空带中，布里渊区角上出现电子不对称的奇异分布”。在玻恩身边的四年里，他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分歧，还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缪勒、鲍威尔、泡利、海森伯、马菲尔德、玻尔等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大师。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英国皇家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4月2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前一天，英国皇家海军的“紫石英”号护卫舰贸然驶入解放军的防区，企图阻挠渡江行动，被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击伤后逃跑。当程开甲从新闻片中看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后，不由得心潮澎湃，他婉言谢绝了导师和朋友们的挽留，购买了一批有关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于1950年8月回到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

在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他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并亲自上课讲授。

1956年，程开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学党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培养吸收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入党之后，程开甲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

不久，他接到通知，带着相关的资料到来到北京西郊宾馆，作为固体物理和金属学方面的专家，与来自全国的600多位科技专家一起，制定出了国家的《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研究人才的需要，1958年程开甲再一次改变专业，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教研室，又接受任务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他带领几位年轻教师研制出一台双聚焦 β 谱仪，成功地测量了一些元素的电子衰变能谱，这是南京大学第一台核子物理实验仪器；接着他们又研制出一台直线加速器。

1959年，程开甲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对中国固体物理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竭力倡导把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应用于固体物理，亲自主持了一个理论讲习班，组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为中国固体物理和固体理论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五十年代末，程开甲用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原理建立了内耗热力学理论，为处理更为复杂的内耗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

1960年3月，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却不知道去干什么，直到他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时，方知是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党中央果断决策研制“两弹一星”，经钱三强亲自“点将”，邓小平最后批准，程开甲被调进了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他在“保密”、“奉献”的要求下，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不随便与人交往，甚至不能告诉家人，隐姓埋名默默地工作了二十多年。

虽然是物理学家，但程开甲对原子弹还是陌生的。研制原子弹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他与核武器研究所的其它几位技术副所长朱光亚、郭永怀、王淦昌、彭恒武谁都没见过原子弹，因此一切都只能在学中干，干中学，硬着头皮上。

在原子弹研制初期的原子弹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他通过对高压状态方程和化爆试验的研究，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为核武器爆炸威力的设计提供了重

要依据；在原子弹内爆机理研究中，他解决了原子弹研制中关键问题之一的起爆冲击聚焦设计，为弹体结构与加工精密度提供依据。程开甲在原子弹研制的开拓性研究中做出了贡献。

1962年，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了无数技术难关，出现了一线曙光，中央适时地作出了争取两年内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部署。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被调到国防科委（后来的国防科工委，现为解放军总装备部），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45岁的程开甲穿上了绿军装，成为一名军人。

作为中国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着手筹备和创建核武器试验基地研究所，并任副所长。他与伙伴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拟定并论证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总体方案，研制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的有关仪器和设备，为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作准备。

1962年，程开甲在钱三强副部长的领导下，组织草拟了中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科学技术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试验技术方案》；配合这个技术方案，还提出了《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包括45个研究项目和96个研究课题。

在中国准备核试验的初期，国内没有人懂，也不知道怎样干，没有仪器、设备，又无可借鉴。面对重重的困难，程开甲亲自编写冲击波、电磁波理论等方面的教材，为科研人员讲课，阐述核爆炸的各种物理、力学的作用和过程。他带领科技人员有针对性地钻研核试验的理论和技术问题：点爆的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理论，核爆炸链式反应的测量技术和设施；微秒级示波器、快速传输电缆、射线探测和记录系统；每秒几千次到百万次的远距离长焦距高速摄影机；在爆炸后的高空烟云之中收取放射性样品和进行放化分析；保证下风方向居民点不受裂变碎片沉降的放射危害的气象预报；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全系统同步控制系统研制等。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涉及到多种学科及各种实验方法和测试手段。在国防科委机关的协调下，他们开展了涉及14个城市、40多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和工厂的大规模联合攻关；在短短的两年中，他到科学院、研究所、院校、各军兵种召开了一两百次任务会，提出了一个个具体的科研要求。经过辛勤努力和刻苦研究，他们逐步完善并给出了一个全面的、在科学技术上广泛交叉的、有高度预见性、准确性和创造性、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提出了有定量分析的爆炸图像，研制出1000多台测试仪器。程开甲设计的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确保了首次核试验的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应该采取何种方式爆炸？这是关系到试验能否成功以及各种重

要数据能否完整收集的关键决策。最初的方案是用飞机投掷，但程开甲分析研究了各种方案的利弊后，否定了原定的空爆方案。他认为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掷，一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难以测量原子弹的各种效应；二是难以保证投弹飞机的安全；他经过一番精心的计算，最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采用“百米高塔爆炸原子弹”的方案，并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

1963年的一天，程开甲与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一起来到核试验场区——罗布泊，为核试验“定爆心”、“定工号”、“定布局”作现场考察。1964年4月，他又带着核武器试验基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提前半年开进了核试验场区。沉寂了千年的罗布泊顿时热闹了起来。

1964年10月16日15时，遵照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做到“保响、保测量、保安全、保取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圆满成功，蘑菇云在罗布泊的上空升起。

当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时，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了1700多台仪器，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作为核试验委员会9位副主任委员之一的程开甲，迅速对各类测试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写出了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由张爱萍签发后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在第一次核试验时，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中国的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拿到了全部测试数据。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程开甲又立即投入了制定《空中核爆炸方案》的工作中，之后，他又参与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和氢弹试验。1967年6月17日，中国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圆满成功。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在原子弹、氢弹爆炸的烟云中，赢得了平等和尊严。

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程开甲就根据周总理的询问，提出了向地下核试验方式转变的建议，这对核武器水平的提高和核试验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后，程开甲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包括平洞、竖井等多次地下核试验并获得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的日趋成熟，1980年以后中国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方式全部转入地下。作为中国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程开甲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程开甲先后主持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地下平洞、地下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等30多次试验，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试验技术协调发展，并不断

取得新的突破。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时，他提出在塔基半径230米范围内，地面用水泥和石块加固，以减少地面尘土卷入烟云；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时，他提出火箭取样的新方法，并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以确保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



1976年程开甲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

核试验时，他提出了自封堵塞原理的设计方案，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时，他研究设计的“全水位”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程开甲从1963年踏进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1984年回北京，在茫茫戈壁的核试验基地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程开甲创建了核武器试验基地研究所，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和技术队伍，他在20多年中主持决策、直接从事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的关键技术问题，使核试验成为原子弹的设计、改进和武器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程开甲创立了中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理论和效应理论，主持、参与和指导核爆炸效应的全面总结，为核武器应用奠定坚实基础；他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他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的研究，起草了中国战略核武器的第一个加固方案规则，并完成了首次抗辐射加固试验。

程开甲知道，核试验事业是一项尖端的事业，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一大批思想与技术都过得硬的人才去共同拼搏才能完成。还在核武器试验基地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根据专业的要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的研究所和高校中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安排，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成长。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程开甲总是坚持身教重于言教，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多次进

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坑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在第二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资料，程开甲决定进入地下爆炸后的坑道和测试间去掌握第一手资料。这在我国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由于谁也说不清坑道里辐射的剂量，因此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但程开甲经过计算，认为采取多种防护措施后可以进入。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他们穿好防护衣，戴上大口罩、手套和安全帽，在被岩石冲击波挤压成直径仅80厘米的小管道中匍匐爬行，进入到测试间里，发现这里除了到处是石英石烧结生成的黑色玻璃体和破碎的石块外，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坑道里温度很高，他们汗流浹背地把考察工作做完，终于取得了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程开甲说，自己“深入虎穴”观察到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的考虑和新的设计。

根据程开甲的提议，中央军委组织所有参加核试验效应试验的单位对所获得的技术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于1976年撰写出了《我国核试验技术总结汇编》共8大本，为核武器的改进设计提供了系统的实测资料和理论依据，有力促进了我国核武器与核试验技术的发展，并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程开甲的带领下，他所创建的核武器试验基地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成为中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从这里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



20世纪70年代程开甲与夫人高耀珊在核试验基地的家门前

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

1977年12月，程开甲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试验研究所所长。程开甲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核试验

总体技术的设计者，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是中国的“核司令”。

1984年，一个命令将67岁的程开甲调回了北京，担任国防科工委（解放军总装备部的前身）科技委常务委员。离开核试验基地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心情不爽，20多年艰苦奋斗的岁月，已经把他的心与罗布泊的戈壁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他很快又找到了研究课题。抗核加固一直是程开甲关注的问题，过去没有时间去做深入的研究，现在时间有了，于是他向国防科工委张爱萍主任打报告，论证了抗辐射加固研究的重要性，提议立项研究。张爱萍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亲自担任该研究方向的专业组组长，开启了这一领域的创新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程开甲虽然在参与核武器研究和试验的20多年中没发表过任何论文，但是他的学术研究仍然建树颇多。回到北京后，他重操旧业，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对超导的研究，受聘为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顾问。1986年以来，程开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1948年他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双带理论，证明了BCS的电子成对理论是错误的，出版了超导专著《Study on Mechanism of Superconductivity》和《超导机理》；后来他又提出了系统的凝聚态电子理论，被同行们称为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并得到实验验证，为材料性能研究和新材料设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将该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他还开创了我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的新领域，并为其应用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现在，年逾九十的程开甲仍然活跃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走进程开甲的家，人们一定难以将这里的主人与“两弹一星”元勋联系起来。程开甲的家中陈设十分简单，质朴得令人难以置信。在离开戈壁滩之后，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简单，俭朴的生活，唯一富裕的就是书橱中满满当当的书籍。在他的书橱玻璃的内侧，贴着一幅自己的题词：“顺其自然，坚持活动，心情平和，快乐人生。”这就是年逾九旬的他现在的生活习惯和良好心态。

为了中国的核试验事业，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召集程开甲等专家们开会研究工作，虽然程开甲对周总理提出的问题常能对答如流，但由于他的盛泽口音太重，别人不易听懂。有一次，周总理笑着对他说：“程开甲同志，你要学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直到今天，程开甲说的还是盛泽普通话，每当提起这事，他不无遗憾，他说：“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就是学习普通话



程开甲

的任务完成得不好。”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程开甲先后担任过多种职务，但他从没想过“权力”，而只服膺“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因此他会非常诚恳地对一位技术员说：“我向你们道歉，上次的讨论，你们的意见是对的。”

真正的科学家是不求名利的，但真正为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1978年，程开甲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被树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国防科工委科技工作者标

兵称号；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年来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发明奖二等、四等奖各一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四项、二等奖二项；1999年9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说：“我是代表研究所和基地的全体指战员和曾为核武器事业做出贡献的全体同志们接受这份荣誉。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对整个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的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在核试验的历史中，有很多人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他们摆摆功……”他说，自己还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

多年来，家乡人民为程开甲院士所获得的成就而自豪，程开甲院士也始终关注着家乡的发展。1999年10月，程开甲等五位吴江籍中科院院士受聘为吴江首批经济顾问；2002年5月，程开甲院士回乡考察，2003年12月，又向盛泽镇图书馆、盛泽中学和母校盛泽实验小学赠送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一书，以表达他对家乡学子的无限关爱；2004年6月，86周岁高龄的程开甲院士回到儿时就读的盛泽实验小学（观音弄小学），为母校挥毫题词：“树志、尚德、勤学、守纪”，勉励小朋友努力学习，将来成为栋梁之材；2006年2月17日，盛

洋实验小学（舜湖学校）举行新校落成暨程开甲塑像揭幕仪式，程开甲院士出席庆典并为塑像揭幕。他在庆典上说：“我在观音弄小学度过了愉快的岁月，今天学校有了大发展，建成如此规模的舜湖学校，令我赞叹不已，祝愿它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他对学校为他立像表示感谢，并希望老一辈科学家留下的独立自主、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希望母校发扬传统，奋发向上，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和输送更多的人才。

步入晚年之后，有人问程开甲：“要是你当年听了导师波恩的话留在英国，现在会怎样？”他感慨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研究上有更大的成就，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观、幸福观；就是他“以热爱祖国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荣、以崇尚科学为荣、以辛勤劳动为荣”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徐景藩



徐景藩像

徐景藩，生于1927年，脾胃病专家、主任中医师，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内科脾胃病学组副组长、专业委员会顾问、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中医学学会名誉会长、江苏省“333”工程选培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药品审评委员兼中医药组组长、江苏省卫技高级职称审评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医杂志》特约编审、《江苏中医药杂志》常务编委、《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编委，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获得者、首届“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

1927年12月，徐景藩出生在盛泽镇祝家弄徐氏“培德堂”私宅，徐氏家族是中医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他从小就熟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启蒙医籍，对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0年，14岁的徐景藩就跟随父亲徐省三学习中医，父亲为病人诊脉，他在一旁抄写药方，下午在父亲的督促下整理药方，研读医书，抄写名家验方，并结合病例查阅有关书籍，加深理解。

晚上再由父亲传授治疗的经验，聆听父亲对疑难病例的分析，天天如此，寒暑不辍。在这种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传统的师承教育下，他逐渐地熟悉了中医的诊脉和用药的基本知识，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年后，徐景藩又拜浙江嘉兴的名医朱春庐为师。他一边跟着老师侍诊，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精心研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以及古今各家名医的医籍，对于经典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常常反复默诵，直到能背出为止。这些古代经典医籍成为他毕生的从医生涯中用之不竭的宝藏，直至今日，他对经典医籍的内容仍能出口成诵。

值得一提的是，徐景藩在拜师学医的日子里，每天都将老师治病的药方和病案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装订成册，3年中竟积累了整整3册，一有空就拿出来细细研读，从中学习老师的治疗经验。他的这种认真学习的态度得到了老师的赞扬，也使他的医术有了很快的长进。

1947年，徐景藩开始独立行医。自古以来，人们称颂医家有悬壶济世之道，所谓医者仁心，救人于病痛之中，以医技普济众生。他牢记父辈的教导，以仁慈之心对待病人，为人治病总是认真诊脉，小心开方，用药力求准确；对于诊金，却从不计较多寡，遇到贫穷的病人，不仅分文不收，有时还免费为之配药。

在行医的过程中，徐景藩从病人的种种痛苦的情状中，逐渐地加深了对医生责任的认识。他暗暗地立下了钻研医学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但他深知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医疗技术过于浅薄，光有志向而没有过硬的技术是难以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因此他更加刻苦地钻研医疗技艺，抓住一切闲暇时间，有计划地研读医书、药书，结合诊治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寻找有效的处方和解决办法。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千百年来，师徒授受是中医得以代代相传的主要传承方式，也是学术流派形成的关键因素；老师主要通过口传心授，将基本理论、临床疗效和医疗技能传承给徒弟。然而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中医理论和医疗实践中也遗存了一些封建愚昧的意识和保守的经验，到了近代，由于西风东渐和新文化的诞生，西医西药加快了在中国的传播速度，中医中药伴随着旧文化的式微而受到极大地冲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医药曾一度受到质疑，一些中医师纷纷转业或改习西医，但徐景藩不为所动，对传统医学依然深信不疑。

为了完善中医教学模式，帮助中医师学习中西医理论和治疗技术，国家卫生部于1952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开办了一个中医研究班，吸收一部分有一定基础的中医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进修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医学。

徐景藩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他多年来虽然熟读了许多经典医籍，但

毕竟缺少有条理的系统学习，读书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也没有向专家讨教的机会，因此他非常想参加这次难得的进修。虽然他只有小学学历，但他在学医的过程中从未放弃过自学文化知识；为了学习俄语，他还请人自制了一台收音机，从广播中自学俄语。根据当时的报名条件，他以“高中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了中医研究班并被顺利录取，由此他获得了一个系统学习中西医知识的机会。

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5年时间里，徐景藩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中，常常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读书学习上。过去，他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学到了朴素、宏观的中医学理论，现在他又从人体生理、解剖、病理、生化等微观领域中去了解西医学的真谛。他就像一块海绵，拼命地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养分，只觉得时间时间不够用。

通过学习，他开始认识到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理解了中西医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并通过刻苦的学习，逐渐地掌握了中西医对病症的不同治疗方法。西医通过各种检验手段诊断疾病，并针对疾病的症状进行治疗，强调的是与病邪的对抗；而中医是通过疾病的表象，分析人体本质上的功能失衡情况，然后通过对整体功能的调整，激发自身的抗病能力，从而主要依赖人体天然的自愈能力来解决疾病的问题，最终的目标是恢复阴阳的平衡。

徐景藩通过几年的系统学习，从基本理论和医疗技术两方面获得了认识上的飞跃和长足的提高，最终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

徐景藩非常珍视这一次学习机会，他说，北京之行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能走进首都的医学高等学府深造，是新中国重视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现在，他依然珍藏着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干部处寄给他的录取通知书，这封表皮已经泛黄的信件成了他生平最值得纪念的物品之一。

1957年，徐景藩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中医院工作。江苏省中医院是当时全省专业水平最高的医疗机构之一。在这里，徐景藩虚心地向当时院内的孟河医派和吴门医派的诸多名家学习，兼收各家之长，因而医术飞速长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一代中医高层次人才。

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徐景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医研究班的5年，他兼收了中医各家之长，又系统地学习了西医学，进一步充实了中西医理论功底，以此为基础，他通过长年的努力，成长为一名擅长中西医学的一代名医。徐景藩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分不开，与家庭熏陶、师承教育分不开，与他的积累思悟、博采众长分不开，也与他毕生的勤奋和努力分不开。

在江苏省中医院，徐景藩不仅是医术高超的名医，更是一位医德高尚的长者。“行医60年，奉献一辈子”是人们对徐景藩的高度评价。

在徐景藩毕生的行医生涯中，他始终把济世救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常说：“医者父母心。能为患者出点力，减轻病人负担，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上世纪60年代，他在医院的急诊室工作期间，每逢夜间值班，常常会带些米在炉子上煮成粥当作夜餐。那时候，一般的患者经济状况都不富裕，当他看到一些患者亟需补充营养却又没钱买时，常常会从自己熬好的粥中将面上最有营养的米汤舀出，一勺勺地喂给重症患者吃。看到患者的身体一天天的康复，他比什么都高兴。

“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虽然那时候他的家庭也不富裕，但他还是经常自掏腰包帮助患者。

1982年，江苏溧水县有一位农民患了溃疡性结肠炎，经多年治疗，效果都不好，以致造成重度的贫血而极度虚弱。听说徐景藩能治这种病，这位农民便卖掉了耕牛，慕名来南京求医；谁知在路途中被窃贼偷走了所有的救命钱，伤心得痛不欲生。徐景藩听说后，顿生怜悯之心，不但安排他住进了医院，还从家中拿来了200元钱送给了这位患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200元绝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他为了救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就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之后，这位农民经徐景藩的精心治疗，病情很快得到了康复。在患者病愈出院时，他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连称徐景藩是“救命恩人”。

有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因患胆囊炎而住院，经他精心诊治后痊愈出院。当他得知病人家里极其贫苦时，就悄悄地给病人送去了路费，还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令病人非常感动。徐景藩为患者送钱赠物，帮助患者解决困难的举动，在医院里被传为美谈，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1985年底，患者方联喜突发胃体大出血，血色素从13g/L跌至7g/L，经其它医院抢救后暂时止住了出血，但不久又复发，虽经几家医院治疗，始终未见好转。后来由徐景藩会诊后，开出了7服中药。方联喜服药一周后，出血便止住了，又用中药调理了半年，病体完全康复。方联喜说：“徐老的方子仅有十余味药，7服药也只四五十元，但效果显著，是中医救了我的命。”

徐景藩对患者如同亲人，他每开一味中药，都要反复斟酌，力求用最佳配伍的药方给患者治疗，还一丝不苟地核对药名、药量，同时不随使用昂贵的药物，处处为患者着想，因此患者都非常信任他。

当病人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徐景藩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一次，

他的妻子突发眩晕病，一连4天卧床不起，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此时他为了抢救危重病人，已经连续在医院工作了3天3夜。

徐景藩认为医生对病人要有感情，仁爱之心是从医之本，对病人没有感情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医生的。他常对学生说，只有廉洁自律才能胸怀宽广；只有不计报酬，才能一切为病人着想。有些病人经他治愈后，真诚地来酬谢他，他总是心领好意而不收财物。对于近年来社会上非议的“红包”现象，他始终认为，要做好一名医生，首先要做好一个人，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了人格。

徐景藩以身体力行的高尚医德，教育了医务工作者，也深深感动了无数患者和广大群众，在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进行的评选“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活动中，徐景藩以高票当选，成为全省人民学习的楷模。

60多年来，徐景藩一直奋斗在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立足临床，知行合一，潜心钻研学术，他衷中参西，开拓创新，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之路，硕果累累，著述颇丰。

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相互补充，要运用和借鉴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中医所用。中医药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从业者应该坚定信念，整合资源，能中不西，坚持医疗、教学、科研紧密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全力突破，形成一批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

1958年，徐景藩参与创建了医院内科教研组，在承担繁重的医疗工作的同时，还兼任课堂和临床教学任务。他积极倡导学科分化，在原有的脾胃、肝胆病组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医消化科，他坚持“多方位研究、多学科结合”，使他们的专科先后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脾胃病专科”和“十一五”重点专科强化建设单位等，使江苏省中医院的脾胃病研究在国内位居前茅，成为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带领研究生对胃脘痛的病因病机和辨证客观化等展开科研工作，一批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多项奖励。多年来，他本着知行合一的精神，且干且思，亦思亦写，先后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出版了他编著的专著10多部，在中医杂志、中医药研究等中医药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他的《论肝气郁疏肝法的运用》等论著被日本学者全文刊载于日本《中医临床讲座》一书中；直到古稀之年，还著有《徐景藩脾胃病治验辑要》，并多次重印。

他结合现代医学对胃生理功能的认识，提出了“胃能磨谷论”的新学术观点，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并为全国学者认可。他认为，胃的生理功能和特点

主要为胃主纳，能磨谷；体阳用阴，多气多血；上清下浊，主降宜和。

徐景藩不但在理论上有所思悟，临床上也有不少“绝招”。从医60多年来，他潜心研究脾胃病的诊治，由他首创的“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解决了食道炎中药附着的难题，还对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让病人甚至同行们深为叹服。

有一位患者因食道发炎而疼痛难忍，用了各种方法，效果一直不理想。食道位于咽与胃之间，质柔而薄，凡气郁、痰滞、里热、血瘀等病理因素累及食道，通降失常，可致炎症、溃疡，甚至转成顽症，但是要让药物能够留在食道病灶并非易事。徐景藩通过不断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改进剂型和服用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过去因为药水无法存留在食道病灶部位，故而药物难以生效；现在将汤药改成为糊状中药，并采取卧位服药，初步解决了药物存留于病灶的问题。这一妙法现在已被同行们广为采纳应用。

治疗胃病，徐景藩主张从三型论治，参用护膜法；治疗以便泄为主证的慢性结肠炎，他创制了“连脂清肠汤”内服和“菖榆煎”保留灌肠法；治疗残胃炎，他创制了“残胃饮”，都取得了极好的疗效。

另外，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也是徐景藩的一贯做法，如诊治肝病重症阴虚膨胀，他采用内服、鼻饲、外治用药、针刺并进以及运用养阴利水方等方法；对于胃脘疼痛，他选用中脘、足三里等穴位针刺，或结合耳针治疗；对于某些难治的病证，还兼用泡足方法；对急性胰腺炎患者，则采用清化通腑消滞法和外治法；他也常将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辨证的基础上参用于临床，提高了治疗效果。

作为江苏省中医院的院长，他尽心尽责，亲力亲为，制订医院发展规划，抓好中医人才梯队的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四处奔波，争取政府支持，努力改善就医条件，为医院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苏省中医院创建于1954年，在前任领导和全院同仁的努力下，成为省内首屈一指的中医院。1983年，徐景藩担任了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于是，如何使医院在新形势下加速发展，成为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

他在制订出医院的发展规划后，集中精力抓中医人才梯队的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重点工作，努力把医院建设成为有着鲜明特色的国内一流中医院。院内目前有72个重点专科（病）门诊，其中有四分之三是他在任期间逐步巩固、调整、发展和建立起来的。

他坚持“以中为主、能中不西”的办院方针，组织各科医生互相观摩中医病历的书写，建立三级查房制度，加强中医护理，并经过全体医务人员讨论，结合

病种特点，制定每个专科的相应措施。即使是外科病房的手术患者，也能在术前术后配合中医药治疗，全院中医药使用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

1985年，医院获得全国省级中医院医疗质量综合评比第二名，同年又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扩建的7所省级中医院行列，为创建三甲中医院和全国示范中医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医院综合大楼开始兴建。从筹款、立项、论证到设计、动工、建设，每个环节和每个细节都浸透着徐景藩的一番心血。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徐景藩被累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每天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便瘫倒在床上。

“淡泊名利，多做贡献。”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医院建起了一幢“高知楼”，徐景藩完全有资格分到房子，但为了缓解医院的分房矛盾，他主动放弃，仍旧住在17年前建造的面积较小的老房子里。他认为，医院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但是职工们都明白，正是在老院长徐景藩的精神感召下，后来的每一任院长都把他倡导的“抓班子团结、抓人才培养、抓医德医风”的优良传统继承了下来，从而使医院的发展突飞猛进。

徐景藩始终把中医人才梯队的培养当作医院建设中最重要的工作。他认为，为人师者，重于传承。多年来，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指导和培养各类中医学生和进修医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传给后学，使中医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凡受教于徐景藩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体会，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并贯穿在一言一行之中。从事教学几十年，他总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采取“一贯制”的教学方式，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他曾为学生们立下4条座右铭：“读书从博到



徐景藩给学生讲解经典

精，撷采众长，分析思考，须有自己见解；诊病务必细心，审因辨证，选方宜慎，择药熟知性能；改进给药方法，针对病情，达于病所，庶能提高疗效；积累临床资料，撰文求实，常年不懈，集腋始能成裘。”学生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后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的刘沈林说，作为弟子

追随老师7年时间，不仅学到了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学到不少做人方法。他经常看见老师每天在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下医院大大小小的事情；像这样的本子，徐景藩不知有多少本。弟子单兆伟，如今已是著名中医学专家，他至今清楚地记得，老师时常强调的是“医者德之本，无德之人不可为医”的古训，他以老师为榜样，经常加班加点抢救病人，带病为患者诊治，立志做一个医德高尚的人。

徐景藩从进中医院那天起，就一直搞临床工作，从未离开过病房，直到80岁之后依然坚持每周三带领弟子们查房。每到一处，他不仅向弟子们细致分析每一个病例，还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理法方药到疾病转归，理论联系实际，举一反三，娓娓道来，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有一位患者多年的老胃病被徐景藩治愈，心中十分感激，因觉得无以为报，就带来一点家乡的新茶以表谢意，徐景藩再三婉谢不受。后来病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将茶叶放下后就走了。徐景藩发现后，立即让学生追赶病人。学生有些迟疑，说区区小事，何必这样认真。徐景藩正色道：“廉洁行医，不收病人财物，这是制度，必须自觉遵守！”学生听后，急忙追出去，将茶叶退还给病人。

有一次，他悄悄地把几百元钱放在一位经济有困难的病人床头，被学生发现了，他对学生说：“以言感人，不若以行感人，言虚而行实也。看着患者被病痛折磨，能出点力减轻病人负担，这是医生应该做的，我只是不欲使人见我之善罢了。”

徐景藩的学术思想和做人准则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后继的中医人才，他们中有的已成为硕士、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在临床、科研和管理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徐景藩指导、培养的国内外中医学生和各类进修生更是不计其数，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如今，徐景藩虽已过了耄耋之年，但依然思维敏捷，行动自如，仍坚持在一线为患者服务，这得益于他“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的养生之道。

徐景藩认为《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即是养生保身之道。平时，他的饮食保持清淡，五味适度，不吃得过饱，注意劳逸结合。一旦身体有小恙，他最多吃几片药，从不打针或点滴，始终坚持自己开点中药汤剂，总能药到病除。这源自他对祖国中医药学有效性的坚定信心，也源自他对自己医术的信心。

徐景藩是个散淡的人，不为名缰利索所缚，对名利看得很淡。面对国医大师的桂冠，他真诚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也不是我的医术非常高明，我也有很多疾病解决不了。这是国人对中医国粹的信任和珍爱，是国家对中医的重视和

支持。

中医认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志的太过与不及，都会导致气血运行失常，脏腑功能失去平衡。徐景藩在人生路上悟出了很多道理：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学会随缘二字，便能除却许多烦恼；对人宽厚仁慈，生活顺其自然，为人低调谦和，不受名利羁绊。因此，他一生平稳，身心愉快，师徒和谐，同事和合，家庭和睦，生活得自在舒畅。

徐景藩把“心无机事，案有好书”作为养生座右铭，认为读书是天下最乐之事，终身受用无穷。学问日深，道理日新，愚者因之而贤，昧者因之而明，寒暑风雨，黄昏清晓，窗下安然得对古人，莫大之乐。尤其对中医典籍，他更是反复阅读，不仅熟读，还要嚼透，消化，如对《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温病条辨》等，他都能做到信手拈来。他常说，读书能温故知新，其中的乐趣，难以言表。

除了读书，徐景藩还喜欢泼墨挥毫，临摹名家法帖，认为书法是“纸上的太极、墨上的气功”，可陶冶人的性情，修心养性，排除心中的忧虑和烦恼，从书法艺术中吸取精神营养，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享受。他写得一手好字，曾经学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字字如行云流水，沉稳端庄。此外，他自幼就喜爱音乐，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乐器，常在业余时间吹拉弹唱，不亦乐乎。到了老年，他又改学电子琴，自娱自乐，有益身心健康。

徐景藩很重视体育运动，他自编了一套松筋操，还有颈项操、呼吸操和眼保健操等，每天坚持适量的锻炼，强壮筋骨，抗老防衰。他还多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因糖尿病而近乎失明的老伴，每天早晚与老伴牵手散步，相濡以沫，被人们传为美谈。

活到老，学到老，服务到老，是徐景藩一生的不懈追求，保持本色，提倡和谐，乐在自然，则是他所领悟的岐黄之道。回顾自己的一生，徐景藩认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对于实现自己的志向最为重要，学习使自己无论在涉猎的知识面上，还是在汲取的方式和路径上都更加宽泛，也更加理性。一是认真向老师学，在课堂上学；二是虚心向前辈和同行们学，取众家之长；三是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而保持医家的本色，以仁爱之心自觉地为病人服务是医道的根本。

几十年来，徐景藩怀着高远的志向奋斗在医疗、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成长为一位学习型的国医大师、临床型的国医大师、清廉型的国医大师和思想型的国医大师，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深得同仁拥戴、后学爱戴、病员感戴。

徐景藩一家至今已六代从医，可谓中医世家。

徐氏祖籍浙江慈溪，徐景藩的曾祖父即为中医，祖父徐子卿（1875—1942），

早年寓居盛泽，为中医内科医师，设诊所于盛泽北仲家弄。

父亲徐省三（1898—1974），幼年入私塾，寒窗苦读，孜孜不倦，15岁随父徐子卿习中医内科，学成后迁至盛泽祝家弄私宅悬壶行医。为方便农民就医，每旬定期到坛丘坐堂看病，遇贫病者不计诊酬，1955年参加盛泽联合诊所（1958年改名为盛泽联合医院，即今盛泽医院前身）。擅治时症热病，精于肝胃杂病，用药平中有奇，配伍恰当，屡起沉疴。1974年因胃癌逝世，享年77岁。



徐景藩

叔父徐畏三（1914—1971），师从徐有金，后随浙江湖州千金镇名医杨舒荣习中医外科，学成后在盛泽行医，勤于治学，精医理。1953—1955年，参与筹建联合诊所，为诊所负责人，后为联合医院（盛泽中心卫生院）副院长，1959年兼任盛泽地区业余中医进修班教师，每周六晚上开讲医务知识课，教学严谨，诲人不倦，所有讲义都亲自撰写。1971年因直肠癌逝世，享年58岁。

姑母徐楚云，师承盛泽名医简伯龙，从事中医妇科工作，定期到嘉兴王江泾镇药店坐堂诊疗。

胞弟徐企帆，盛泽医院中医副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

女儿徐丹华，从父学医，从事中医内科工作，现为江苏省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刻苦钻研医术，常为父亲整理医案，为徐景藩学说继承人。

侄孙女徐心田，徐企帆之孙女，从小立志学习中医药，现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培德堂徐氏六世九人习医，以济世救人为己任，这在江南杏林中实属罕见。

唐仲英



唐仲英像

唐仲英，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慈善家，美国唐氏工业集团董事长、“唐仲英基金会”董事长。在美国，他被称为“钢铁大王”和“杰出华人”；在中国，他被授予“中国十大慈善家”称号。

1930年，唐仲英出生在盛泽镇柳家弄19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他的父亲唐炳麟（1903—1968），字期成，1930年代初，随沈鹏至安徽滁州专员署任总务科长，后从商。抗战期间在重庆开设上海公司，颇具影响；抗战胜利后，先在香港开设华成、期成进口公司，后至上海创办亿中银行，任董事长，并在南京、无锡、南通、天津、厦门等地设5个分行。1949年初去香港，1968年病故，享年66岁。

1928年，唐炳麟的岳父仲少梅在开辟西新街后又募资建造盛泽大戏院，由唐炳麟主持具体事宜。戏院的门楼十分壮观，剧场设二层楼座，观众席成阶梯状，共设座位500余只，座位都是新式的翻板椅，藤靠背，十分考究。盛泽大戏院规模气派之宏大，设施之时新，在当时江南一带的乡镇上称得上风毛麟角。

创办于1943年的私立盛湖初级中学是盛泽的第一所中学，抗战胜利后因经费筹措困难而陷入困境。1946年，唐炳麟出私资捐助学校创建“炳

麟图书馆”，购置了 3000 余册书籍，建起了“万有文库”。1947 年，江苏省教育厅训令沦陷期间创设的私立中学须补办立案手续，此时，唐炳麟慷慨解囊，筹集基金 4000 万元，几经周折，获得省教育厅立案，校名定为“吴江私立盛湖中学”，唐炳麟任学校董事长。

唐仲英在少年时代随父亲迁居重庆，后辗转到了香港，毕业于香港圣士提反书院，1950 年赴美国威得恩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求学。之后，他白手起家，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在举目无亲的美国，一个从来没吃过苦的“大少爷”，既无一技之长，又无工作经验，为了生活，他尝试过各种工作：清早三、四点钟起床去送报纸，到码头上替修船工人提工具，到市场去摆摊，常常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还兼做两份工作。经过十年的努力，他才开始学习创业，凭着一股“能坚持，能吃苦，不轻易放弃”的精神，他从 1960 年自己建厂，1964 年独资创建第一家钢铁服务中心——国际物资公司，到 1980 年已经在美国拥有 30 多家企业，创建了初具规模的唐氏工业集团。

唐氏工业集团的总部设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1982 年，唐氏工业集团收购了美国著名的麦克罗斯钢铁厂，跻身于年销售额超 10 亿美元的私营企业之列，被美国实业界誉为“钢铁大王”。1999 年，唐氏工业集团被美国“福布斯”杂志排名为全美国私人公司第 157 位。如今，唐氏工业集团的雇员超过 3000 人，主要从事钢铁、铝材、模具、家具和医药业。

唐仲英自幼受家庭熏陶，养成了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他认为，知识、健康和社会责任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三大要旨，因此他在事业成功之后不忘回馈社会，从 1995 年起，他先后出资创立了三个基金会：唐仲英基金会（美国）、唐仲英基金会（中国）以及唐氏中药研究基金会，在教育、医疗、社区发展等领域开展一系列慈善活动，并进行现代中药的研究开发，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资助活动，引起全社会对上述领域的进一步关注，激发相关机构和个人参与进来，共同努力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使三个基金会成为促进中美民间交往的桥梁，籍此回报养育了他的中国和成就了他的美国。

1995 年的金秋十月，唐仲英回到了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乡——盛泽。看到家乡今非昔比的繁荣景象，唐仲英感慨万千，回忆起自己 17 岁离开故乡，旅居美国的艰难创业历程，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晚了，应该早些回来看看！”

10 月 25 日，唐仲英来到了父亲创办的“炳麟图书馆”，盛泽中学的校长将图书馆“万有文库”里的三本书回赠给了唐仲英。他睹物思人，缅怀父亲当年的慷慨之举，当他听说盛泽中学的师生在“文革”期间依然视书若宝，将图书馆的藏

书保存至今时，他深深地感动了。翌年6月第二次回乡考察时，他得知盛泽中学将易地新建，当即慨然承诺捐资建造“炳麟图书馆”新楼。之后，他亲自审阅施工图纸，并于11月再度远涉重洋，来到盛泽中学新校工地参加“炳麟图书馆”奠基。在捐赠仪式上，他向学校捐赠了50万美元，并动容地说：“来到中国，来到故乡，我深深感到回家了！”

1997年7月，唐仲英在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交接仪式后，偕同家人来到“炳麟图书馆”基建工地，了解建造进度；1998年11月7日，他又一次来到故乡，参加“炳麟图书馆”新楼的落成典礼；2001年他再次捐款为图书馆购置图书。2003年9月，他为盛泽中学60华诞发来贺信，表示将“继续关注盛泽中学的发展和提高”，“愿盛泽中学培养出更多品学兼优的学生，为家乡、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唐仲英对故乡的一片深情，让盛泽中学的师生十分感动。现在，“炳麟图书馆”内专门设置了“唐氏家族捐资助学陈列室”，一批批曾受到唐仲英德育奖学金奖励、为唐仲英精神所感召而前来寻访唐仲英家乡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盛泽中学，通过参观“唐氏家族捐资助学陈列室”而深受教育。

此后，唐仲英多次慷慨捐资，在家乡兴建公共设施，支持民生事业发展。1999年和2000年，他先后捐款75万美元和45万美元，支助松陵和盛泽建设道路和广场。为了表彰唐仲英的义举，道路与广场分别被两地政府命名为“仲英大道”和“仲英广场”。2000年，他又捐赠给吴江市红十字医院一台价值75万美元的螺旋CT机，并出资装修新住院部大楼手术室，使之在江苏省内处于领先水平。

由于盛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涌入的外地移民已超过了户籍人口的两倍，镇里原有的医院因设施陈旧、医务力量匮乏，已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就医的需求。2006年，向来推崇“知识、健康和社会责任心”的唐仲英又一次回到家乡，决定出资协助政府兴建江苏盛泽医院。经过唐仲英的多方撮合，2007年10月26日，由唐仲英基金会捐赠6000万元、江苏交通控股、吴江市人民政府、盛泽镇人民政府共同投资近5亿元的江苏盛泽医院隆重奠基。在医院筹备与建设的三年中，唐仲英多次回乡，关注医院建设的进度。

江苏盛泽医院于2009年11月竣工并开业，2011年达到了国家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的标准和要求，今后还将建设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江苏盛泽医院作为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分院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由省人民医院实行一体化管理并提供医疗技术支撑，目前是全国唯一的建在乡镇上的三级医院，并努力打造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医院的示范单位。它的建成，为盛

泽以及周边地区人民的健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是盛泽老百姓的福音。

唐仲英基金会多年来致力于教育事业以及社会公益事业。基金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体现了基金会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人类的关爱；推己及人，薪火相传，体现了基金会希望将这种责任与关爱推广到整个社会，让更多的人身体力行，并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唐仲英基金会（中国）

唐仲英基金会在中国开展教育、医疗和社会公益方面的资助活动。主要项目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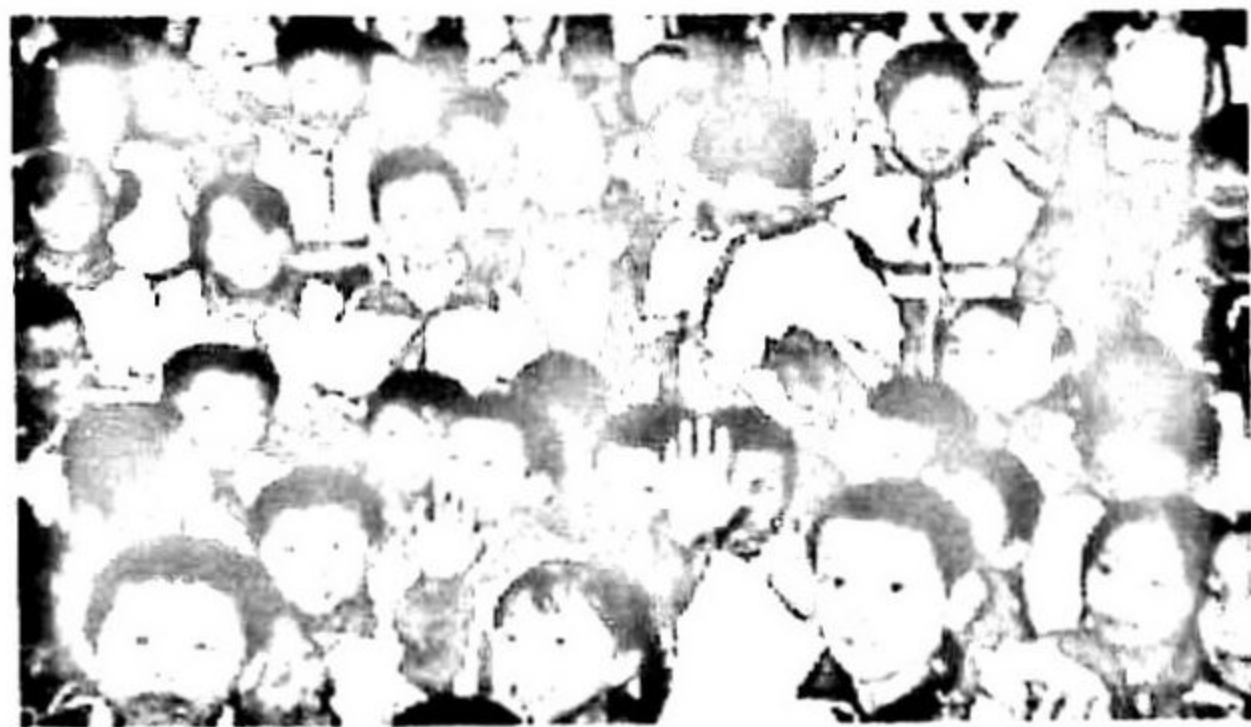
一、“唐仲英德育奖学金”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是基金会在中国最早开展的资助项目，也是国内首度以“德育”命名的奖学金。唐仲英认为，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德育又是教育中的关键，先学做人，再学做事、做学问。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不仅要学有所成，更要懂得“得诸社会，还诸社会”；故而“唐仲英德育奖学金”从设立之初便有其独特的理念：在选拔获奖学生时，强调德育标准为先，要求获奖学生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外，更要有爱心、有诚信、有志向、有知识，尽己所能去“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从而增强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奖励对象是品学兼优、热心公益的在校大学生，奖金金额为每人每年4000元，从入学至毕业可连续获奖，但每年10月份须对已获奖学生进行重新评审，评审合格者方可在下一学年度继续获得奖学金。

为便于学生开展公益活动，在校方的支持与指导下，各校的“唐仲英德育奖学金”获得者组成爱心社团，利用课余时间深入社区或走进贫困地区，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同时，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其他项目，如薪火乡村教育援助计划、爱心奖学金、CTF小学等也与相关高校爱心社团挂钩，成为学生们开展活动的新平台。

自1997年至今，已在国内21所知名高校和吴江区设立了“唐仲英德



唐先生和CTF小学的孩子在一起

育奖学金”，到2010年，已奖励5596名品学兼优、家境贫困且热心社会公益的大学生。

为了总结和交流所开展的公益活动的成果与经验，自2000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唐仲英德育奖学金”交流会，由各高校轮流承办，唐仲英在交流会上多次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勉励获奖学生“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为社会多作贡献。在他的感召下，获奖学生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唐仲英爱心奖学金”

为了卓有成效地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基金会自2006年起，在江苏、安徽、陕西等13个地区的初、高中学校设立“唐仲英爱心奖学金”，奖励“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关心他人、助人为乐、刻苦勤俭、成绩优良”的初、高中学生。奖学金的金额为初中每人每年400元，高中每人每年800元，奖学金获得者通过所在的班级全体同学进行两次无记名投票推选而产生，每学年评一次，目前累计获奖学生已超过40000人次。

各设奖学校成立“唐仲英爱心小分队”，推选道德品质高、热心爱心工作的老师担任辅导员，组织获奖者和热心公益的同学开展力所能及的爱心活动，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帮助他人。此外，获得“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大学生们也就近下乡，与初高中“爱心小分队”的队员们座谈交流，共同开展“手拉手”爱心活动。这样的交流活动使队员们受益匪浅，而大学生在活动中也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思想洗礼。

三、资助中国高校教育、科研项目

既全力支持学校硬件建设，又注重提高高校培养优秀人才的软实力，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升学校教育、科研整体水平。

2003年10月，捐赠1000万元资助苏州大学建设独墅湖新校区图书馆，这是唐仲英继父亲唐炳麟当年创办盛泽中学“炳麟图书馆”之后的又一慷慨之举。2006年5月，有着“水晶莲花”般高雅风姿的图书馆正式落成启用，并成为苏州大学的标志性建筑，苏州大学将其冠名为“炳麟图书馆”。

2004年，捐赠5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建设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是一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国家“985”计划重点工程项目。经过两年的建设，总投资1.5亿元的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大楼于2008年竣工，为了彰显唐仲英捐资助学的善举，新落成的实验室主楼命名为“唐仲英楼”。

2008年4月，为了帮助安徽大学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 and 道德水平，强化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基金会出资与安徽大学共同

建设“唐仲英大学生心理素质拓展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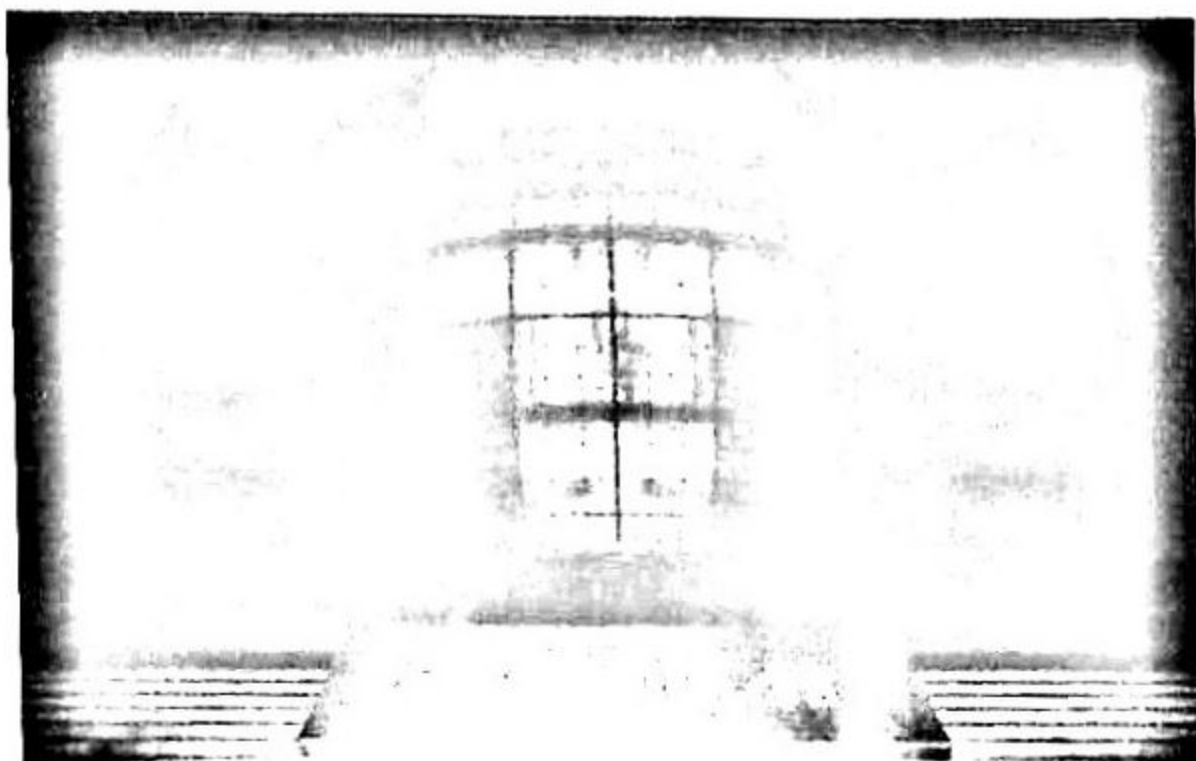
2008年7月，资助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仲英书院”。书院制建设是顺应社会变革，提升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心理素质和综合能力的一次实践，旨在加强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培养德才兼备、知书达理、富有责任感的人才。

2008年10月，资助西安交通大学建设“唐仲英艺术庭院”。这是西安交通大学艺术系学科建设的重点工程，在保护原有历史建筑的基础上，以科学性、合理性、人性化为原则，统筹规划，精心设计，为学校艺术教育提供优良的教学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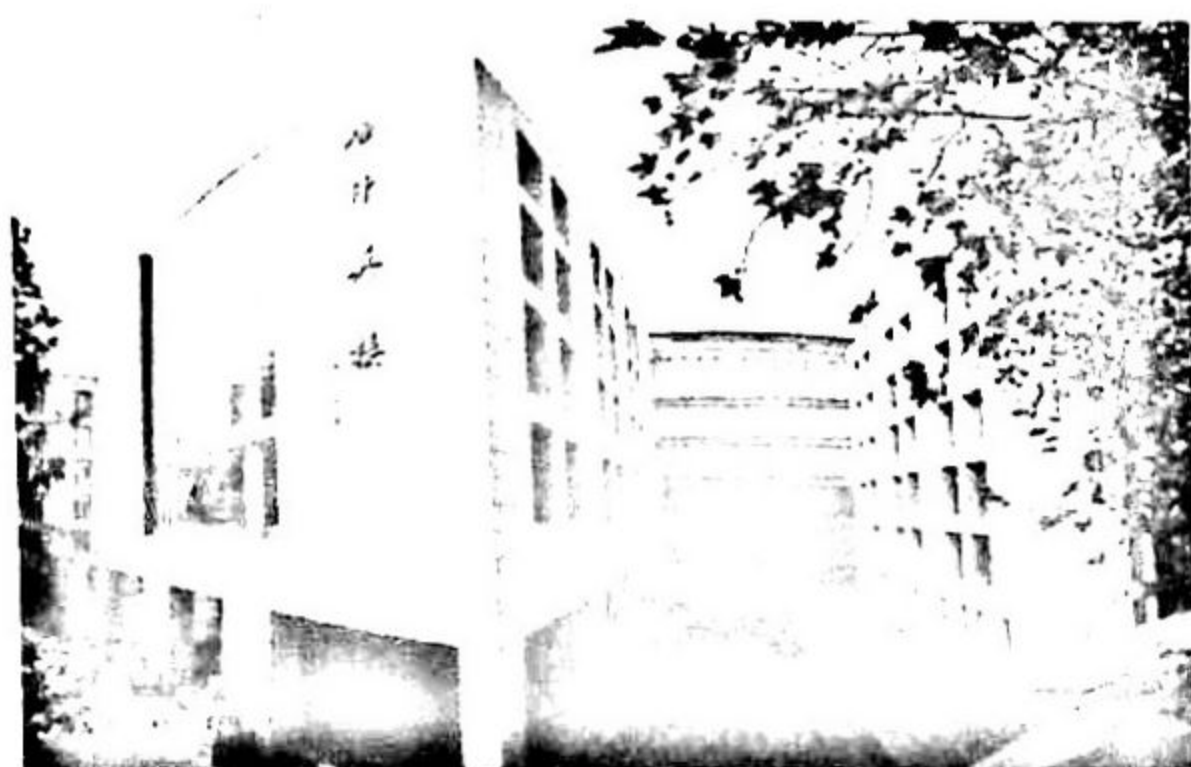
2008年11月，基金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协议，实施“唐仲英基金会少年班人才培养计划”和“唐仲英讲席教授奖励计划”，在原来设立的“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基础上，给少年班每年增加10名获奖名额，并每年资助2名“唐仲英讲席教授”，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培养和造就中国交叉学科领域科技创新的新军人物。

2008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立“唐仲英育种基金”，用于支持学校的科技人员从事农作物、园艺和林木、果树育种研究，给农民提供更多优质良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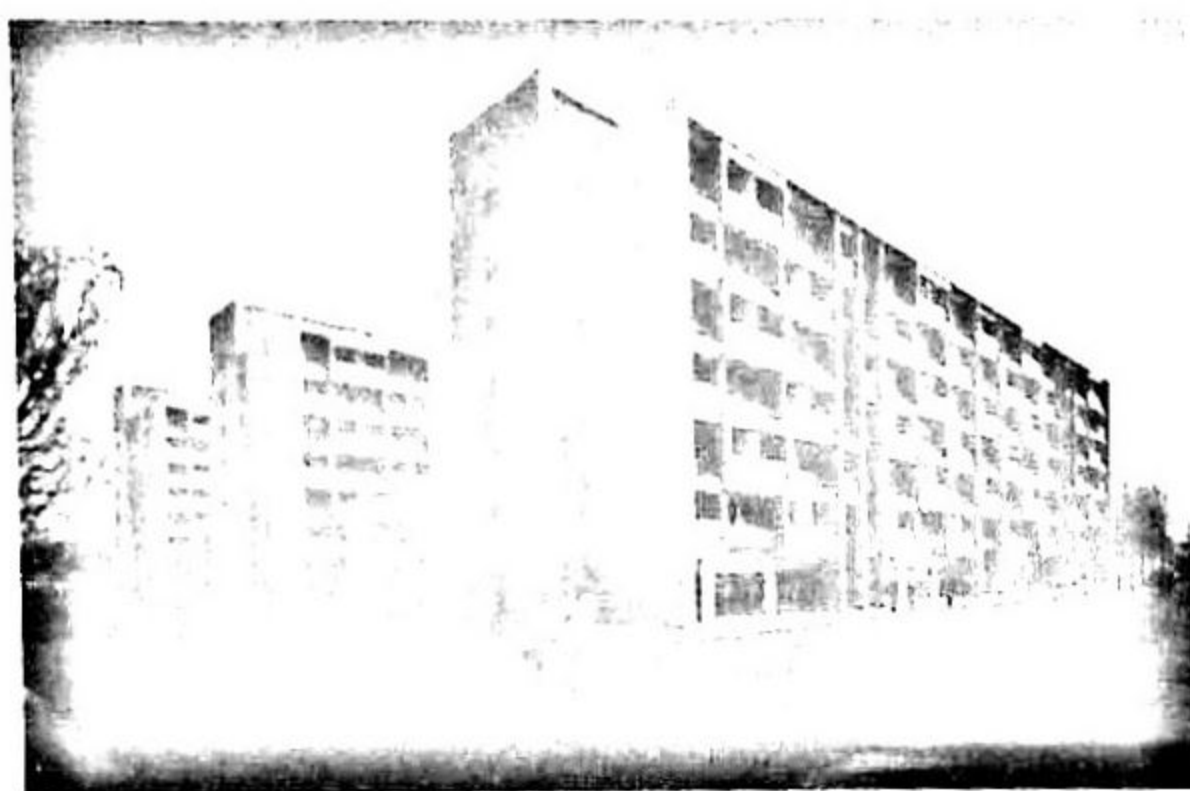
2009年11月，捐资支助西北大学建设“唐仲英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室”，研究开发田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科学安全提取及信息采集技术、可移动文物与大遗址文物的现场保护关键技术、文物保存环境跟踪监测系统、馆藏文物保存环境



苏州大学炳麟图书馆



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的主楼命名为“唐仲英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仲英书院

及控制技术、现代激光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运用等文化遗产保护技术。

2010年，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设立“清华大学唐仲英学生领导力培养计划基金”，以“留本基金”形式，用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政府部门领导人才，通过系统培训、导师指导和实习锻炼三个环节，使学生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学习管理学基本知识，了解政府的基本运作情况，并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2010年，捐资在西安交通大学设立“唐仲英拔尖学生培养项目”，资助学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聘任国外教师、建设国内一流的物理实验项目、建设基础教学科研楼和设立拔尖学生专项奖学金，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工程师。

2011年，资助西安交通大学实施“仲英书院英仔综合能力提升计划”，包括“仲英书院”庭院建设、“唐仲英教育名家大讲堂”导师选聘、资助学生“春诵夏行”暑期游学活动等三项内容，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1年，捐赠5000万元，资助浙江大学建设“唐仲英传感材料及应用研究中心”和“唐仲英智能电网运行研究中心”。

2011年，捐赠1000万元，资助西安理工大学建设“唐仲英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基地”，提高学生在真实工程环境下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能力及对于工程问题分析、设计和实践的能力。

2011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捐资500万元，设立专门针对免费师范生培养的“仲英未来教育家培养基金”。该基金包括“仲英教育名家讲堂”、“仲英师范生教育实习”、“仲英师范毕业生教师专业提升”、“仲英师范毕业生攻读在职研究生奖学金”等四个子基金，为免费师范生提供教学、实习、专业提升、职业发展等全方位的资助。

2012年，资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设“唐仲英种质资源库”；2014年又资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施“唐仲英作物育种研究所”项目，内容包括：“唐仲英育种基金（第二期）”、“唐仲英小麦育种实验室和小麦育种基地”等。进一步发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植物遗传育种科研方面的优势，培育小麦等农作物优良品种，培养植物遗传育种科研人才。

2013年，捐资建设东南大学“唐仲英抗震防灾实验平台”，该平台的建成，将大大提高我国抗震防灾的科研水平。

2014年，资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仲英书院”，结合“书院制”和“少年班”的特点，培养朴实厚德、乐于助人、气质卓越、学识精深的少年班学生。

2014年，出资设立清华大学“唐仲英结构超润滑创新研究基金”，在结构超润滑的基础上，研发新一代超高密度硬盘所需的全新读写头支撑系统、全新的超高灵敏度的柔性传感器，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创新所需的基础问题。

2014年，在山东大学设立“唐仲英讲座教授”基金，并出资支助建立“唐仲英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实验室”，开展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为基层文博单位培训专业人才，建设国际一流的文物保护实验室。

四、资助医疗卫生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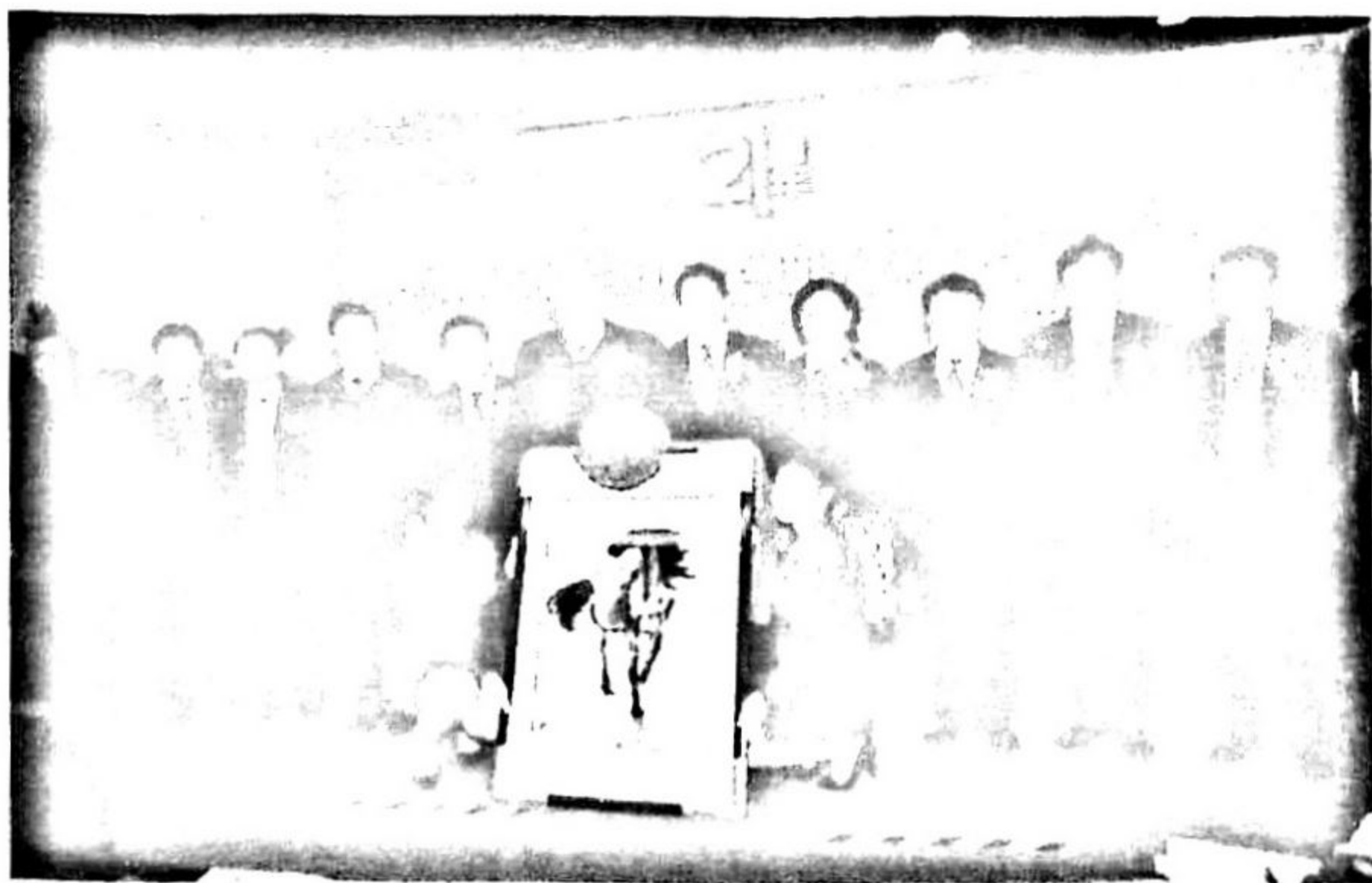
资助医学科研项目，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2006年5月，捐资2000万元，支助南京中医药大学建设江苏省“方剂基础与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方剂配伍规律及生物效应的研究、方剂效应物质基础研究、新技术在方剂研究中的应用以及方剂信息资源知识挖掘与利用的研究。

2008年，在清华大学设立“唐仲英医学研究基金”，以“留本基金”形式，用于支持清华大学医疗、医学领域内具有应用前景的科学研究项目。

2010年3月和9月，捐资570多万元，在苏州大学成立“骨质疏松症研究室”和“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开展骨质疏松症的研究、诊断和治疗，开展产学研一体的转化医学研究；建成集基础研究、诊断治疗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国际先进的血液学研究中心。

2011年，向四川大学捐资1000万元，建设“唐仲英虚拟现实技术临床技能



实验教学中心”，创新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方式，提升临床医学整体教学水平。

2012年，资助苏州大学建立“唐仲英医学研究院”，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努力建成以血液转化医学为龙头，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在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医学研究院。

五、资助中西部农村发展

自2004年起，在陕西、安徽、江苏农村实施“薪火”乡村教育援助计划。资助受助乡镇贫困学生的教育费用，使受助乡镇义务教育阶段的巩固率明显提高；支助学生成立“爱心小分队”，开展力所能及的关爱活动；捐资改善教育设施设备；邀请名师去受助地区上示范课，开办讲座，进行教育理念、教育行为、班级管理、教学方法等的培训，并组织当地农村教师去名校听课、参观学习。资助受助乡镇青壮年农民接受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对在家乡务农的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同时，各受助乡镇与附近设立“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高校挂钩，联系专家、教授和大学生，去受助地区实施各类志愿活动，传播文化、卫生、法律知识，提升当地人民素质，让爱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自2005年起，基金会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陕西省广济镇北双庙村建设“奶沼果循环经济产业科技扶贫示范基地”，在马召镇虎峪村建设“名优杂果示范基地”，为周边农村做出科技兴农的示范。2012年又启动富平县城关镇留招村“樱桃农业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和安康市汉滨区关庙镇吴台村“枇杷农业科技扶贫示范项目”。

唐仲英认为“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需要办教育”。自1997年起，先后在全国12个省市的贫困地区捐资设立CTF小学；至2003年，累计建校251所，改善了当地贫困农村的教育面貌。2004年，由于国家实施基础教育政策的改革，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此外，不少偏远地区的学校合并校区，集中办学，为此，基金会停止了捐资助建CTF小学的活动，但在“薪火乡村教育援助计划”项目中，在选定的受助乡镇，基金会继续出资兴建当地学校的校舍。

2010年，资助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陕西省选点建设“梦想中心”，在周至县和蓝田县为10所中小学建设“梦想课堂”教室并提供相关培训教程。该项目是一次素质教育的公益行动，由唐仲英基金会出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负责执行。以标准化的方式为乡村学校建设多媒体教室和图书馆，并以此为基地，推广一系列的综合课程，通过对乡村教师的系统培训，建立积分奖励系统，持续支持教师的专业发展。

唐仲英基金会（美国）

在美国实施各类资助项目，通过在社区和文化交流领域的有效投入，推进中美两国之间更深广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此外，也致力于教育和医疗事业，并资助相关民间活动以帮助美洲亚裔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主要项目有：

一、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项目

向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资金作为一般费用，此外，对于特别的项目另行给予资助，如中国山东东南部文明兴起的研究、中国南部“海龙”研究、中国中南地区植物种类研究等。还在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设立新的“唐仲英中国展馆”，向各个年龄层次的美国人展示中国，帮助他们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及其对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二、资助美国教育事业

在芝加哥大学捐资设立“唐氏特聘教授”席位，该席位由“唐氏中药研究中心”主任担纲。资助内华达州克拉克郡公立教育基金会实施“唐氏挑战者学会”（布瑞哲中学）及“唐氏读书会”（弗雷蒙特中学）等学生发展项目。在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设立“唐氏奖学金”，重点资助以前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中国高校学生。此外，还资助圣迈克尔印第安学校等其他教育机构。

三、资助美国医疗事业

资助芝加哥大学卡默儿童医院和软骨康复研究中心，推进该中心对修复被损害的软骨、延缓、中止软骨的衰退、实现软骨的再生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的教育培训。向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提供经费，购置最先进的眼科设备，并出资支持该学院的医学研究项目。资助国际爱心网络组织部分运营费用，该组织旨在帮助中国福建省低收入家庭中患有听力障碍的儿童，并通过特殊的教育项目让孩子们学习语言及其他技能。资助北岸大学医疗系统及其基金会，推进北岸大学的介入心脏病学研究；加强和拓展北岸大学的临床、教育及医护系统。

四、资助社区服务项目

资助美洲亚裔公正促进中心与其他亚裔社区组织协力促进社区服务项目。美洲亚裔公正促进中心为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国的美国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捍卫其公民权利，主要实施以下四个方略：指导法律服务、参与诉讼程序、政策分析与

传导以及领袖发展活动。基金会对相关项目给予资助。

五、资助国际交流项目

资助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该中心针对亚洲及美国——亚洲关系中的重大政策，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科学、客观、全面的研究结论。出资成立“唐氏中美关系研究所”，主要研究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影响的相关领域：如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制造业和劳动力分工、货币以及中国与邻国关系。实施斯坦福大学乡村教育行动项目，研究各种类型的推动力量，提高贫困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并使教育对学生及其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最小化。项目组与唐仲英基金会(中国)、中国科学院等联合开展对“唐仲英爱心奖学金”施行客观结果的分析。向“百人会”捐资，用作一般性支出，“百人会”是美国著名的无党派华裔组织，会员全部是在美国享有卓越影响力与相当知名度的华裔精英。资助亚洲协会——南加州中心，该协会致力于加强亚洲和美国之间的联系，加深双方的相互理解。实施“跨越太平洋——教育，透视中国的焦镜”项目，目标是做成一门聚焦中国教育的高中课程，以弥合美国青年学生对中国认识上的不足，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友善关系。

唐氏中药研究基金会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各设一个中药研究中心，结合中西方研究开发手段，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加深对传统中药基本理论的理解，研究中药的机理和适用方法，论证中药理疗的优势和可能存在的风险，藉此提高中药的质量和疗效，使中药在医疗和保健两方面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将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推广到世界各地，造福社会。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团队中培养相互协作的精神。

一、美国芝加哥大学“唐氏中药研究中心”

主要任务是科学地考证中药的效用，并对中药的其他方面进行基础研究，与亚洲科学与医药高级研究所联合出版双月刊《美洲中国医学杂志》。

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唐氏中药研究中心”

这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下属的一个机构，主要研究中药及其方剂的作用机理以及在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and 日常保健中的应用；同时还致力于中国少数

民族民间中草药的研究。

自2005年起，资助中国中医科学院设立“唐氏中药发展奖”，奖励对象为近年来在中药基础或应用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并正在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内地科技人员。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在中药基础研究和中药应用研究领域各评选1人，奖励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这是国内同类奖项中奖励数额最高的。

十多年来，唐仲英基金会在中国的捐款累计已达5亿元以上，实施了数十个资助教育、医疗及其它公益事业的项目。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基金会的工作，唐仲英很早就想在中国建设一个“唐仲英基金会中国中心”，他说“这也是一个承诺”——唐仲英基金会将在中国长期发展。多年来，唐仲英深深地眷恋着家乡，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加美好，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把“中国中心”设在故土上。

位于吴江太湖新城生态公园内的“唐仲英基金会中国中心”，是唐仲英基金会（中国）的总部，总占地面积约50亩，建筑面积17000平方米，采用环保、绿色建筑的理念，突出“点滴爱心，成就美好”的主题，集展示、培训、办公、公益等功能于一体，成为彰显基金会“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的宗旨，全面展示唐仲英基金会的理念与实践的综合场所。

近年来，唐仲英一边忙于参与经济活动，一边致力于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唐仲英基金会”的各项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褒扬。200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由美国知名华人组成的“百人会”第13届年会上，唐仲英被授予首次设立的“人道主义奖”；由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人发起，授予唐仲英“杰出华人”称号；在中国，唐仲英先后荣获2007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榜慈善家”、2010年和2011年“中国十大慈善家”称号；2012年，唐仲英基金会荣获中国慈善排行榜特别贡献奖。

唐仲英说：成立了基金会后，我发现我愈来愈快乐，愈来愈满足，我感觉得到了更多的爱，更多的成就感，比过去更“富有”。……把基金会做好，已经成为了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目标。这个梦想，这个目标，给了我勇气，给了我方向，也给了我希望。当我们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去实现的时候，请记住，不是“这个世界能给予我什么”，而是“我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他希望用他的大爱，成就世界的大美。

郑兰荪



郑兰荪像

郑兰荪，1954年10月生，著名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纳米科技中心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委主委、厦门市委主委。

郑兰荪出生于名门，其祖辈乃盛泽望族郑氏。自明清以来，盛泽郑氏一脉以书香传家。他的高祖郑恭燮，以诗文名重于乡邑；曾祖父郑慈谷，为清末及民国初年盛泽著名乡绅。祖父郑之兰，字咏春，是郑慈谷的长子，先后任江苏高等学堂、江苏铁路学堂、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教授。

郑兰荪的父亲郑重是郑咏春长子，生于1911年10月19日，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海洋浮游生物学的开拓者。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校任教，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浮游生物学，1944年获阿伯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英国阿伯丁大学、牛津大学任教。1947年回国后创立了厦门大学海洋学系“海洋浮游生物学”专业，历任厦门大学海洋学系和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196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华东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是国家科委海洋组生物学科组成员、中国

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甲壳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福建省水产学会、福建省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桡足类学者协会会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8月22日因病在厦门逝世，享年82岁。1987年与夫人顾学民共同设立厦门大学“重学奖学金”。

母亲顾学民，生于1914年7月，吴江（同里）人，著名无机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深造，获化学硕士学位。1939年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苏女师沪校、上海私立乐群中学、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1953年调厦门大学化学系，历任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1956年创办厦门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两度出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为化学系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历任福建省政协常委、民盟福建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常委，民盟厦门大学支部第三、四、五、六、七届委员会主委。1987年在厦门病逝，享年73岁。

郑重与顾学民从国外留学归来后，最后都担任了厦门大学教授。1954年郑兰荪出生于厦门大学校园，深爱故乡的郑重夫妇为了让生长于厦门的儿子别忘了故乡，还特意从老家盛泽请来了一位保姆。郑兰荪听着父母和保姆的乡音，听着故乡的故事成长，虽然他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长大，但他始终对故乡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

郑兰荪虽然生长在充满着书香的家庭里，然而它的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当时面临的是无休止的批判、游街和抄家，他的中学时代几乎是在混乱中度过的，因此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只能在家中自习，还偷偷地学习英语。中学毕业后，几经周折，他才通过母亲退休补员的途径，成为厦门大学一家校办工厂的钳工。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3岁，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参加了高考，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他选报的志愿是英语系，可是阴差阳错，手忙脚乱之中偏偏把他的档案投错了，最后厦门大学化学系录取了他。命运之神选择了他，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化学科学家。

厦门大学的化学系在中国堪称一流，多年来人才辈出，享有极高的声望，卢嘉锡、蔡启瑞、田昭武等著名化学家都出自这里。可是此时的郑兰荪年岁已经偏大，而且文化底子薄，基础差，因此最初他并没有想到要当一名化学家，他只是想通过上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找一份理想的工作。

郑兰荪格外地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厦门大学的几年里，他每天在图

图书馆、实验室和宿舍里老老实实地苦读、钻研，漫游在化学的天空中，慢慢地，他开始陶醉在科学的幻想之中。

1982年初，他在大学毕业时听到了国家要选派40名化学类留学生赴美深造的消息，当即就报了名，并以考试第10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中美联合招收的第一批化学研究生，去美国进行硕博连读。

尽管从英国和美国留学归来的父母多次给郑兰荪讲过国外的情况，但是第一次踏出国门的他还是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在到达纽约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同学们一起登上了世贸大厦的楼顶。俯瞰着曼哈顿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他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繁荣和富裕该多好啊！

他被选送到休斯敦莱斯大学，师从理查德·斯莫利教授，学习的专业是原子团簇的激光产生和研究。

原子团簇是近年中才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的一个新的物质层次，它既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凝聚态的理想体系，又是尚待开发与应用的新型材料，因而成为当今化学和物理学界共同感兴趣的研究焦点。

第一次走进导师的实验室，面对一排排锃亮的实验仪器，郑兰荪惊呆了，这些东西他压根儿就没见过，因此做起实验来常常笨手笨脚，顾此失彼。这样的狼狈相，别说导师，就是郑兰荪自己都觉得很惭愧。

斯莫利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化学和物理学家，郑兰荪是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兰荪于美国留影

导师原以为从几亿中国人当中遴选出来的人一定聪明无比；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因为郑兰荪最初的动手能力离他的要求相差太远。此后，每一次分组实验时，他常常被搁在一边。更令他难堪的是，斯莫利教授严肃地告诉他，这里的试验经费都来自美国能源局，因此他在这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都属于美国，在论文发表时也都不能署名。郑兰荪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他知道，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自己只属于那个清贫的祖国。

在巨大的压力下，郑兰荪奋起直追。他一头扎进实验室，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恨不得让自己的身体与这些陌生的仪器完全融为一体。在美国的4年中，郑兰荪几乎没有

节假日，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留给了实验室。

在那些日子里，他每月的生活开支只有 350 美元，他与另两个同学合租一套公寓，每周只上一次超市，买些打折的食品回来，每天只做一顿饭，分成三餐吃；为了省钱，夏天不管天气多热，也坚持不开空调；把钱省下来购买学习资料。

这种东方式的刻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斯莫利教授。在他留美的第三年，斯莫利教授终于把“超冷原子簇正负离子束”课题交给了他。这是一个科学家们尚未尝试过的研究课题，教授对他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但是郑兰荪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他求学生涯中的第一座高峰，他必须努力跨越！

原子簇是比纳米更小的物质层次，属于物理、化学的交汇点。要检测离子，需要用电场加速，但离子又不能进入电场。他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并向多方求学问道，终于设计出一种特殊的电子线路，既能产生高压脉冲，又使得正负离子都能顺畅地进入加速电场。他还自己动手，设计制作实验用的设备和仪器。

在导师的指导下，郑兰荪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开创以激光产生与研究原子簇的前沿学科，这是前人尚未尝试过的新领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斯莫利教授来到实验室，看到满头大汗的郑兰荪正拿着一把铁锯，全神贯注地锯一根碗口粗的实验钢管。斯莫利在郑兰荪的身后站了半个多小时，他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斯莫利教授对眼前这个被自己冷落了三年中国学生感动了，他掏出自己的手帕，为郑兰荪擦去额头的汗珠，感叹说：“兰荪，从你的身上，我懂得了中国的长城是怎样修筑起来的！”

天道酬勤，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郑兰荪的“超冷原子簇正负离子束”研究课题达到当时国际上最先进水平，博士论文被斯莫利教授认为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中最富有独创性的论文，同学们开玩笑地称郑兰荪为“负离子先生”。在论文发表时，斯莫利教授不顾美国政府的禁令，坚持署上了郑兰荪的名字，并且将他列在第一位。

郑兰荪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后的第三天，他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立即回国！消息传出，不少朋友骂他是傻瓜，斯莫利教授也极力挽留他，美、德、沙特等国家的有关实验室都给出了优厚的待遇，请他去从事科研工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清楚，在国外搞科研，条件的确远比国内更优，收入也远超国内许多倍，但是在国外替人家“打工”，做得再好，成果也是人家的，而在国内搞研究是做自己的事情，他的根在中国。他已经 32 岁了，他知道人生中什么最重要！

1986 年 5 月，郑兰荪回到了他的母校厦门大学，他是同批留学生中第一个回

国工作的人。后来有人问他，在美国4年，对美国有什么印象？他不好意思地说：“花了太多时间在实验室陪机器，根本没机会好好地走走看看。”

回国后，郑兰荪进入厦门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成为该站第一位研究人员；1988年又到化学系从事原子团簇的研究。尽管他回国前对国内研究工作之艰苦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仍然超出了想象。在美国，郑兰荪研究的是以激光产生原子簇、激光化学、分子动力学等方面的课题，属于物理、化学交叉学科的伸展点，不但厦门大学缺乏这方面的工作基础，而且在国内也属于空白。

此时郑兰荪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利用现成设备或再到国外的实验室去做一些实验，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出一些论文；二是自己研制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装置，这样干虽然周期长、风险大，可能在几年内一篇论文也出不了，但却有可能开展真正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有特色的研究。

郑兰荪是知难而进的人，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一方面四处申请经费，购买仪器设备，筹建自己的实验室；另一方面加紧充实在国外来不及学习的配位化学、有机化学和晶体结构等相关知识，为开拓新领域打基础。

郑兰荪在美国学习期间，正是斯莫利教授发现C60的时候，但是出于特殊的原因，他始终没让郑兰荪参与。

碳是生命最基本的化学元素。纯碳原子由于排列形式的不同而生成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即石墨和金刚石，这早已是化学常识。但是斯莫利等人意外地发现了C60以后，这一原理被彻底颠覆了。这些碳分子的原子相联结，既不是构成石墨的层状结构，也不是构成金刚石的三维网状结构，而是一个如足球的空心笼状结构，这些由碳原子团簇构成的神秘笼状物就是富勒烯。

一时间，科学界沸腾了。郑兰荪回国后，世界范围内的富勒烯研究热已经升温，但在国内还是白纸一张，于是他从头做起，白手起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得到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国家教委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和博士后研究基金的资助。他把资金全部投入到购买仪器设备上。

在改装实验室时，郑兰荪和同事们一起粉刷墙壁、油漆工作台、搬运器材。由于仪器的许多配件根本就买不到，他就亲自动手加工。仪器的关键部件“脉冲激光器”，进口一台需几万美元，国内生产的也需人民币10万元以上；为了节约经费，他联系了苏州一家仪器厂，双方联手攻关研制，自编高性能软件，只花了6000元就制成了。他花费一万美元建成的研究装置和国外导师花数十万美元建立起来的装置取得了相似的结果。他早年的钳工技术此时派上了用场，他和伙伴们

一起锯钢材、车零件、焊接……终于，一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首台能同时记录正负离子质谱的激光离子源飞行时间质谱仪建成了。

郑兰荪的富勒烯研究就这样开始了。他综合运用激光、真空、电子和计算机等多种高新技术及许多物理的概念和方法，大胆创新，自行设计了独特的激光溅射团簇离子源，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那一年的年底，当他将一幅实验记录谱图作为圣诞卡寄给导师时，大洋彼岸的斯莫利教授简直难以置信，想不出他的学生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是怎样进行这项尖端研究的。

几年过去了，他记录了上万张图谱，发表了数十篇论文。1991年，37岁的郑兰荪博士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两年后又被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他始终把科研的根基扎在国内，建立起有独自特色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凝聚了一支富有活力的研究队伍，为推动国内团簇科学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斯莫利教授曾经告诉他，我可以教给你科学的知识，但是科学的感觉是无法传授的。是的，科学的感觉是一种神奇的感觉，现在他正全身心地感受着这种感觉，走在科学研究的崎岖道路上。他知道，必须突破现有的实验方法才能取得成果。他和伙伴们进行反复的试验，陆续创建了液相电弧、激光溅射、辉光放电、微波等离子体、溶剂热、催化热解等多种原子团簇的宏量制备方法……

科学家是那些以科学的感觉在未知世界里探索的人，他们在那条漫长的黑色隧道里，默默地忍受着一年又一年的寂寞，经历了千万次的失败，依然努力攀登，屡败屡战，直至成功。

他翱翔在科学的天空中，探索的兴趣像火苗一样，越烧越旺；可是在现实世界里，他的生活却始终是那樣的简约而单调。他仍然保持着美国留学时的习惯，喜欢到超市里买打折的食品，他不饮酒，不抽烟，甚至不喝茶，更别说唱歌、跳舞了，窗外的一切繁华和时尚都与他无缘。吃饭的时候，别人去教工食堂，而他总是独自回家吃方便食品，因为怕排队耽误时间。

1996年，斯莫利教授因C60的重大发现，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全球范围内的富勒烯热反倒慢慢地凉了下來。原来，自C60之后，虽然多种更大的富勒烯分子如C70、C84等相继被合成出产物，但比C60小的富勒烯分子结构十分活泼且不稳定，在这方面的研究迟迟没有进展，而且原来所设想的工业应用的美好前景一时也无法实现。斯莫利教授似乎也对富勒烯研究失去了信心，转向了火热的纳米研究。

此时，郑兰荪却依然坚守在富勒烯研究的领域内。国外和国内的不少同行劝他，富勒烯已从短线转成长线研究项目，再有十年也不会有新的重大突破，不如暂时

放弃，转向最时尚的纳米材料研究，因为富勒烯与纳米材料仅是一墙之隔，极易打通。但是郑兰荪婉拒了朋友们的善意。

基础研究是一切科学大厦的基石，基石虽然埋在地下，却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科学家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没有论文，没有成果，没有掌声，但关键在于坚持，在于坚信。上万次枯燥的重复，上万次黑色的失败，这就是科学家的寂寞。寂寞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煎熬，更是一个炼狱。

然而，长年的坚持总有回报，郑兰荪的研究就像一棵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沉思的铁树，无声无息之中，花苞已经在悄悄地孕育，1997年的冬天，他的课题组制备出了具有C60碎片骨架结构特征的C20Cl10氯代碳簇。这一成果在美国最权威的化学刊物《美国化学会会志》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关注。此后，他们又陆续合成出一系列全氯代富勒烯碎片，发现C60形成与石墨晶面取向的关联，探明碳原子簇的催化生长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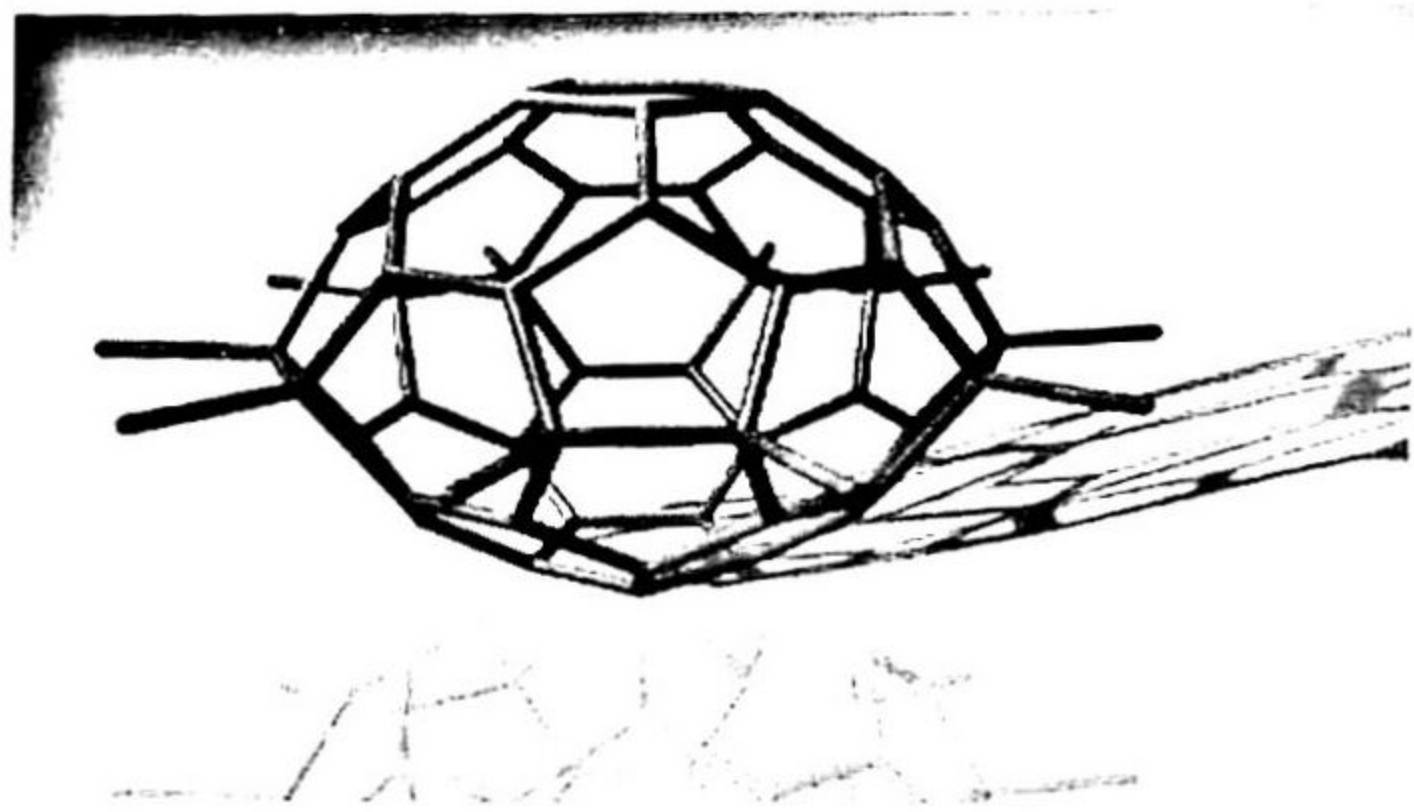
2000年2月初的一天，课题组人员用微波等离子体和氯仿合成出1克左右的黑色粉末状混合物，混合物内含100多种物质，细细分离后，通过质谱，发现一种奇异的原子团簇，且比较稳定。郑兰荪眼前一亮。通过反复检测，质谱确定这种分子包含了50个碳原子和10个氯原子。

他们围在一起，兴奋地商讨着，推测它的结构，怀疑还是像其他的富勒烯碎片一样，是一个破缺的笼子。会不会是一个比C60更小的笼子？如果是那样，意义就更大了。但这一切都是猜想，只有制备出足够量和足够纯的实物，才能通过核磁共振图谱精确表征出它的结构。

一场连续数年的紧张而又激烈的攻坚战开始了……

2001年9月，课题组的女博士生高飞承担了主要的合成与分离工作，并重新

设计制做了一套电弧分离装置，一年之后，终于分离出100克混合物，但其中C50Cl10的含量还不到万分之一。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艰难的分和提纯。从萃取到高效液相色谱，整个分离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年半时间，最后一轮的分离是在北京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实验室完成的，而最终获取的纯化的产物只有1.6毫克。



C50Cl10 的结构示意图

凝望着静卧在瓶底的那一点点土黄色实物，他们哭了，哭完后他们又笑了——这可是地球上诞生的第一簇纯粹的 C₅₀CL₁₀ 啊！

2004 年 4 月 30 日，郑兰荪带领的科研组在国际科学界最权威杂志《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活泼碳 50 的捕获》。这是厦门大学首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也是当年我国化学界在《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表的 3 篇论文之一。当年，斯莫利教授发现 C₆₀，开辟了富勒烯研究的新领域，而比 C₆₀ 更小、更难以捕捉的 C₅₀ 的发现，无疑是该领域的又一项重要突破。论文审稿者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斯莫利教授也发来邮件祝贺，称赞这是“令人惊奇的突破”，接着，国际上数十种科学媒体都在第一时间里进行了高度评价。

成功捕捉到 C₅₀ 之后，他们的脚步更快了。2006 年以来，郑兰荪课题组又陆续合成表征了两种 C₆₀ 的异构体。至此，他的课题组经过 20 年的探索，已经合成出数十种特殊构型的新型富勒烯及相关碳原子团簇分子，揭示了富勒烯的结构特征，并建立了反映团簇形成机理的动力学方程，求解了形成分布函数，为揭示这一长期困惑科学界的难题提供了明确的实验证据；制备了管、线、鞘/核、球等多种形态的纳米材料，组装了纳米孔洞、纳米螺旋等微观结构材料。

2005 年 10 月，斯莫利教授因病去世，临终之前，这位“世界富勒烯之父”仍然在关注着郑兰荪及中国的富勒烯研究。斯莫利教授去世了，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他把富勒烯研究的火炬传到了郑兰荪的手中。

令郑兰荪自豪的是，他们取得的这些成果全部是在国内完成的。化学是一门基础科学，也是一项长线研究，他们的这项捕获 C₅₀ 的研究，从确定选题到最终取得成果，历经了 10 年艰辛。谈到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郑兰荪显得十分谦虚，他说：“我们的成果其实也不算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了 C₆₀ 这一科研基础，国外近十几年里也发现了比 C₆₀ 大的碳笼分子，我们算是第一个发现比 C₆₀ 小的碳笼分子。”郑兰荪表示，目前他们还只是做出了几毫克的纯净产物，还能往前推进多远，现在还很难断言，但是他们会坚持继续做下去。

作为我国原子团簇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郑兰荪充分发挥国外所学之长，立足国内条件，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以激光产生和研究原子团簇的工作，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得到国际同行重视的原子团簇科学研究基地，与此同时，他还毫无保留地向国内同行传授有关技术和方法，并指导和协助他们研制类似的仪器，带动国内原子团簇科学研究的开展，并在数年内迅速发展至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为推动这一前沿学科在国内的开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国十几年来，他先后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多篇，他以自己的成就让人们相信，在中国，我

们一样可以做出骄人的业绩。活跃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创新的认识、顽强的韧劲，使郑兰荪在团簇科学的新一轮竞争中，走在了国际同行的前面。

郑兰荪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原子团簇科学”被国家科委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他取得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际上原子团簇研究领域的空白。这些开拓性的创新研究，为我国乃至世界原子簇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受到卢嘉锡、唐敖庆、吴征铠、蔡启瑞等专家的好评，卢嘉锡先生称赞郑兰荪是国内青年一代化学工作者的代表。

郑兰荪多年来的科研精神和科研成果，在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屡屡受到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助。1988年，他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1991年，获得厦门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奖；199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届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资助，并当选为厦门市劳动模范；1993年，入选国家教委首批“跨世纪人才计划”专家，并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被授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199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届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当选全国先进工作者，并被评为福建省优秀专家；1996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8—2002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原子团簇的化学和物理”的研究，并成为项目负责人之一；2000年，被聘任为“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入选教育部高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03年，被评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2004年，被授予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的称号；2006年，由他负责的“碳原子团簇的形成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以他为首席科学家的973计划项目“物质性能的分子设计与结构调控”于2007年开始执行；2011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1年，47岁的郑兰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分别被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聘为兼职教授、研究员，并担任教育部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结构化学、配位化学、原子分子物理和波谱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质谱学报》主编。

郑兰荪不仅是卓有建树的著名科学家，也是一位满怀报国情怀的爱国者、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

他在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三天，就决定回国工作，别人感到他的决定不可理喻，但他觉得顺理成章。他说：其实我没有想得那么复杂。我们生长在知识极度贫乏的年代，大家都憋着一口气，要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发奋学习。“既然是祖国派

我去留学，学成了当然要回来报效祖国。”

他在《回国工作两年来的几点感受》一文中恳切地说：“我们这些留学生可以说是幸运儿，但我们切不可以为自己留了几年洋，会讲一口比较流利的英语，有着一部半新不旧的汽车，就看不起自己相对还比较落后的祖国，看不起自己的同胞。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老师和同学，可能一辈子发表文章的数目还不及我们在国外的几年多，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骄傲起来。正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才使我们能在国外受到比较公平的待遇，



郑兰荪在实验室里

才使我们回国后能有一定的工作条件。可以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他们个人牺牲的基础上……多年的变迁，使得“雷锋精神”已经成为阳春白雪，激不起多少人的唱和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至少应该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不应当忘记自己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中国心。

如今，郑兰荪已是荣誉等身，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平和的学者风范。这些年来，无论科研与社会工作如何繁忙，他依然坚持为本科生上课，每周跨海往返厦大漳州校区两次，给本科一年级学生上《化学原理》课，加上路程和备课时间，平均每次要花费8小时以上。在一般人看来，本科低年级课程内容与前沿学科研究关系不大，因此不愿意为此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认为，为本科生授课是教授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本学科最新发展动态直接传授给学生，拓展他们的视野，增强学生对本专业、本学科发展的学习信心。郑兰荪的精神，鼓励着更多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走上本科课程的讲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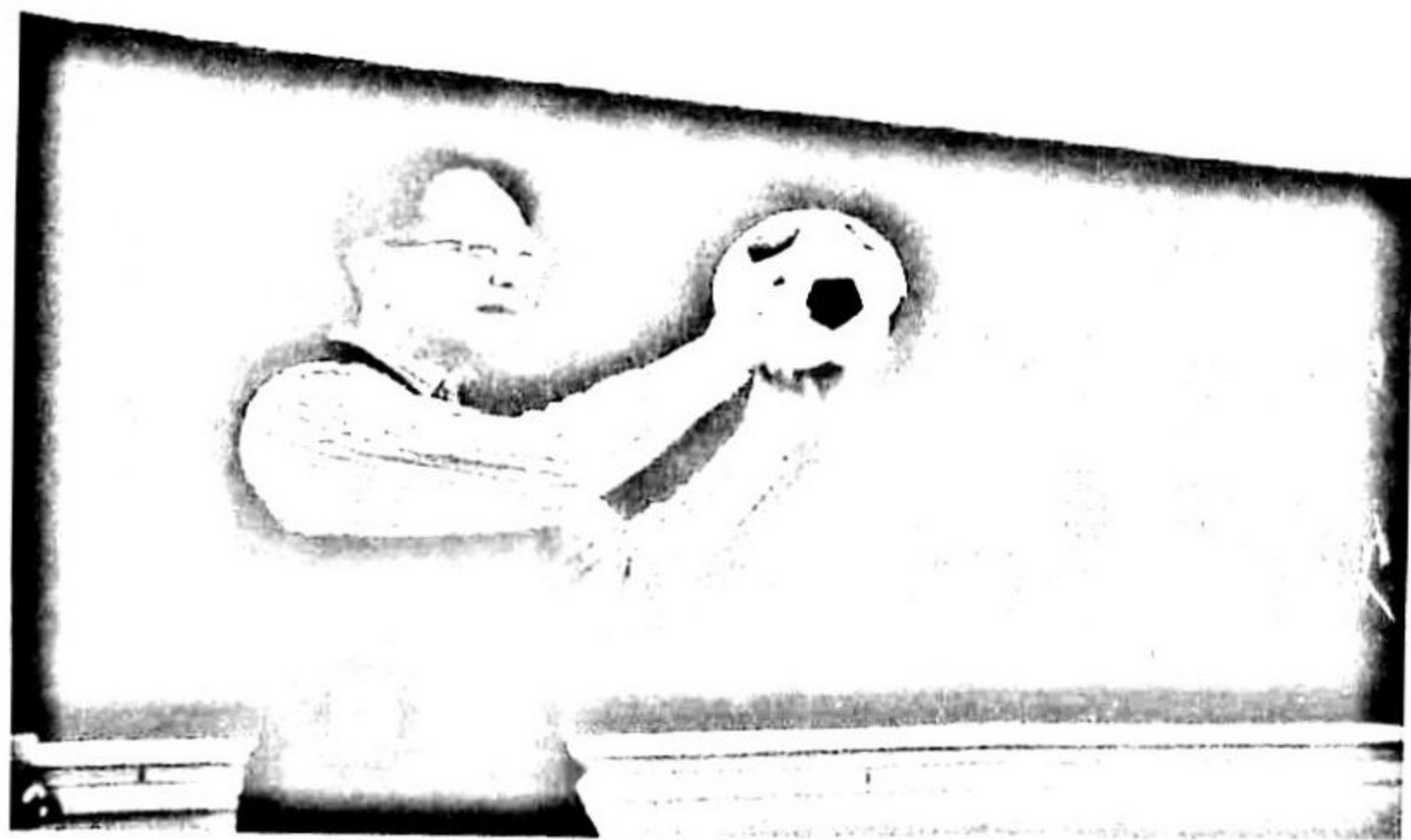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促进厦门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壮大，郑兰荪毅然决定将研究方向从物理化学转移到无机化学。他在厦门大学创立了无机化学博士点，培养、引进和选留优秀人才。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他十分重视学科交叉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他先后引进了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优秀人才。作为团队负责人，他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引导学术方向，鼓励大胆创新，积极为

团队成员特别是青年师生攻关创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他提倡研究经费、招生名额等研究资源更多地向青年研究人员倾斜。

郑兰荪的研究团队成为青年研究人员成长的孵化器，先后培养了一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一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获得者、一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他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在毕业留校任教6年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7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他培养的一名硕士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于2007年回母校任教，2009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0年受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科的青年教师已有7人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2004年，福建省授予郑兰荪“杰出人民教师”称号，以表彰他在科研攻关和教书育人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05年，由他领衔讲授的《无机化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他领衔的化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并获得福建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郑兰荪还积极参与我国化学学科的教学改革工作。自2005年起，先后担任教育部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他主持化学专业结构调整、化学类专业评估研究与实践等多项教学研究项目，带领分委员会成员完成了“化学类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研制，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他撰写的教学论文在《大学化学教学》等杂志发表，他多次在国内各类化学教学研讨会上作报告，解读、宣传化学教学基本内容和办学基本条件，他的工作对规范高校化学类专业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郑兰荪在讲课

郑兰荪的父母都是留学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1987年，郑重、顾学民夫妇设立了厦门大学“重学奖学金”。受父母的影响，郑兰荪也慷慨解囊，助力青年学子实现梦想，2001年起，郑兰荪向“重学奖学金”增资，以表彰品学兼优、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

在厦门大学，郑兰荪被学生们称为“厦大的爱因斯坦”，因为他常常不修边幅，头发乱糟糟的，而且常在校园里边走边若有所思，嘴里念念有词。当别人问起他对这一称谓的看法时，他幽默地说：“我知道有学生这么叫，一般这么叫的人肯定对我不太熟悉。听过我讲课的学生可能就不会这么叫了，我讲课还是蛮精彩的，我还是受表彰的‘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呢。当然，爱因斯坦讲课也可能很精彩。”

郑兰荪的母亲顾学民生前是中国民主同盟厦门大学支部的主委，她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儿子能加入民盟。1987年5月，郑兰荪遵从母亲的遗愿加入了民盟，后来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福建省委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另一个舞台上参政议政，为科教兴国建言献策。

郑兰荪一直对高等化学的教学质量非常关心，他深知教学需要积累，提出“指导青年教师胜任教学”的理念，并通过政协提案、接受媒体采访等渠道呼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教师钻研教学。2007年“两会”期间，他代表民盟中央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遵循高教规律，培育创新人才》的发言，提出“要切实转变当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确保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从事教学活动，特别是承担本科基础课的教学工作”等建议，引起很大反响。2011年“两会”期间，他提出“科学研究应该‘顶天立地’”的见解，并陈述了“基础科学的门槛”、“支持高校教师创建独立研发企业”等建议。

郑兰荪认为，我国目前基础研究队伍过于庞杂，对于应用研究不够重视，缺乏衔接实验室成果与企业企盼的产品的中试平台，导致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很低。他认为，科学研究应该“顶天立地”，要么解决尖端科学问题，要么解决实际问题，但遗憾的是“现在国内大多数研究既不顶天也不立地”。

针对这种情况，他建议首先要提高基础科学的门槛，让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重点放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上来。“即使是重点院校，也可以用一半的资源用于应用研究”，高校的考核体制要充分考虑应用研究。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应该是平行的关系”，职业教育也应该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应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将一部分应用学科转入职业教育范畴。第三，支持高校的教师创建独立研发企业。通过创办企业性质的研发机构来实现研发成果转化。这既可以解决企业的技术需求，也为学生发挥专业、发展能力、就业创造了渠道。他认为，“如果说基础研究要靠兴趣驱使的话，那么应用研究更主要靠利益来驱使。”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认为，“破解产学研结合的瓶颈，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务之急！”

他希望企业能通过和高校、研究所的合作，解决技术需求；而高校、研究所能以开放的态度，通过积极探索，找到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让研究成果更好地得到转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使相关企业的生产力得到有效地提升。

作为一名科学家，郑兰荪的身上凝聚着许多优秀的品质。他善于创新研究方法，注重学科交叉，综合运用高新技术，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领域，将实验与理论相结合，发现和总结基本规律。他说：作为一名科学研究人员，除了具备创新思维和意识以及对科学锲而不舍的探索、追求之外，还要有一股为科学研究献身的精神和拼劲。有了这些还不够，一位科学家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勇于承担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后记

我的家乡盛泽是一个有着“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美誉的江南古镇，它以美丽的丝绸深受世人的赞叹，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无数客商来这里经商、投资，开创自己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盛泽的丝绸纺织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一批批装备先进、技术一流的新型丝绸纺织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这一片投资热土上，位于盛泽镇区的中国东方丝绸市场也迅速成长为颇具规模的纺织品专业市场。

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纺织产业集聚区之一，盛泽的发展业绩引起了新闻界、学术界、产业界等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来盛泽参观、考察、调研、采访的团队络绎不绝。由于我长期从事经济领域的管理工作，有机会与各方面的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媒体的朋友广泛接触，深受教益与熏陶，并由此对盛泽经济发展的特色、丝绸产业发展的轨迹和盛泽丝绸文化的独特个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开始了有意识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应该说，关注盛泽的人们大多把关注点集中在产业经济的发展上，我自己也曾在一篇短文里写道：“翻开盛泽的历史，充斥于斯的几乎只有两个字——丝绸”。但是，随着探索的不断

深入，我发现盛泽其实不仅是个经济繁荣的丝绸之都，同时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化重镇。在盛泽一千七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凝聚起厚重的文化底蕴，形成了“重商、务实、包容、开放”的经济文化特色，涌现了无数杰出的优秀人物。

盛泽经济的繁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名人的涌现创造了物质条件，而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名人的涌现又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商养文，以文兴商”这种相互促进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盛泽培育“崇文”与“尊商”并存优良传统的文化背景。

在盛泽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曾经走出了一批名闻遐迩的名臣、诗人、文学家、书画家、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艺术家、慈善家，他们是国家的英才，是盛泽人民心头的骄傲，他们为绸都盛泽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作出了贡献。

在掌握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我受领导委托，对出现在各类史籍中的盛泽历史名人和近现代的优秀人物进行了梳理，从中遴选出16位曾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突出的成绩或对盛泽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名人，分别为之作传。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搜集资料，对一些名人的后辈或亲属进行了采访，并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考证、比对、分析与研判，最终写成传记。由于所搜集的资料多寡不一，故而撰文长短有别，多则万余字，少则六、七千字，敷衍成篇，合成一集。

在撰写的过程中，引用了许多地方志、其它史籍以及前辈留下的文字片段，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朋友以及名人后辈或亲属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限于本人的水平有限，文字中的错误、缺陷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原谅并批评指正。

沈莹宝

2014年9月12日写于静远斋